小说散文选



封面设计：秦　多

小说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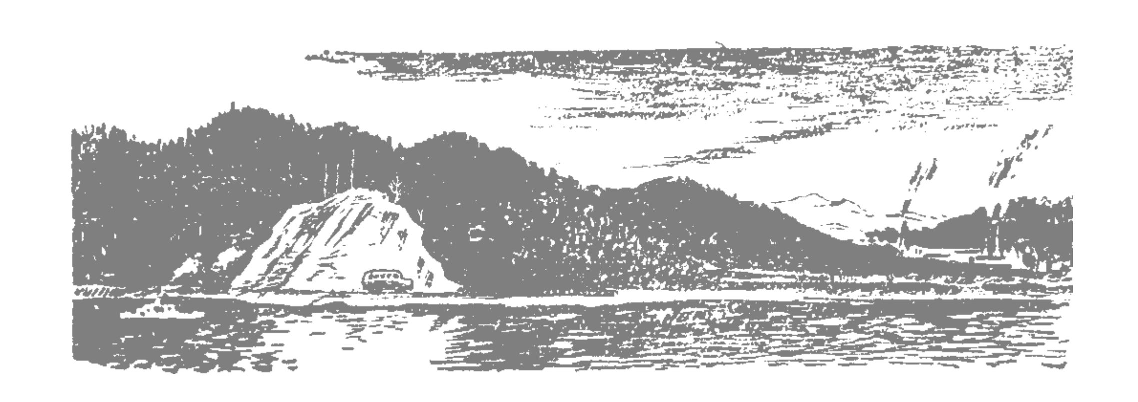
字数309,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5}{16}$　插页2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000

书号 10019·3518　　定价 1.15元

目　录





第一章　墙上的字迹

战争刚一结束，同年七月我的石棉水泥管道车间的毕业设计通过了，我和毕业的同学们一起等待分配。

当时，我可以选择的工作单位有好几个。最后，我选定了 K 城附近的一个水泥厂。该厂离我国与罗马尼亚的边境线不远。我和妻子莲娜同时大学毕业，她也分配到了这个工厂。

我们有一个月的假期。莲娜决定和父母　一起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度假。他们也邀请我去，可是我认为应该把事情考虑得周到些，应该先到新的工作地点了解一下情况，和同事们熟悉熟悉，再找一套住房。总之，在妻子到来之前，起码把生活稍微安排一下。

我很快整好行装，带上简单的行李，就在基辅车站上了火车。经过两昼夜的行程，火车在傍晚驶近目的地　。这

时，我看到远处有一个高大的古城堡塔楼，它在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非常突出。很快一个小城镇便展现在眼前。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城镇座落在一条深广的河流旁，两岸群山之间

来到城镇，看到的是整洁的街道，小巧洁白的瓦顶房屋，屋旁绿树浓荫下的人行道，宽阔的广场，栗树遮盖的林荫小道。这里，集市上排满了摊贩们的牛车，而车旁就拴着不停地在反刍着的犍牛，还有把餐桌摆在路边上的一些街头小咖啡馆。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典型的南乌克兰城镇。

去工厂还要乘十二公里的汽车，于是，我给莫斯科拍了一份电报，以后，便不停脚地换乘往返于火车站和工厂之间的公共汽车，继续赶路。不一会儿，汽车已疾驰在公路上。柏油路面平坦光滑，杨树夹道成行。公路盘山而上，接着又顺势而下，进入一片长着稀疏灌木丛的谷地。在一个急转弯后，一条宽阔平缓的河流便展现在眼前。这时，汽车朝正西方行驶。只见在淡紫色晚霞环绕中的一轮红日与两岸昏暗的倒影一起映在平滑如镜的河面上。我静静地沉醉在这美丽如画的迷人景色之中。

远处突然出现了三个工厂的烟囱，有一个还冒着烟。几分钟后，工人村的灯火在夜幕里已隐约可见了。

汽车转弯驶向广场，在一所阴森森的两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楼房四周搭着脚手架，有的窗户上还装有铁栅栏。一盏昏暗的孤灯照着钉在门上的一块招牌上。这一切给人带来一种郁闷的感觉。我看了看那块招牌，好不容易才相信这里就是旅馆。接着，里面的灯亮了，沉重的大门慢腾腾地打开，一个老头儿出现在门口。

“请问，这里是旅馆吗？”我问道。

“不错，就是，您放心好了，这儿不是牢房，”老头儿亲切地微笑着回答，“请到这儿来吧！”

他打开一扇旁门，让我走进办公室，这是一个刚刚粉刷过的房间。屋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保险柜。墙壁上的玻璃挂橱里有一块挂钥匙用的木板和一大张旅客须知……我把证件交给他看。

办完手续后，老头儿对我说：“我们把您安排在二楼住，二楼已修缮好了，那里窗户上的栅栏都拆掉了，咱们上楼去吧……是呀，这房子明摆着是让人不痛快的！”我们上楼的时候，他又接着说道：“法西斯在的时候，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的秘密警察——译者注）集中营就设在这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盖世太保集中营，还有地下室呢。现在做办公室的那间屋子过去是养狗用的。那时候，谁要是到了这儿，那就算完了！院场上还有过绞刑架呢，”他悄悄地加了一句，“现在回想起这些事，就象是一场噩梦。等我们把这幢楼房修缮完了，把楼的正面整修一下，我们这儿就是一个象样的旅馆了。”

我住的这个房间并不宽敞，不过，布置得相当舒适，还有一扇朝着花园的窗户。

一会儿，服务员走了进来。她拿来一条床单，铺好了床，把一瓶花摆在桌上，向我道了声“晚安！”便出去了。

窗户虽然开着，可是房里仍然感到闷热，还有一股油漆味儿。这一夜我没睡好，梦见每个角落里都有难以名状的可怕身影，呆滞不动地瞪着眼睛看我，向我伸出罩着铁甲的长爪。我醒来时，灿烂的阳光，早晨清新的空气和在窗下手脚

架上工作的建筑工人们愉快的谈话声，驱散了我昨夜梦中的惊恐和不安。我洗漱、收拾完毕，便到餐厅去。餐厅在旅馆的第一层　已经修缮好的那一部分。那里洁净的台布、鲜花和崭新的餐具令人赏心悦目。

时间还早，但是餐厅里已有一位漂亮的年轻人在用早饭。他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还戴着一副眼镜。他身穿一套崭新的灰色西服，笔挺考究。他手上的金表样式新颖，上衣口袋里露出粗大的自来水笔和铅笔。他付钱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皮夹子里有一把金鱼形的梳子。这些事物都表明他有一种独出新裁和别具一格的企求和爱好。他只是在读报时，睨视了我一眼。

“这是什么人？”陌生人离开餐厅以后，我向旅馆的老经理问道。

“是一家报馆的记者，”他回答说“他在此地已经住了两个星期了。”

我吃过早餐，便走去看楼房一层盖世太保时期当牢房用的那些房间。大部房间已经修缮完毕了，只剩下几间屋子还保留着过去牢房的样子。我走进了其中的一间。室内光线昏暗。两扇窗户的绝大部分都用砖头砌死了，上面未被堵住的空隙处，还有一根根黑色的铁栅栏。微弱暗淡的光线，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照在灰色的墙壁上，墙上有的地方现出一块块返潮的斑迹。

肮脏的天花板上装着一盏暗灯，沿墙放着几张木床，一扇带门闩和监视孔的铁门——这就是房间里所能看到的一切　我谛视之后，发现墙壁上有很多地方留有字迹。“同志


2 17 31
14 45 14
35 7 10

们，要坚持下去！”——这是用蓝色铅笔写的，字体很大而刚劲有力。还有“我们蔑视你们这些刽子手！”旁边还有用尖利的东西刻下的几行字“托利亚·谢尔多宾和热尼亚·阿诺索夫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同志们，为我们复仇啊！”靠下一些，还有一个用炭块写的，几乎已被抹掉的一行字“我履行了对祖国的义务,死而无愧！”

还有许许多多的留言——有的是男人刚劲有力的字体，有的是女人和儿童的笔迹——这是苏维埃人刚毅、英勇和大无畏精神的见证。

我走出了这个房间，心情是激动而沉痛的。旁边是另一间稍小些的囚室。那里光线充足一些，因为修缮工作快要结束，窗上的栅栏和堵塞窗口的砖已被拆除了，板床也搬了出去。天花板和一面墙已粉刷一新。一个工人正用刮刀蹭刷着另一面墙。我本来打算走出去了，可是，突然发现在墙上，就在靠近地板的地方，有几行用铅笔写的非常工整、非常清晰的数字，有个位数，也有十位数，数字之间都有间隔。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写的可能是一段密码。大概，被监禁的人在墙上写了什么重要内容，为了不使盖世太保们发现，把它写在床板后边，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对此不能不予以注意。我找到了一小块糊墙纸，向工人要了支铅笔，把这些数字都抄了下来。

“啊，您也对这些墙上的留言感兴趣？”我听到一个宏亮的声音，于是回过身去，看见站在我身后的正是在饭厅和我同吃早餐的那位记者。“我简直感到震惊，”他接着说道，“太可

怕了！这些个坏蛋！……我们还不认识呢，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科洛米采夫，基辅报的记者……能和您认识非常高兴！”

我们互相问好。他没穿上衣，所以我发现他左手上，手表靠上的地方有子弹穿过的伤痕。他倾身注意地察看着密码：

“您在这儿抄什么？……啊，这很有意思！太有意思啦！哦，哦……但是，您别白费劲了。这些早就有人抄过而且拍了下来。在市委您可以找到整整一大本这类的东西。来，我陪您去地下室，盖世太保在那里拷问过那些被他们俘获的人。”

地下室已经修缮好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感兴趣的地方。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原来，他是到工厂来参加二号炉开炉典礼的，可是，他未必能等到这一天，因为他还要赶到契尔尼戈夫采访篮球赛的消息，在这里最多只能呆两三天。

我们分手了。我得去见厂长，到我未来的领导——转炉车间主任哥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托尔卡乔夫那里去报到。

后来，我同哥里戈里在工厂里转了一遭。可以说，原来只有一个制管炉的这个老工厂，被法西斯分子破坏得一无所有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拥有三座巨型管式转炉的庞大企业。一座转炉已经开工生产，另一座已经过试炉阶段，而第三座正在安装。

“你看，搞了一个多好的工厂呀！是个大厂啦，真漂亮！”当我们看完全厂时，哥里戈里说“地方真太好了 泥灰岩

是头等的，这种泥灰岩别处很难找到，它的蕴藏量也很大，而且附近就有水源。”

我离开工厂返回旅馆的时候，天已经要黑了。

密集的云层遮住了天空。透过云层还能看到月亮，它就象在烟雾中浮动似的。天气非常沉闷，就象暴风雨即将来临，一点儿风也没有。我的房间里，尽管敞着窗子，但还是喘不过气来。我干脆抱起褥子、床单和枕头，跨过窗子，爬到外边的脚手架上，铺好就躺下了。

我想“有暴风雨，我也来得及跑回房间。”于是，把床单盖在身上，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章　与疯子的搏斗

睡梦中我觉着有人在动我的一条腿，摇了又摇……于是，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一个瘦高个子老头儿伸开两手，站在墙根，背挡着窗子。不，这不是梦！微弱的月光下我清楚地看见他那苍白的脸，满头散乱的白发，蓬松的胡须和肮脏不堪的粉红色的衬衫。他伸着脖子，好奇地打量着我并且显出嘲笑的神态。我半撑起身子来。

“别，别，别……”老头儿伸出一个指头威胁着我，低声地说：“这无济于事……听着：‘我是力大无穷、残酷无情的青少年领袖，埃费斯王国已被我占领！’记住这个，记住：‘我是力大无穷、残酷无情的青少年领袖……’”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这句无法理解的话，而且越说越快。他一边说着，一边向我跟前移动，最后竟俯身贴近我，他的胡子都蹭着了我的胸部。他的眼睛滴溜溜地闪动着，两只手做出些怪动作，就象是在抓被单。毫无疑问——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疯子。我把他推开，跳了起来。

“啊……好，好，好！”他说完就笑了起来，“这回可知道你是什么人了！现在我可认出了你……藏不住了……你是贝都英人（游牧的阿拉伯人——译者注）！贝都英人！回来啦！又来啦！”

他的面部表情突然变了。

“他在哪儿？你们把他藏到哪儿去啦？把我的儿子交出来！”他喊了起来，接着跪下，抱住了我光着的两条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处可逃，何况他还牢牢地抓着我……喊吧，又感到不好意思。显然，这是个不幸的父亲，他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

“老大爷，别激动，”我尽可能平静地说，“我没有害过你的儿子，也从来没见过他。我昨天才刚刚到这儿……如果说他在战争中牺牲了，那么，他就是一名捍卫祖国的英雄……”

我不该说这些，因为听到我的这些话后，他立即伸直了身子，抖动起来，他用极度凶狠的目光盯了我一眼，大声喊道：

“是的，他是英雄，是英雄，而你是贝都英人！你是叛徒！贝都英人！叛徒！叛徒！”

他立即向我扑过来并且两手以超出一般老人的力量掐住了我的喉咙。

接下去的情况我就记不清了。我们在脚手架紧边儿上扭打着。我们脚下的木板不停地颤动、摇摆。我曾一度濒临死亡。老头儿用整个身子挤压着我，我的上半身已悬在脚手架横搭的栏板之外了，而他却一直狠狠地掐住我的喉咙。我的两脚悬空晃动着，我喘不过气来了，眼睛里直冒金星。“难道就这么完了？”——我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猛一用力，一只脚勾住了木板并从疯子的手里挣脱出来，随后我跳起来，抓住他的两个肩膀并使出周身的力气，把他推开。他脑袋撞在木杆上，失去了平衡，从脚手架上跌了下去。

这一下他准得摔死。可是不然：他在半空中不知抓住了

什么东西，借着这股力量轻巧地跳到了地上。他暴怒了，怪跳着，还挥动着拳头向我威胁，穷凶极恶地喊道：

“你记着，记着：‘我是力大无穷、残酷无情的青少年领袖，埃费斯王国已被我占领！’”——接着，他异常敏捷而快速地向花园跑去，刹那间就无影无踪了。

旅馆里顿时慌乱起来。人们拿着手电筒跑了过来，搜查了花园。经理也来了。这时，我已稍微镇静下来，把发生的一切都对他讲了。

“是，是的，”他摇着头说，“我忘了事先告诉您，这里不能在室外过夜。老头儿有时夜间在广场和房子附近走动……这个人是伊凡。谢尔多宾，过去工厂的会



计。是个不幸的人呀！您不知道，法西斯分子把他的儿子抓到了盖世太保集中营，后来就在这里，在这个广场上给吊死了，而且还强迫老头儿本人来看。咳，结果他就……神经错乱了。他住过几次精神病院，可是没治好……白天他没什么，默不作声，象哑巴一样，不管问他什么都不回答，可是，一到夜里有时就胡闹。只是从前他没打过人。他就是把人叫醒并强迫人家听他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看来，您准是不知怎么惹着了他。”

“这么说，他是谢尔多宾，就是在牢房墙上留下感人肺腑的遗言的托利亚·谢尔多宾的父亲啦！”对老头儿我感到怜悯，我很难过，很痛心，这都怨我自己招致这个不幸的老人发作。

次日早晨我从饭厅往外走的时候，记者科洛米采夫叫住了我。他一手拿着雨衣坐在小长凳上，脚旁放着一个手提箱。

“我正在等您呐。我想从当事人的嘴里知道关于夜间发生的惊险情节。太有意思啦！对不对？据说，有个精神错乱的人打了您……盼以细情相告，不胜感激。记者总是好奇的。”

我把夜间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地都告诉了他。他注意听我讲着，个别地方他重又问了问。

“怪有意思的奇遇，不对吗？”当我讲完了的时候，他又这么说道，“他准是把你当成个阿拉伯人了。头脑有病的人是什么都想得出来的呀！……就谈到这里吧，我该走了。再见！得去赶飞机。”

“您不是本来打算在这里再呆两三天吗？”我忍不住问道。

“情况有变化，不行了！”于是他走了。

“这和情况变化并没有什么关系，被疯子吓坏了，这倒是真的。你虽然衣冠楚楚，却胆小如鼠。”——我心里这样想。

然而，说心里话，我也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再碰上这个可怕的老头儿，那可以想象得到，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尽管按旅馆经理的说法，他是从来不到旅馆里来的，可是总不该把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估计得这样老实。我决定到离这个不祥之地远些的地方去找个房间住。



第三章　古城堡塔楼里的发现

我很幸运。人们告诉我，在村镇的另一头，离工厂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带阳台的小房，房前还有个小花园，那里有一个房间出租。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衣着整洁的老太太。当我说明来意之后，看得出她是很高兴的。

一个宽敞、豁亮的房间足够两个人住，暂时先在这里安家是完全可以的。我们很快就谈妥了条件，我也就决定住在这里了。老太太名叫娜杰日达·帕西柯。她很健谈，把自己的痛苦也告诉了我。她的痛苦正象许许多多别的母亲的痛苦一样：她的儿子早在一九四二年初就被盖世太保抓去了，从那时起就杳无音信了。他是死在当地，还是被送到德国而在那里牺牲了——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情况无法知道。他曾在工厂任化学实验室主任。

“现在我和儿媳玛利娅·谢尔盖耶夫娜两个人住在这里，过着穷日子。她在工厂工作，我干家务活儿。现在我的孙女儿塔妞莎从基辅来这里过暑假，住在我们这里。”

老太太笑了笑，她脸上也显得明朗了。

傍晚，我搬进了新住宅。玛利娅·谢尔盖耶夫娜是个讨人喜欢的人，面容虽带有一些倦意，但和蔼可亲，她有一双灰色严肃的眼睛，深色的头发已有几处斑白。她的女儿已经

二十岁了，可是看上去却象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 在医学院上二年级。她那欢快的浅棕色眼睛里充满了热情，洁净的额头，端正的鼻子，长长的淡褐色头发编成了两个辫子，——看来，长得漂亮而端正。只是嘴唇长的显得呆板，这使她的外貌有些减色。在她那匀称而矫健的体态和生硬的动作中还能看出一股孩子气。她酷爱散步而且经常鼓动我也这么做，可是我更喜欢的是一个人散步。

我常常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沿着麦子、玉蜀黍地边和大路闲走。顺路到农舍津津有味地吃些新摘下来的、还有温乎气的葡萄。早饭就吃些香瓜和西红柿，喝点新酿成的略带酸味儿的葡萄酒。而有时候我爬上山顶眺望屹立在郁郁葱葱的一片片树林中微微发白的悬崖、银川、远处的农舍和村庄。过后，利用傍晚的时间，把我看到的这一切都写在长长的书信里……

我也到城里去过，这一次是和达济扬娜一道去的。

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刚刚被纳为预备党员。到这儿以后，我得赶紧到区委会去登记并且去见第一书记。达济扬娜这一天正好去市内买东西。我们约好办完事在街心花园相会，一起回家。

第一书记是叶廖缅科同志。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内同一位来客兴致勃勃地谈着话。

“请认识一下：克拉耶夫斯基，当地狩猎协会的主席。叶廖缅科说。

叶廖缅科详细询问了我的一切情况，答应给安排党的工作。又问了我的住处安排得如何，是否还缺少什么东西，我

向他表示感谢并顺便把在旅馆夜间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是的，知道，我知道。”他说，“关于这个不幸的人我听说过。没能经受得住精神上的打击。这也难怪，父亲怎么能亲眼看着亲生儿子受刑和被处决呐！德寇占领期间，”他继续说着，“我们这里确实有几个地下组织在活动，其中有一个小组叫‘ЮРП’ ‘青少年爱国侦察员’。这位克拉耶夫斯基，”他指着克拉耶夫斯基，“和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

克拉耶夫斯基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精力充沛，人也不老，可是头发已经白了。他那灰色的眼睛持重而锐利。可是，他抽烟斗时的那种带有神经质的动作，说明他有过一段远非一般的生活经历。

“是的，”他放下烟斗说，“青少年侦察员不止一次地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这个小组的秘密活动进行得十分出色。他们通过一种特殊的符号相互联系。我们只同他们的一个联络员瓦西里·加夫里洛夫，代号叫‘舅舅’的保持联系。他是个结实的青年。一九四二年春，地下组织被敌人破获时，他打死了三个盖世太保后自杀了。当时，所有的人都被捕了：阿诺索夫、托利亚·谢尔多宾、帕宁娜姐妹等一共十二个人。他们当中有八个人被吊死在广场上。其余的人在审讯时大概也被折磨死了。这是一段沉痛的回忆呀！可是，法西斯分子却没找到我们的地下组织。”

“您刚才说，那个老头儿又在闹事，是不是，”叶廖缅科问，“打了您？那么只好把他送往精神病医院。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人管他是不行的。”

他欠身从椅子上起来，表示话就谈到这里。克拉耶夫斯

基也站起身来，我这才看到，他的左脚瘸，走路时撑着一根棍子。后来我得知，他是在游击战中失去了一条腿，现在安的是假腿。

他领导的队伍在一次成功的佯攻之后分散撤退。克拉耶夫斯基是最后一个撤退的，他碰上了地雷，被炸掉了一条腿。当时，不可能有人来救护他。他就用皮带把腿勒紧，顺着沼泽地，穿过灌木林爬行了三公里。等到派出寻找他的同志发现了他们的指挥员时，他已昏迷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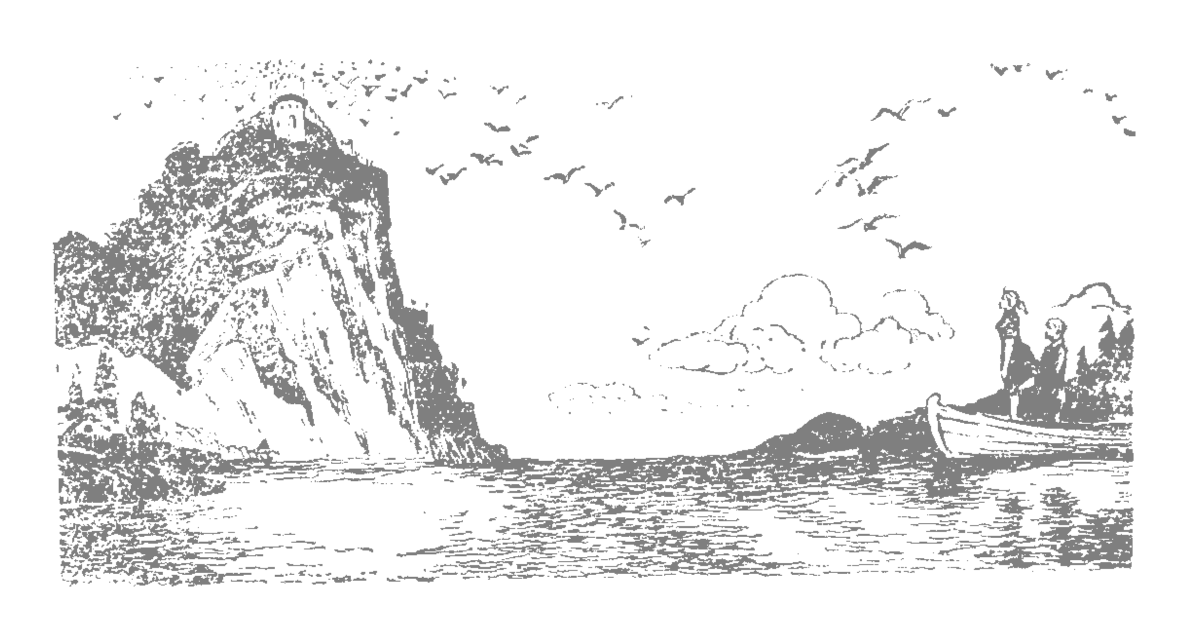
现在，他是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按月领取退休金，还担任着狩猎协会主席的职务。

我在区委会办完事后，就到街心公园去了，达济扬娜已在那儿等着我呐。我们在市内闲逛着，在市场逛了一阵子，买了许多葡萄和梨。后来，在餐厅吃了午饭。然后又去地志博物馆，在那儿认识了博物馆的经理——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玛耶娃。她建议我们去看看古老的城堡—— 这个市镇的一处游览胜地。

“我自己常喜欢到那里去，”她轻声地说“许多沉痛的往事都和这座古老的城堡有关。那里有我们青少年会面的地方。去瞧瞧吧，古城堡很有意思。还是在西基兹蒙德（‘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帅——译者注）国王在位时建造的，这已经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了。”

每天有往返于城镇和工厂之间的摩托快艇，现在离开航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所以我们采纳了老太太的建议。

古城堡在河对岸城镇的旧址，它高高矗立在河边陡峭的山崖上。要去那里，我们必须乘摆渡过河。大桥被炸毁了，



潜水人员正在进行修复工作。

我们沿着曲折的旧街道登上山岗，横穿公园来到城堡的跟前。这曾是座雄伟坚固的城堡，而现在只剩下了长满矮小灌木和杂草的黑色废墟，以及数不尽的蜥蜴栖居之地。两扇大门和部分残墙保留了下来，门上边立着用巨石凿成的盾徽。盾徽上是一只伸直的手，持着一把利剑。昔日波兰贵族们举行盛宴的宽敞宴会厅已面目皆非，只残存下一个屋角和一些从颓墙断壁上伸出的弯曲的铁条。许多拱顶全都倒塌，变成了一堆乱石，上面长满了苔藓。保留下来的只有屹立在悬崖边上的一座高大塔楼。很久以前，从塔楼上向四面八方开着的黝黑射击眼里露出炮口。当时的那种森严威然的气势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墙上长满了常青藤，射击口里栖居着鸽子，而塔楼顶上却搭满了燕子窝。当傍晚我们坐在塔楼脚下的时候，燕子就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互相追逐着，天空中一片呢喃的叫声。

我感到忧伤、惆怅。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一幅图景：可

能就在这个长椅上坐过青少年侦察员，他们在这里讨论重大的、冒 险的行动计 划。当时头顶上的燕子可能也象现在这样飞来飞去、互相追逐，下边的河水也同样地闪闪发亮……后来，他们都被处死了……

“谢尔盖,您怎么总不作声?”达济扬娜问,“您感到无聊吗？”

“我不是感到无聊，而是感到忧伤。”

“干么这样?”

“我是在想那些青少年英雄，当时他们和我们现在一样坐在这里，可是后来都被抓了起来，并且在牢房里被折磨死了”

“好啦，如果您感到这里无聊，那我们去公园吧。”

“不用了——太远啦。我们还是在这里坐坐的好。”

“您今天怎么啦？是不是这些废墟影响了您的情绪？”

“怎么说呐，可能是这样……废墟经常会引起忧郁和苦闷的心情。”

“要是能爬进塔楼里那才有意思呐，”达济扬娜忽然说道，“说不定，里边藏有古物。很可能有武器，骑士的盔甲、盖着戳子的古老手写文件……也许还有带着镣铐的骷髅呢!”

“不见得吧!”我笑了起来,“好，咱们 进去看看吧。”

我们绕着塔楼走了一圈，我想找到入口、窗子或往地下室去的通道，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门早就用砖堵死了，炮眼很高，又爬不上去，塔楼的石墙平整无缺，无法攀登。但是，从另一边，正好对着大门的那一边，我们发现离 地面不高的地方有一个炮眼。这个炮眼显然是为了从近距离抵御敌

方对大门进行攻击的。这个地方的常青藤简直长疯了，就是从近处也很难发现这里有个炮眼。我试着爬了一下，马上滑了下来。达济扬娜看着我拙手笨脚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

“您哪儿能行呢!”她郑重地说“看来,得我试试了……请帮我上去。”

我扶她往上爬。她抓住了常青藤的蔓条，然后蹬住石块突出的地方很敏捷地往上攀登着。一会儿她就爬到了炮眼上。

“这里边太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听见她在嚷。“缝太窄，头都探不进去，里面的空气太坏了……啊！我拾到一把梳子……样子真好玩。”

“喂，再接着找。说不定还能找着镜子和香粉匣。”我俏皮地开玩笑说。

“没啦，再没什么别的啦……接着！”

一个黄色的东西在空中闪了一下，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一把梳子。多么奇特的巧合呀！它使我当即想起了我曾在记者科洛米采夫钱包里见到的那把梳子。形状完全一样，象条弯背的小鱼；它是金黄色的，但有时泛出乳白的色泽。

“什么使您感到吃惊？”达济扬娜发现我困惑不解的样子问道。

“达济扬娜，告诉我，您还在哪儿看到过这样的梳子没有?”

“没有，我从来没见过，哪儿也没见过。您问这个干什么?”

“是这样，太巧啦……不久前，我看见一位记者有这样



的一把梳子。”

“说不定是他丢失在这里的？……不过，不对，不可能：这把梳子是包在纸里，放在一块石头下边的。”

“我倒想知道，这把梳子在这里放有多久了？看样子象是把新的。可纸在哪儿呢？是不是报纸？根据报纸我们能很快猜测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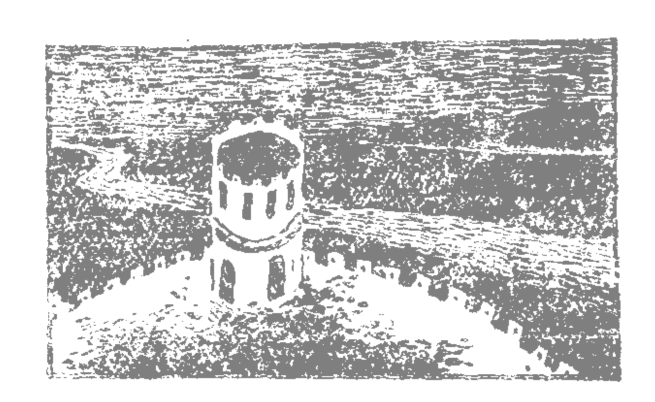
“我把纸扔了。不是，不是报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谢尔盖，我看得出，您很喜欢这把梳子，”达济扬

娜看我非常注意地端详着拾到的东西，继续说道，“好，我把它送给您吧！您高兴吗？”

我确实对这个礼物很满意，于是就把它放在衣袋里。

不一会儿，传来一阵汽笛声，我们知道，快艇已开过来了。我们从山岗上下来，买了票，就在船尾部坐下了。

快艇离岸的时候，已是晚霞归暮。和飘在码头上空的旗子成排的是铺盖着瓦顶的小白房子，还有圈着每家花园的长长的石头围墙，——一切逐渐变小并很快消失在朦胧的暮色里。只有黑色的塔楼仍久久竖立在傍晚天空的云霭之中。发动机发出单调的声响。从船尾下边成扇形散开的波浪犹如静静的水面被捏成了层层的褶纹，而夕霞映现其上，闪烁着点点红光。黄昏渐渐消失，夜幕即将降临，而当我们驶近工厂码头时，河岸附近已亮起了红红绿绿的浮标。



第四章　废弃的工事

没过几天，我们沿河而上，开始了一次真正的旅行。鼓动我们作这次旅游的是一位新相识安娜·希德罗夫斯卡娅。她是一个黑瘦黑瘦的姑娘，初看起来，人很谦恭温雅，而实际上，却非常活泼、好动。

安娜·希德罗夫斯卡娅感到闲散、无聊，就经常在达济扬娜身边转来转去，给她出主意玩这玩那。

这一次，她谈起古堡的废墟，说她亲眼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看见过它，说得我们似信非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不完全相信她的话，但去参观古堡却是一件诱人的事儿。我想，如果我们什么废墟也找不到，白去一趟，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出去走一走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从一个渔夫那里弄到一条小船。我们备好一大篮子吃的东西，随身带了个铜茶壶，几把刀子、叉子，几个杯子，还拿了照相机，一桶新酿的摩尔达维亚甜酒也没忘掉。总之，考察队装备得好极了。我们收拾东西用了不少时间，动身上路时已经十来点钟了。安娜坐在船尾把舵，我和达济扬娜轮流划桨。那天早晨天气晴朗、不热，也没有风。河水在陡峭的两岸之间缓缓流动，河岸由灰白色的石灰石构成，到处是茂密的树林。树木林立，紧靠断崖，多数树根探露在水面

之上，相互蟠结，犹如密网。在一片寂静中，木桨拍溅河水的声音和一阵阵的鸟鸣，显得格外清晰。群鸟不断从岸边的芦丛中飞出，在两岸之间擦着水面飞来飞去。这时，我们乘轻舟沿河而行，感到轻松愉快，因为还没有倦意和看够两岸的景色。这样划了有两个多小时，而古堡依然不见踪影。可是，安娜的兴致一直不减。她向周围张望并且不时地点着头，沉着地表示一切正常。不一会儿，豁然开朗，两边的陡岸向左右远远地伸展开来，河面开阔得多了，在河心出现了一个不大的沙洲，上边长满了矮小的灌木丛。我们感到有休息一会儿和吃点儿东西的必要了，于是，把小船靠泊在小岛旁，迅速拾来许多枯树枝，燃起篝火，煮开茶水，拿出鸭子、罐头、果酱、水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篮子很快就变得轻多了，而桶里的酒也只剩下个底儿。后来，我们躺在沙滩上休息，游泳，照相，又喝茶，再游泳，——最后，当我们决定继续走的时候，已经快四点钟了。达济扬娜刚一建议回家，安娜立即表示反对。她担保说，古堡就在不远处。

……又划了一个小时，在一段灰暗的悬崖近旁河水突然急转。安娜仔细观望着岸边喊道：

“这里！就是这里！……往这边，这边！

她让小船泊向左岸，这时，我们看到几个立在水里的用铁锯子固定着的木桩子。这里是以前靠船的地方。然而，任何近似城堡或堡垒的东西都未见到。

“别急，耐心点，”安娜这样说并若无其事地领着我们沿着荒芜的小道朝前走，看样子，她确实是来过这里。

路迹渐渐模糊了。于是，我们就顺着勉强辨得出的一条

小道在林间走着。看来，安娜是迷了路，可是她仍不甘心。

“从这儿也能走过去。”她信心十足地说。

脚下已无路可寻，我们就大致估摸着方向往前走。这里到处是枯木烂枝、树墩、沟壑和坑洼……忽然，前边树木稀疏了，我们马上听到了安娜得意洋洋的声音：

“快点！到这儿来！……我说什么来的？！”

来到一条树林里辟出来的宽敞的道路上，于是，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建筑物，上面堆满了白灰和乱石等杂物。这确实是座堡垒的废墟，只不过不是古代的而是现时的。我们走近了这座法西斯分子未来得及筑起的永久性工事。周围都是雨水冲坏了的、长满了杂草的掩体。深深的地槽里是已筑好了的建筑基础，因年长日久，混凝土石板都发了绿，钢制的罩板也锈得变成棕褐色了。钢筋水泥的梁架堆积成山，原木成垛。满桶满桶的洋灰因潮湿而已结成硬块，还有许许多多的钢轨、电线和木板。显然，这一切都是法西斯分子仓惶溃退时丢下的。

我们当然即刻钻进了工事，走入低矮的地下掩蔽室，从这里我们又沿着黑暗的走廊和梯道来到了炮塔和机关枪巢。这里的枪眼都面向树林。最后，从里面钻出来，到了工事的顶上。从这里可以察看到树林的东半部和沿岸的部分地带。来自三个方面的林间通道的交叉点和蜿蜒于堑壕之间的林间小道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再往远方，直到一片高高低低的丘陵地都是茂密的树林。我竟情不自禁地欣赏起展现在面前的美景来了。

“有人往这里来，”安娜说，“看，就在那边！”

沿着林间通道，有一个人不是走而是跑了过来他穿着长靴和短上衣，手里拿着枪。看来，是个看林人。他边挥手边喊着什么，不过，究竟喊的什么，我听不出来。

“他好象在喊，不让我们……不能在这里走。”达济扬娜说。

“真是莫名其妙！”安娜批驳说，“怎么，难道这是个真正的工事么？……要是不能到这里，那就该设岗哨。”

我们仍满不在乎地呆在工事顶上不动。可是，这时候风朝这个方向吹了过来，我立即听到了，说的是另一种意思。

“埋有地雷！……那儿有地雷！……不能在那儿！……”看林人喊着。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突然静了下来，并且顺原路小心翼翼地从工事里爬出来。看林人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们跟前。

“同志们，不能在这儿逛呀！这里会有地雷的。请离开……炸了你们——谁负责呀？请吧！”

我瞧了瞧安娜，可是她样子泰然自若。

“简直胡说八道！”她说。“工兵早就把雷都扫了。已经过了这么多的时候也没听说出过什么事啊！”

“可说的是啊，但并没把所有的扫光。不久前我的狗在追兔子的时候，就撞上了雷——炸得稀巴烂。要是你们想看集中营——那么，就请让我带你们去吧。”

“什么集中营？”我问。

战俘集中营，法西斯的。被监禁的人们曾关在那里。离这儿总共三公里。这里不能再呆下去啦。我不想为你们担

当责任。”

“不,集中营没什么可看的,’达济扬娜说;“已经晚了。最好我们在这儿歇一会儿就回家。”

去那儿当然没必要，就这样大家已经够累的了。我们在原木垛上找了个舒适的地方，开始吃篮子里剩下的东西为了把气氛缓和一下，我们也请看林人吃了点东西。看林人是个中年人，穿着很不整洁，满脸胡须，一副严肃阴沉的神情。他一个人坐在一边吃着，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随后掏出烟斗，抽起烟来。我开始向他询问关于集中营的情况。他显然不大情愿地回答着。

“那里关押的是一批抓来做苦力的工人，盖这个工事的就是他们。他们是怎么活着的，你们也会想象得到：比猪狗还不如。后来，法西斯分子撤退的时候，把活儿都撂下，而剩下的人都弄到德国去了。那时候，这里戒备森严，谁都不让到这里来，四外都是铁丝网和地雷，到处有警卫和军犬。有时候倒是有农民往这里运木头，别人谁也不让上这儿来。”

我望了望一垛垛上等的原木，对德寇的办、事认真，井井有条感到很是惊奇：每个原木的端面上都用黑颜色编了号。奇怪的是：号码都是个位数或者十位数的，不少是重复的而且不是按顺序排列着。数码特别象我在牢房的囚室墙上看见的那些。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是巧合，还是……要把这些数码抄下来！无论如何也要抄下来！可是怎么抄呢？我既没有铅笔，也没有纸，而更主要的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抄。我马上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可以借给我的同伴们照相为名，把原木照下来。我让姑娘们坐在原木上，可是要让她们


13
25
50
29
23
40
41
4
26
16
33
24
49
31
17
6
36
20
48

的脚别挡住数码，于是，先拍了一垛原木，而后借口第一张光线不好，又拍了另一垛。现在，一切都已办妥，我们就回家了。说实话，我还看到有几垛带数码的原木，可是不打算把它们都拍下来了。

看林人领着我们先顺林间通道走，后又顺大路穿过树林来到河边，而我们沿着河岸又走了好久，才到小船停泊的地方。迂回绕道而行，整整用了两个钟头，而当我们坐上了小船，离开河岸往回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午夜以后才到了家。房主早就为我们焦急不安了。

尽管我很劳累，但并未躺下睡觉，而着手冲洗胶卷。

照片拍的不怎么样。我甚至都没把照片拿给姑娘们看，只是告诉她们说，没照好。再说，照片上也没什么可看的，因为拍进照片的只有她们的几只脚。

乘无人打扰的时候，我对写下的数码开始分析、研究起来。少年时，我对这种玩艺儿就很感兴趣。古代用过的种种秘密符号书写法我都熟悉，当时称之为“字母互代书写法”，还有现时常用的密码书写法我也清楚。凭借自己的经验，我估计能弄清这些数码所表示的内容，因为材料是足够的了。我还保留着在牢房囚室里抄写在糊墙纸片上的数码。糊墙纸纸片上有一处记下的是：

17 15 11 12 3 16 37 13 12 48 10 28 24 37
9 40 16 5 7 21 17 31 41 35 22 1 14 45
4 26 36 2 10 21 7 10 4 44 17 40 30 21
34 20 52 50 3 2 49 35 7 50 45 10 2 5
20 48 12

另一处记下的是：

35 15 8 17 24 1 2 31 11 50 10 48 41 43 31 1

49 40 43 48 45 35 21 3 4 13 22 48 5 27 7 1

11 12 10 23 36 50 40 48 5 43 34 37 7 41 22

51 49 43 26 4 3 12 44 43 47 27 45 35 2 25 23

12 52 35 3 2 46 2 23 21 24 33 52 49 50

13 43 3 50 11 20…… （下面的数码我没有抄完）

照片上拍下来的木垛是由五排原木、每排六根堆成的。借助放大镜我辨清了第一垛的数字是：

4 3 35 13 25 50

10 11 29 23 40 41

35 22 4 26 16 33

15 6 24 49 31 17

44 6 36 20 48 12

第二垛：

25 35 48 10 50 29

40 2 33 3 30 5

13 7 48 12 36 6

15 4 48 24 17 31

50 18 — 20 48 12

对照后，我马上发现，使用的都是一种密码，可是我也意识到，我未必能解译这些密码。如果设想，每个字母是用一个固定的数字表示的——这是不可能的。俄文字母表中总共 32 个字母，其中包括 Ъ，Э 和 И，而密码文中从 1 至 52，除去 38，39 和 46 这三个数字，却有 49 个不同的数码。

假如在密码文中数字的总数正好同字母表中的字母数量相同，自然可以认为，这里的秘密就是用一个固定的数字来表示一定的字母。这样的密码是不难识破的。只要统计一下密码文常出现的某些数字，再把统计的结果和俄语中字母重复率的统计作个对比就行了。但是，这种方法用在这里行不通，因为密码文中的各种数字几乎比俄文字母多半倍，显然，密码是另一种类型的，所以，要把它识破我是无能为力了。

我唯一的发现是：每一段完整的密码文都是以 20，48，12 这三个数字结尾的，这就使我猜想到，这可能是个落款。我又想到了自称为“青少年爱国侦察员”这个秘密团体，并推测这三个字是表示“ЮРП”(Юные разведчики-патриоты的缩写——译者注）。这一点看来是相当可能的了，可是，这同我原来认为数字不可能表示字母的猜想就矛盾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伤了一天的脑筋，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意识到，解决这个谜，我是无能为力的。

第五章　废矿场上的尸体

我忽然想到，应该去拜访一下谢尔多宾一家并和托利亚的母亲谈谈，也可以同谢尔多宾本人攀谈攀谈。但是不知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说不定他们那里能找到什么能够解译密码的材料。

次日，我带着手中全部有关的材料奔谢尔多宾家而去。他们住在工厂的另一端，旧厂子的工人住宅区。

他们的小木房位于镇子边上的沟壑旁，四面满是艾蒿和荨麻。我敲了敲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妇女，头发梳得平平整整的，面容苍白而严肃。她身后站着一个漂亮的男孩，也就十六岁的样子，看来是她的儿子。这是托利亚的母亲克谢妮娅和他的小弟弟别佳。小屋里整齐而清洁。感觉得出来，谢尔多宾一家是不愁吃喝的。他们一家按期领取相当多的补助费，因为他们的儿子是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但是，家中充满了一种低沉而悲痛的气氛：在我和他们谈话过程中，母亲和儿子从未笑过一次。

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我是想要知道，托利亚不在后(我本想说“：托利亚故去之后”,可是收住了口),有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材料，如日记本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并说明这些东西会有助于我来弄清楚某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有

他留下的笔记本，或是一些他写过的什么东西，我很想看一下，并表示对他们给予我的任何帮助，我都会非常感激。

托利亚的母亲两眼看着下方，站着一动不动。

“没有，什么也没有留下，”她终于回答说，话音中露出一种反感的语调。“当时一切都被抄走了。剩下的一些东西，后来我们自己也都给毁掉了……也许，别佳那儿有些什么？”

“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别佳说。

“或许，谢尔多宾会告诉您些什么，他现在的病情好些了。可是，他出去已经两天了，一直没回来。可别出什么事情啊！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您另找个时间再来吧。”

我感到很难堪。我为给他们添了麻烦表示道歉并告别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院墙的小门响了一下，听到外边有一些人说话的声音，接着，几个人走进了屋子并犹豫不决地站住了。

“怎么啦？出什么事啦？”克谢妮娅惊恐地望着进来的人们问道。

那些人没有作声。

“谢尔多宾在什么地方？”

“您可别着急，克谢妮娅·瓦西里耶夫娜，”有一个人终于说道，“我们在露天采矿场找到了谢尔多宾……他摔倒了，摔坏了。”

“摔死了？”

“是的，已经断气了……”

不幸的女人苍白的面孔变得毫无血色，象张白纸似的。

她猛地一动，抓起头巾，不顾一切地从房子里跑了出去。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马上跟了出去。别佳跑在最前头。

旧的露天采矿场离镇子大约有半公里，能用的泥灰岩早



已全部采完了。现在正在别的矿区采掘，而这里甚至夜间都没有一点灯火。

我们顺着已舍弃的窄轨铁路直下到露天采矿场。

在一边儿，紧靠沟壑的地方有两台机器，就在机器旁站

着一些人。在人群中我看到有两个民警和一个穿着公安人员服装的人，他带着少校的肩章。人们给我们让开了路，我立即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两只胳膊僵硬地摊开着，穿着一身又脏又旧的衣服。他的脸和整个头部都浸在血泊之中。

“真是不幸呀！”人群中有人说道，“怎么就没想到把采矿场圈起来，连灯都没安一盏！现在夜里很黑，就是正常人都会跌下去的，更不用说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啦。”

我觉得，谢尔多宾未必会因失足而摔死，因为我想起了他是多么敏捷地从脚手架上跳下来的情景。

“未必是意外的失足，”我说，“从脚手架上跳下去的时候，他动作很敏捷。我想，他是自己有意跳下去的。”

“这也是可能的……很难想象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能做出什么来。可能这是自杀。”先前说话的人同意地说。

少校看了我一眼，走到我身边和我拉手。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同志，您好，”他微微笑了一下说道，“您还认识我吗？”

我面前站着的是过去我们学院保卫科科长罗日科夫。尽管几年没见，我还是马上认出了他：战前，他在我们学院工作，后来上前线去了。

“认得。您好，罗日科夫同志！真没想到会遇见您！您现在在这里工作？”

“不错。我是这个区的特派员……非常高兴又同您相遇。我对您是记得很清楚的。您怎么到工厂来了？”

“是的。调我来的。可是还没有开始工作。现在正闲着没事儿。决定在这里休假。”

“那太好了，”少校把我略微拉到一边，继续说，“我听说，您曾碰见过这个死者，好象还和他打了起来？您把情况谈一下。”

“是这么一回事。夜里他和我干了起来。看来，当时他是看错人了。我好不容易才摆脱开……一个不幸的人呀！”

“如果您没事的话，”罗日科夫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倒想占您一些时间。我想详细地了解一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一句话，需要您的口述，以便核实一些情况。咱们走吧！离这儿不远。”

我们坐上汽车，过了一刻钟就来到市内公安局门口。少校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请我坐在一把安乐椅上，而自己坐到了写字台前。

他双手托着两腮，默不作声地坐了一会儿。现在，我可以把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成熟多了，看来，比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变老了些而且显得比他实际的岁数要大，不象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刮得干干净净的脸经过风吹日晒，露出倦怠的神情。两道浓眉下一双灰色的眼睛看上去严肃、甚至冷酷，可是，嘴角上总带着几乎看不出的一丝笑意。

“好啦，讲讲都发生了什么事吧。”他抬眼看着我说道。

我把夜里和老头谢尔多宾之间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也谈了关于这个疯子几次喊出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少校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决不是荒诞的臆造，”他沉默片刻说道，“这句话可能有着重大、非常重大的意义。他的儿子托利亚在牺牲的最后时刻，站在绞刑架下，脖子上套着绞索时，曾向整个广场喊

过这句话。当然，目睹儿子被绞死的惨状，这不幸的父亲就记住了这句话，尽管他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可是一犯病时就要重复它。好了，现在来谈别的吧。我是想建议您……您见过谢尔多宾的小儿子别佳吧？”

“见过。”

“那么，我告诉您，我们觉察到，这个别佳是知道涉及一个重要情况的秘密的，关于这一点我先只字不提。不过，他知道而不说，这是为什么呢？多半是由于害怕。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肯定正处于危险之中，他可能遭到和他父亲同样的不幸。”

“自杀？”

“怎么会是自杀？谢尔多宾是被害死的，而不是自杀的。”

“被害死的？!”

“明摆着的。夜里他被诱骗到露天采矿场并被扔了下去。他搏斗过，手上有抓伤，扯破了的上衣袖子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他的鸭舌帽在矿坑上头，掉在一边。难以想象，他自杀前先把鸭舌帽扔开……他是被害的。不过，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就让自杀的说法传开吧。明白吗？”

“我一定不说。”

“我相信您。那么，您尽量想办法取得男孩的信任，可能他会透露给您些什么。注意他到什么地方去，都同什么人接触。从这里得到的任何一点线索对我们都会有极大的用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对这些匪徒来说，一个贫

苦家庭出身的小男孩会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匪徒。这里的问题可是事关重大呀，是政治性问题。关于法西斯分子统治时期在这里活动的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组织的事您听说过吧？”

“听说过。可您知道吗，少校？他们有自己的暗语，自己的数字密码——用这些东西进行联络。这是克拉耶夫斯基对我说的……”

“是的，是这样。这个我们知道。密码都是用煤块或粉笔写在院墙和其他地方的，有的干脆就写在地上。只是写在地上的那些几乎没有留下来的了。”

“可是，这种密码文我抄下来了不少，先是在旅馆里，后来又在别的地方……”

“在旅馆里？”

“是的……也就是在过去的盖世太保集中营里。在最末一间小的死刑囚室里。数码写在板床后下边的墙上。这些床铺被拆掉以后，我看到并抄下来……一部分。”

“还在什么地方有？”

“还有——在未建成的工事旁边的几堆原木上。您知道吗？我们到那儿去玩过……”

“这些密码文您可带在身边？”

“是的，在这儿，带着呐。我带着它们去谢尔多宾家的。”

“请给我看看。”

第六章　奇怪的数字

我们把用密码书写的东西都摊在桌子上并出声地念着。

“当然，”少校说，“这不会是一般的秘密符号。这是拿49个不同的数字代表32个字母。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不是根据一定的密码表和固定的暗语译成的密码文。若是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同样的数字。而且当时爱国青少年用这类办法也不合适。因为在严格的秘密活动条件下彼此用固定暗语联系是很难的，而且保藏密码表也是极端危险的。他们需要用一种较为简便的方法，并且要考虑到，敌人对他们写的东西根本不会加以注意，况且也不会去解译这些密码。值得考虑的倒是这样一种方法，譬如，’罗日科夫说；“在一本熟悉的书里找一段话，或者更简单的办法是，随便选定一句话，把它背熟，而不作文字记录。按其中字母出现的先后次序对上数字。如果某一个字母在这句话里只出现一次，表示文的数字就只能是一个，而出现多次的字母，就其出现的先后次数，就得用不同的数字表示。也就是说，表示同一个字母的数字不是固定的。这种密码就不易解译了，特别是，如果占有材料不足的话。这样，我们既然想要解开密码的谜，就必须得知当时他们记熟了的那一句话这是关键。而我想，我们是知道它的……您记得，老头儿谢尔多宾喊的

是什么吗？”

“就是关于埃费斯王国的那一句吗？我记得。”

“记得确切吗？”

“确切。”

“那么您说吧，我把它记下来。”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他听着我说，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着，在每个字母下边顺序对上数字。结果是这样：

Я	м	о	г	у	ч	и	й	б	е	с	ц	о	щ	а	д	н	ы	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ю	н	о	щ	а	ь	о	ж	д	ъ	з	а	х	в	а	т	и	л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Э	ф	е	с	с	к	о	е	ц	а	р	с	т	в	о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我是力大无穷、残酷无情的青少年领袖，埃费斯



王国已被我占领。）

“现在，让我们来试着分析一下写出来的东西。”罗日科夫说。

记得，我们心中是多么着急而紧张地把写满了数字的几张纸摊在桌子上并且开始解译这些密码。我们完全成功了。我拍下来的第一垛原木上的数字表示：

“六号夜里两点请你们做好准备。ЮРП （青少年爱国侦察员）”

第二垛原木上写的密码解译后表示的是：

“第三辆大车里是手榴弹。ЮРП”

“太妙了！”罗日科夫叫了一声“这证实了我们的估计是对的……先前我就猜想，这些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数字准有解谜的意义，但是，我还没占有验证自己揣测的材料。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您看：短短的一句话中包括了字母表中的全部字母。字母‘a’可以用五个不同的数字来表示，而字母‘o’可以用六个数字，也就是说，可以用 31，13，22，26，44 和 52这六个数字表示‘o’。非常巧妙！再说，那句暗语又很容易记住而且记起来还象是句无聊的废话。好啦，现在我们算是知道青少年侦察员密码的秘密了。他们显然是通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一个自己的同志说，武器已运到，并且

六号夜里要行动，'罗日科夫解释说“这里说的是，一九四四年春我们的一支游击队为了解放战俘，准备进攻这所集中营。同被关押人取得联系的事就委托给 ЮРП 了。而他们呢，就利用了农民搬运砖和原木的机会，想出了这种非凡的方法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不过，那次的夜袭未能发动，因为游击队员们没有得到约定的信号。计划在最后一分钟才被敌人看穿。当时，青少年爱国志士中的许多人都被捕了，而其中就有托利亚·谢尔多宾。毫无疑问，有人出卖了他们。所有这一切过去我们就知道。不过，您说，在尚未建成的工事旁还有其他带数字的原木垛，是吗？”罗日科夫又回到中断了的话题上来。

“是的，我看见还有一些。”

“这些都必需抄下来并译出。或许，还能发现什么新情况……喂，现在我们来弄清楚牢房墙上的那些密码。”

第一处的内容是：

> “贝都英人卑鄙地把我们出卖了。他的真名我不知道。你们要为我们报仇。ЮРП。”

“这就是叛徒的名字。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名字！当然，这还不是他的真名，而只是绰号，他的暗名。可是，我们已有了初步的收获。怪不得疯老头儿如此咬牙切齿地喊着这个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病态的想象中出现了他臆念的叛徒形象时，他就向我扑来的缘故……不过，‘贝都英人’，只要你还在人世，我们定会找到你的，而且我们一定要彻底报

仇！”

我一面瞧着我们用巧妙的方法解译出来的这两行字句，一边这么想着。我望了罗日科夫一眼。他面容严肃。看来，他也在这么想。

“您还有什么情况吗？”他中断了沉思，问道。

我把抄下来的最后一份密码文给了他。

我们解译出来的头几个字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注意。很快我们就明白了，这里有着意义极为重要的情报。做完解译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材料的内容是这样：

“有一个秘密武器地下工厂。要快，按里索夫斯基的手指出的方向。МВШ。然后从这里向东，ИМШ……”

“接下去是什么？”少校问。

“接下去我没抄下来——没来得及。不过，牢房墙上所有密码文早已拍了下来，都收藏在市委。有人这样告诉我的。”

“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这儿收藏着，并没在党委会。不过，都不是我们拍下来的。可是，我不记得那里有密码文咱们现在拿来看看吧。”

少校拿起内部电话的听筒，命令把城市解放后在盖世太保驻地拍下的材料档案拿来

“可能，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他继续说着，“外国报刊上透露过一些报导说，法西斯分子在乌克兰西部某地留下了地下工厂，可是直到如今我们尚未发现它的任何线索，当

然，’他再次仔细看了看密码解译文，接着说道“这里有好多地方弄不清楚。譬如说‘里索夫斯基的手’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两个令人不解的‘МВШ’和‘ИМШ’。不过，我们总算是扯住了线头，这就有希望把整个线球捯开来。我们来看看，档案里有些什么材料吧。”

这次努力的结果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在少校的助手赫鲁廖夫中尉很快就拿来的厚厚的档案卷宗里我们找到了一连串盖世太保大楼的外景、内景和近景的照片。还找到了办公室、走廊、地下室、囚室的照片、墙上写着密码的照片——照得很好而且很清晰。最后一间小的死牢也拍了下来，里边有简陋的桌子，上面放着一把铁壶和几个杯子，以及肮脏不堪的光板床。几面墙上都很容易就能看出有一些密码文，但是，板床却挡住了墙的下部，所以，我们所需要的这一部分密码一点也看不见。

少校把档案册合上，放在一边。

“当时没想到把板床搬开，”他懊悔地说，“非常遗憾的是，您当时匆匆忙忙，没能把这部分极为重要的材料都抄下来。那里还有好多没有抄下来的吗？”

“就剩下两行。”

“整整两行，真糟糕！我担心，您的疏忽将无法弥补。旅馆已经修缮完毕，所有密码文也都刮掉了。”他干巴巴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我从未有过象这样难为情的感觉。怎么竟会如此疏忽！我本来很清楚，墙上写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究竟为什么我要相信那个陌生人的话呢？

少校瞧着我并神经质地用铅笔敲着桌子。

“您那里还有什么材料吗？”他最后问道。

“没有，什么也没有了。”

“真糟。有什么办法！那我们就根据现有材料来解决难题吧。”

他从桌子里取出一本厚书，拿起铅笔，埋头干了起来。

由于整天奔忙和激动不安，我坐在安乐椅上打起盹儿来。当我醒来的时候，晨曦已映现在窗上。少校仍然趴在桌子上工作，桌上堆满了纸，台灯一直亮着。三个盛茶水的杯子放在桌子上。从窗子映入的晨辉和台灯的光亮交融在一起，照在他的脸上，他的脸色灰白，显出疲惫的样子。他看到我已睡醒，就转过身来，朝着我说道：“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同志，在您睡觉的时候，我有了新的发现。我把莫名其妙的‘МВШ’和‘ИМШ’两个字的意思琢磨出来了。”

“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字指的是数字。这些字用不着解译。您来看。和这六个字母相对的数字是：2，25，23和36，2，23。可是，23这个数表示的字母‘Ш’要译出来。这个字母可以理解为‘步子’（ωar）这个字的缩写，而头两个数字表示225和362。看样子这里说的是，要按那个‘里索夫斯基的手’指出的方向走上多少步。猜出这一点并不难。可是，这个‘手’是什么——我还是想不出来。查询多次，可至今毫无结果。最近这二十年，无论在市内、在工厂，还是在郊区村镇上从来都没住过叫什么里索夫斯基的人。告诉我，”他突然问我，“您没有向任何人说过关于ЮРП用的密码文吧？”

“没有,没说过。”

“没向任何人说?”

“没向任何人。”

“也没向任何人写过这方面的事?”

“没有,我什么也没写过。连照片也没给人看过。”

“也用不着向人说。现在这样吧,请回家休息一下。今后还得从别佳那儿入手。想方设法查明,他是否知道谁是‘贝都英人’。和他谈话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提一下这个词,然后注意观察,是否他会露出什么马脚,是否显得困窘,会不会突然愣住。而关于‘里索夫斯基的手’,最好根本别提,这样会谨慎些。就是要极端慎重地行事。还要记住,要保护他。他可能正处于危难之中。”

我明白我可以走了,自己再在这里呆下去已没有必要,于是我站起身来,打算回家了。由于睡的姿势不舒服,我的手脚都麻了,而且头也象注了铅似地沉重起来。我整了整衣服,又到镜子跟前梳理头发。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我看看您的梳子!”我听到少校大声说。“这梳子您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们找到的……我是说,达济扬娜找到的,后来送给我了。”

“你们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呢?”

“在古城堡,一座炮楼里……在朝向城门的一个炮眼里。梳子是包在纸中,压在一块石头底下的。”

少校一言未发,打开了公文包并从中取出一把同样的梳子。他把两把梳子摞在一起,比,发现两把梳子一模一

样，无论是大小，样式和颜色都一样。只是少校的那把上面有些划痕，磨损得也很厉害。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着。随后，他站在我面前问道；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爬到碉堡的炮眼去查看呢？”

“这很简单。我想好好看看青少年侦察员碰头的地方。万一…”

少校的目光中闪现出喜悦的神情：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您真是好样的！为了这一点，我要原谅您上次的疏忽。把梳子拿去，可是不要把它给任何人看。请记住，不要给任何人看！这把梳子可能有着特别的、非常重要的意义。谢尔多宾老头儿是不会无缘无故把它如此小心地保存起来的。”

“您那把梳子是在谢尔多宾那里找到的？”

“是的，在他那儿。确切些说，在死者的身上。他把它缝在了上衣的衣衬里。非常有意思的玩艺儿。”

我们告别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忽然说道：

“您把梳子交给我保存吧，您看好吗？这样会安全些。”

“当然可以。我告诉达济扬娜说，梳子丢了。”

“别，不要马上这么做，”他笑了起来，“如果她本人问，您就告诉她，放在家里找不着了，您就说丢不了……总之，尽量少说起梳子的事。”

我回家去了，夜里和少校的交谈使我深感激动和不安。

第七章　集上的巧遇

我竭力想同别佳接近。可是做到这一点却很困难。别佳人很孤僻，同任何人也不交往，不爱好运动，总是呆在家里看书。每当我到谢尔多宾家时，他待我总是很有礼貌的，但从来不笑，不说话，并且看得出来，我到他家使他感到负担。他对我持有戒心，而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知该怎么接近他。

有一次，安娜意外地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建议去一趟拉诺夫齐村集体农庄的集市。这个大村子离工厂相当远，有三十六公里，可是从厂子到那儿有班车往来。有集的时候，汽车每半小时发一趟。安娜自己提出，要请别佳一起去玩。

她说："这个孩子自从他父亲死后变得愁眉苦脸的，整天闷闷不乐，应该叫他散散心。我们带他一道去！我自己去叫他。"

"这不大好办到。"我原来这么想，可是，我估计错了。

别佳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马上欢快起来并很快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辆汽车，乘客满满的。车开得很

快。宽阔的公路两旁种的都是杨树。我们看见地里的庄稼已收割了大半，收割机这儿一辆那儿一辆地移动着，大车载得满满的，晃晃悠悠、慢慢腾腾地从地里运粮食。

风景如画的拉诺夫齐村座落在山坡上，靠近一个小湖。当我们接近村子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布满了无数五颜六色的苫布的集市，那些白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和黄色的苫布使人眼花缭乱。整个集市场地，从村头到湖畔到处都是货篷、柜台、大车和汽车。为了避免灼热的阳光，在大车、汽车上边或者席地而坐的售货人头顶上处处都架撑着苫布。

“真好看啊!”达济扬娜感叹地说“真象吉普赛人的露营地。”

“贝都英人的营地许能更好些。”我这么说，同时注意地观察着别佳。

可是，别佳却无动于衷，他没有打愣儿，面部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甚至都没回头看一眼。

汽车停在村子边上。我们下了车就到集上去了，走在许多车摊中间，车上满是黄瓜、绿辣椒和老玉米；我们从芳香的甜瓜和西瓜旁边走过，这些瓜成堆地垛在垫子上；从卖鸡蛋、卖鸡的女摊贩旁边走过，鸡都被捆绑着爪子，无可奈何地躺在尘土之中；我们还看到从小篮子里伸出长脖子的鹅和哼哼着的猪、尖声嚎叫的小猪仔。我们小心翼翼地绕着摆在地面上的陶土器皿走，这些器皿上都涂饰着鲜艳的、各种颜色的花纹。我们在卖娃娃、小猫、笛子和哨子这类玩艺儿的商贩中间挤来挤去。人山人海，到处都能听到叫卖、吵闹和讨价还价的声音。乌克兰话和俄语混杂在一起。

对大车上的货我们不大感兴趣，就朝货篷走去。那里，柜台上有新鲜的面包，一块块呈淡黄色的乌克兰大油，木碗盛着的酸凝乳，包在牛蒡叶里的黄油和蜜，一群群蜜蜂嗡嗡地在上边飞绕，有盛在大长颈玻璃瓶里新酿的甜酒，干鱼和熏鱼，整张的烟叶。再看下去——一堆堆成山的鲜红的西红柿、发青的茄子、苹果、李子，还有很多葡萄，品种不同，颜色各异。我们买了几公斤葡萄，接着又去看卖纺织品、成衣和估衣的货篷，最后，从这里奔湖边走下去。

安娜一定要靠水边坐一会儿，照她的说法，那里凉快些。别佳和她一起坐到那儿。我就同达济扬娜到上边小树林里去了，坐在树荫下休息。不远的地方有个售货亭，那里卖冰淇淋。我们买了几份味美可口的带有胡桃仁的雪花冰糕，就吃了起来。

我们的那两个同伴在太阳地里坐了一会儿，也凑到我们这儿来了。

“哦！他们原来在这里吃冰淇淋！”安娜喊道，“太妙了！有胡桃仁的吗？……你们从哪儿搞到的？”

“就在那边那个贝都英人的售货亭里。”我指着黝黑的售货员说，而这个人也确实象阿拉伯人。

别佳跑去买冰淇淋了。这次，他脸上仍未显出惊异和窘迫的神情。

“这和贝都英人有什么关系？”达济扬娜用不大高兴的口气说道，“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您今天干嘛老是把贝都英人挂在嘴边上？”

“别佳不知道‘贝都英人’这个暗语，”——我想了一下。

自己说的蠢话倒使我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太阳晒得实在难以忍受。从湖上拂来阵阵的凉气，我们忍不住，就决定到湖里去洗个痛快。姑娘们到女浴场去了，别佳向男浴场跑去。我正想跟别佳一起去，忽然有人喊了我一声。我转过身来，看见了罗日科夫少校，这使我感到惊奇。他穿着一件旧便服和一双穿破了的半高腰皮鞋，没戴帽子。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

他朝我使了个眼神，随后向一个空货篷后边走去。

“来，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欣赏一下我买的东西，”他轻声说道。“怎么样，您喜欢不？”

我把包裹打开，看见一件漂亮的、大号、灰绿色、全新的、看来很贵的上胶的雨衣。只是雨衣上的扣子是便宜货——一些普通的、平面黑色的扣子。

“怎么一回事儿，”我问，“罗日科夫同志，您从哪儿搞来的这件雨衣？”

“我在寄卖商店里买的。绝妙的、基辅厂出的全新的货。您发现上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扣子！这些扣子不是这件雨衣上的。”

“对了这些扣子是在这儿、在集市上买的，刚不久前才缝上的，而这个缝扣子的人，看得出来是不会做针线活儿的。原来的扣子拆掉了，从衣服上留下的线头就能看出来……嘘！”他突然把话中断。“您得走开……以后我们再见面。需要的时候，我会通知您。我问您要不要雨衣……”

我转过身去，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别佳。别佳没有朝我和少校看，他慌恐的目光直盯着少校拿着的那件雨



衣。我走到孩子跟前。

“这人是谁？”他问。

“不知道……他……他问我要不要雨衣，我要它干什么。”我回答他并竭力使自己的声音镇静自如。

别佳立即变得没精打彩。他没去洗澡，一个人沿着河岸缓步走着，直到姑娘们洗澡回来为止。后来，我们到食堂去吃午饭。过后，又坐在树荫下吃葡萄。安娜因天热和在人群

里挤来挤去，头痛了起来，所以她打算回家。我本想留下来，希望再同少校见面，但后来决定，顺从大伙儿的决定更合乎情理些。我们乘上公共汽车回家了。

大家都累了，都没有情绪聊天。安娜总说头痛。别佳愁眉苦脸地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八章“里索夫斯基的手”

我同少校在集上相遇的时间太短暂了，所以我没来得及从他那儿了解到什么，也没能向他汇报自己和别佳几次接触的情况。而且我觉得，他也不会认为我和别佳的谈话有多大意义。使我深感苦闷不安的是，直到如今，我一点儿也没告诉少校关于记者科洛米采夫有一把梳子，而且那把梳子和我们在塔楼里找到的梳子异常相象。当然，我不能完全肯定．这两把梳子完完全全一个样；但是，我总不该不说出两把梳子是相象的。那天夜间在少校办公室里，我想到了这件事，可是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解译密码上，就忘记说了。现在，我等待少校找我，因为我不能随便到他那里去。打电话吧，也不行，发信我也担心。我只有在苦闷的无所事事之中消磨时光。达济扬娜注意到了我的情况。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您这个人怎么变了，”她说，“您变得有些奇怪了，也不散步，也不看书。您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象个钟摆似的。您出了什么事啦？走，咱们用拉网去捕鱼吧。”

可是，捕鱼也无济于事。我感到，市内发生重大案件，一心想投身其中。我判断得不错。几天后，当我同少校会面时，我知道了这些日子市里发生的一切。为了不致搞乱事件

发生的先后顺序，我就一件接一件地记述吧。

寻找姓里索夫斯基这个人下了不少功夫，但是，毫无结果。姓这个姓的人无论是市内，还是郊区，无论是现在，还是法西斯分子统治时期或战前都不曾有过。少校无计可施，然而必须解开“里索夫斯基的手”之谜这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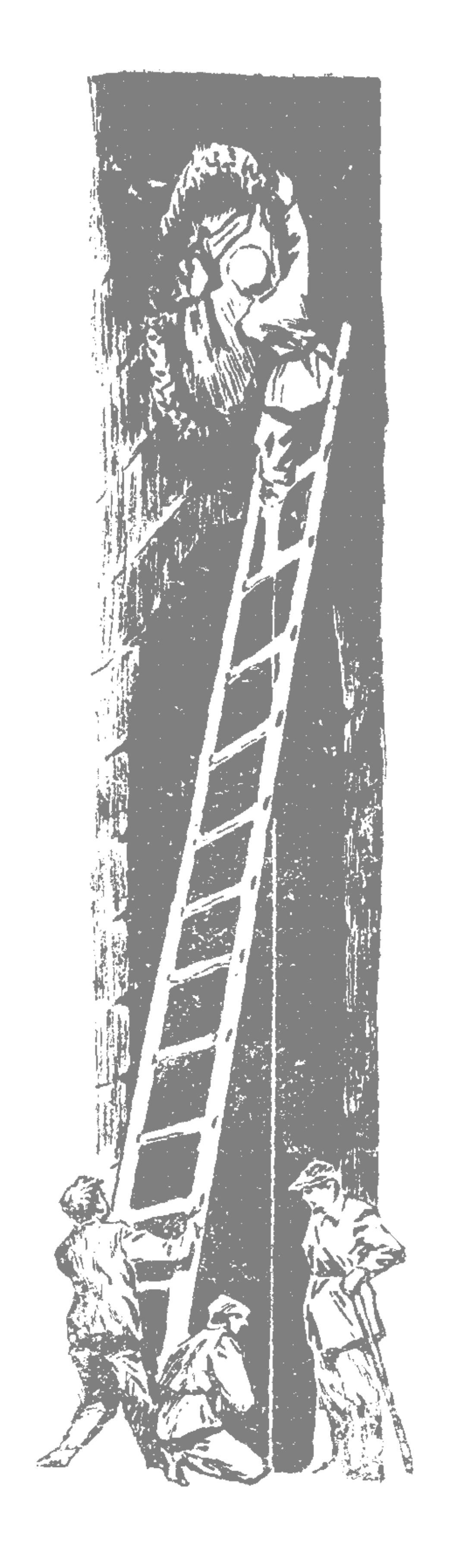
所以，返回市内之后，他马上就去找克拉耶夫斯基商量个办法，因为克拉耶夫斯基是当地的老住户。他们二人又是战友，一起打过游击。

克拉耶夫斯基对谢尔多宾老头儿的死已有耳闻，但是，他并不知道，老头儿是惨遭杀害的。他仔细地听完了罗日科夫讲的关于解译青少年侦察员密码的事，对“里索夫斯基的手”他是这么解释的：

“里索夫斯基——这是一个古老的波兰贵族的姓，是波兰的大地主户，曾经有个时期整个城市都归属于他们。古城堡远古时代也属他们所有。在城门上还保留着他们的盾徽——一只手拿着一把剑。这会不会就是‘里索夫斯基的手’？”克拉耶夫斯基对自己的推测也笑了起来。

然而，这种推测也不能说完全是虚构的。许多神奇的传说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和这个古堡有关。今天这个事件为什么就不能和它产生联系呢？德国人走后谁也没有认真地到那儿去调查过。古堡里可能有地下室、无人知晓的密室、地道……

“罗日科夫，咱们走，”克拉耶夫斯基起身说道，“别浪费时间。要去查看一番。天下无奇不有，难说呀！说不定，谜



底就在那里。”

少校给赫鲁廖夫中尉打了个电话，命令他随身带上卷尺、指南针和测锤，马上来，还得想办法弄个梯子。然后他们片刻不停地立即出发，直奔城堡而去。

古老的城门洞足有六米来高。石门洞的正上方有一个在石板上凿出的盾形城徽，宽一米半左右，高有两米。盾徽上有一只手持着剑的浅浮雕。赫鲁廖夫顺梯而上，然后，以浮雕的两端为固定点，分两次将测锤垂放下去，在测锤点地的两处钉上两个橛子，少校根据两个橛子测视了方位。

“应该朝那边那所房子的房角去，”他说，“‘里索夫斯基的手’指的是那个方向……人迈步的一般跨度，”他接着说，“平均是六十二公分，就是说，二百二十五步合一百四十米。这么计算要方便得多。走吧，中尉……”

他们顺着马路走下来，随后，拖着卷尺带，翻过一堵围墙，

站在了院子中央。到这里正好是一百四十米。从这里看着指南针向东走去，很快就来到了河边。再往前，无路可走了。终点在水里。

“显然是白费事儿了，”少校说，“我们大错特错了。想必盾徽和‘里索夫斯基的手’无关。”

“我们这一套土办法看来是不行的，”克拉耶夫斯基同意说。“应该请教懂得这些盾徽的专家去。罗日科夫同志，你看，谁对这里的古迹有所了解？”

“玛耶娃，博物馆馆长。这是她的专业。而且她早就住在这里，对周围地区了若指掌。”

“那咱们去博物馆吧！”

……老太太听完了这些非同一般的来访者的话后说道：

“里索夫斯基是波兰小贵族阶级的姓氏，现在已经绝代了，他们的世系中有十字军骑士。城门上凿的那个盾徽不是完整的：那只是一只手持着剑。完整的里索夫斯基盾徽称作‘隆卡’，是这样的：盾徽的蓝底上左边有红色的火焰，一只罩着银铠甲的手从中伸出，持着一把银剑。下边写着拉丁文：‘Igni et ferro’。意思是：‘用火和剑’。市内有几个这样的盾徽。两个在墓地，一个在老广场的喷泉上边。还有几个盾徽在昔日柳别茨基庄园的大门上和庄园里马厩的进口处，另一个在拉诺夫齐村的老教堂上。在所谓的‘和睦之柱’尚未倒塌的时候，上面曾有过一个盾徽。”

“‘和睦之柱’是什么？”少校问道。

“过去，里索夫斯基家族和扎越尔斯基家族为了纪念他们之间结盟而修建的古老的大纪念碑。是个带有这两个家族

的盾徽的石头圆柱子。”

“是的，是的，”克拉耶夫斯基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柱子，好象它早就倒塌了。”

“纪念碑当时已经残缺不全，可是德国人把它修复了，后来败退时，自己又把它炸毁了。”

“这个圆柱到底座落在什么地方？”少校问。

“在奥列戈沃至杰尔卡奇大道附近，离杰尔卡奇村约有六公里路，在树林里的一个小山上。”

“离德寇集中营不远。”克拉耶夫斯基解释道。

“这很有意思！柱子毁得可厉害？”

“是的，没剩下什么了。”

“太遗憾啦！……也许您这里保存着有关它的什么图样或照片？”

“照片可能找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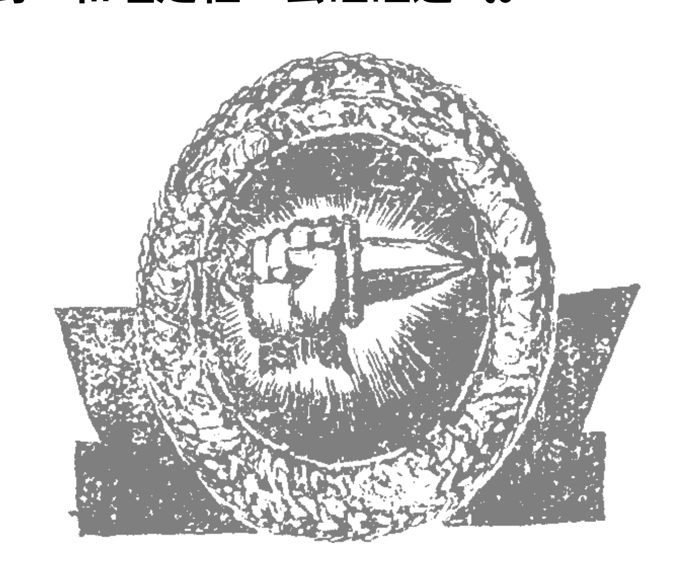
玛耶娃取来几张大纪念碑的照片。在一座不高的圆柱基脚上竖着一个石头柱子，柱顶上有个盾形的木板，两面都是徽标——样子非常美观。这几张照片照得都挺好，但是，这些照片上纪念碑的背景都是天空，——这就无法得知，从什么地方来确定持剑的手所指的方向了。照片全然无用了。少校对玛耶娃说道：

“我们需要的是柱子和周围的景物拍在一起的照片，而且能从上边看到里索夫斯基的盾徽，哪怕一部分就是照片不怎么好，小一些，这都没关系。”

找到这样的照片可是件难事。找到了几张带有大片背景的群影相片。相片上的配景很清楚，而盾徽没照出来。有一

张相片上照有一些手拿自动步枪的德国特务队员和一些身着制服的警察，上面的盾徽只露出一部分，而背景仅仅是一片树梢头。又找到了一些旅游者、军人、带着经纬仪的土地测量员的照片；一些身上挂满了猎获物、穿着长筒皮靴并用皮带牵着猎犬的猎人的照片；一些站在自己车旁的、穿着运动服的自行车运动员的照片和一些在篝火旁的少先队员的照片——所有这些照片也都无用。把革命前的档案也都调了出来。找到了一些带着水火壶、杯子和旧式留声机的野餐者的照片；还有些背着背囊的朝圣者、穿着黑袈裟的修道士的照片。找了整整两天，最后才从一个被忘记查找的箱子里边找到了一张一九一二年一些基辅教师旅行时的留影。一些头戴草帽或欧洲的圆顶礼帽、手里拿着拐杖的男人和穿着滑稽可笑的长衣裙的女士站在圆柱前。相片的上边有里索夫斯基盾徽的下部分——罩着铠甲的胳膊肘。后面是树林，一条大路，远处有个村子和一个钟楼。这正是我们所要找的。

少校拿了这张和另外几张照片并向玛耶娃表示感谢。他决定次日就到“和睦之柱”去碰碰运气。



第九章　未结束的搜索

清晨，天刚刚亮就有人来喊我了。原来，这是赫鲁廖夫，他穿着便服。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快起来吧，少校在汽车上等着呐……”

我穿上衣服，赶忙跟着他出去了。道上停着一辆撑起车篷的大轿车。车里坐着罗日科夫少校和克拉耶夫斯基。我们打过招呼，我就上了车。汽车开动了。路上我向少校讲了我同别佳的接触情况，据我看来，别佳并不知道这个隐姓埋名的‘贝都英人’。

“我已估计到这一层，”少校说，“可是，雨衣却触动了他。您注意到了没有？”

“好象是的,我注意到了,’我对提问感到奇怪‘只是不明白,为什么。”

少校什么也没有说。

“您知道，我们去哪儿吗？”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他又问我。

“不知道。”

“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法西斯分子的地下工厂。”

从少校说的“试试看”这个词里，我听出了他委婉地指

出了我那不可饶恕的错误，当时我竟然做出这么轻率的事来——没有把密码文抄完。而现在象块石头压在我心头上的已是另一种过错：直到现在我还一点儿也没有告诉少校，记者也有那样的一把梳子。等到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定把这件事告诉他。

汽车正飞快地奔驰在沥青大路上。这时晨露未干，路面还潮乎乎的。车子忽而爬上小山，忽而进入谷地。我们行驶在绿树浓荫之中，已变了色的树叶，黄、红点点地掺杂在郁郁葱葱的树冠里。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已经开到了河边并乘坐摩托渡艇到了河的对岸。从这里的大道进入了森林盘山而上。路两旁的树木异常茂密。矮粗的橡树铺开沉重的树冠，与挺拔、端正的槭树和椴树间杂而生。

树林渐渐稀疏起来，汽车爬上了山脊。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空旷的地带。道路环绕着一座座长满茂密小林的小山丘，迂回曲折而下。左面矗立一座黑乎乎的高岭。远在地平线边有一个大村庄，那里的白色房屋隐约可见。那里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教堂钟楼。钟楼的金顶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就是杰尔卡奇村。我们寻找的“和睦之柱”就应该在附近的一个小丘上，不在路这边，就在路那边。我们把车停了下来，从望远镜里仔细地察看附近所有山丘。可是，在这些小山顶上连一点用石头砌成的东西也看不见，有的只是灌木丛和杂草。想打听一下，可是也找不到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山丘一个个查看一番。

我们分成两个小组——我和赫鲁廖夫一起，少校和克拉

耶夫斯基一道，我们开始分头寻找。

直到如今我都忘不了这一天。我们抓住树根和灌木的枝杈，顺陡峭的山坡向上爬着，用少校预先备好的斧头和镰刀给自己开路。每到一个山顶，我们就把每寸土地查看一番。可是，除了金银花和乌荆子灌木，还有艾蒿和帚石南等杂草外，任什么也没发现。然后，又朝另一个方面，或是横穿道路，继续朝前走，再爬上另一个小山头——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找。太阳早已升得老高了，晒得象火燎似的。我们挥汗如雨，落满尘土的汗衫紧贴在身上。渴得要命。对这个无影无踪的圆柱的存在我早就失去了信心，并认为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玛耶娃把我们引入了迷途。



又上了一个山头——再次失望。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才会有个头？可是，我一看克拉耶夫斯基，自己就羞愧了起来。他有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他顺着陡峭的山坡吃力地往上爬，不紧不忙地察看着山顶上的

每块地面，一寸也不放过，嘴里还若无其事地叼着烟斗。

当我和赫鲁廖夫听到欢快的喊叫声时，已经是正晌午了。克拉耶夫斯基站在离道路相当远的一座小山上，手里挥着挑在棍子上的制帽。

“到这儿来！我们找到啦！”他喊着。

我立即向那里跑去，完全忘了炎热与疲劳。在一个大山丘顶上茂密的杂草中我们看到了“和睦之柱”的残迹。一个石头砌的圆底座，高半米，直径约三米，由一些表面粗糙的大石块垒成的。底座的中央残留着一人来高的一截柱子。柱子中心露出一根生了锈的铁筋。碎石和断铁散落在周围。我们也找到了盾徽——一米来长的一个厚厚的铁盾牌，上面有一只生了锈的手持着一根生了锈的剑。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蓝颜色和银色的痕迹。这就是里索夫斯基盾徽残留下来的全部东西——它一度曾是炫耀该家族盛世的。现在，周围长满了橡树和灌木丛。为了把底座周围这片地清理出来，我们用斧头连砍带伐地整整干了半个小时。

少校拿出基辅教师合拍的照片，绕柱子周围走着，很快就找到了照相时拍照的角度；就这样才确定了盾徽的位向。我们用斧头把露出的那节铁筋砸直了，在铁筋和拍照时放照相机的位置之间拉了一条绳子并在铁筋上固定了一根和绳子成直角的板条。这根板条就指出了“里索夫斯基的手”所指的方向。我们又拿起斧子开始在杂草和灌木丛中辟出一条窄窄的小道。克拉耶夫斯基站在板条后给我们指点开路的方向。少校拿着卷尺在量距离。我们就这么干了整整一个钟头。后来顺山坡往下，穿过小槭树林，来到了一块不大的林间旷地

上。在离柱子一百四十米的地方钉上了一根小标杆标杆上放好板条，用指南针定好了板条由西向东的方位。

现在，我们又朝东开出一条小路，直奔黑乎乎的大峭壁。我是多么激动呀！当最后的几米路就要开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可能，离这儿不远就有一个堵死的通向秘密工厂的入口或者一条进入地下的暗道，或者什么标记……我们开出来的路到了终点，一共二百二十五米，这里是林边的一块不大的草地，离河岸已不远。

我四下环视着。没东西！任什么也没有！一片空地。无论是入口、地窟窿、还是小标杆——什么也没有！光是树木和灌木丛。我们查看了周围的一切，什么也没找到。不过，看来，我们的做法有问题。

这时，赫鲁廖夫走近少校并激动不安地向他报告：

“指挥员同志，离这块旷地不远的一条不深的沟里有几具腐烂了的尸体。看来，这是工人的尸体，是法西斯分子为了消灭秘密建筑的目睹者而干的。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我站在这些陌生的受难者的坟旁想着，若不是苏联军队的英勇精神和我们人民的刚毅性格摧垮了残暴成性的法西斯侵略者的计划，我们祖国可能会遭受多么可怕的命运呀！

接下去该干什么？再到哪里去找呢？往什么地方去？这些都暗示在写在囚室墙上的那两行密码里，可是这两行数字偏偏让我轻率地忽视了。

“在这种情况下，”少校发了话，“如果我们不知道该再往哪儿走的话，那么，我们只有把这一地区仔仔细细地查看一

下。”

“可如果仍然什么也找不到呢？”我问。

“要是那样，”克拉耶夫斯基替少校回答说，“我们就把地质勘察员们请来，委托他们寻找，让他们使用最新的科学方法。不管怎样，这个秘密的地下工厂一定会找到的。”

我们决定稍事休息一下，把早餐用了。从克拉耶夫斯基的背包里拿出一些夹火腿和鱼子的面包。赫鲁廖夫的包里还有一些罐头和面包。我们就坐在树墩子上吃了起来，可是一点水也没有。

我能与少校单独谈话的机会到了。我走到少校的跟前。

“罗日科夫同志，我一直忘了告诉您……”我悄悄地说了起来，“您知道，我们在谢尔多宾身上和在塔楼的炮眼里找到的那种梳子，我在记者科洛米采夫那里见到过，那还是记者在这里的时候。他把梳子放在钱包里。”

“您为什么过去不告诉我？”

“一直忘了。”

“这种事情是不该忘的。梳子完全一样还是很相似？”

“说不准，我只瞥了一眼，没有看清楚。”

“嗯……科洛米采夫怎么个个头儿？”

“够高的。”

“您见到过他的雨衣吗？”

“记不得了。好象有件雨衣。”

“他戴眼镜吗？是不是也记不得啦？”

“戴眼镜，记得。”

“什么样的镜片，度数深还是浅？”

“没注意。眼镜不小，圆的。”

“现在人们戴的都是这样的。”

他说话声音很大，一点也不考虑到我的自尊心。赫鲁廖夫和克拉耶夫斯基把这些话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茫然失措地呆立着，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克拉耶夫斯基看到这种情况后就插进话来。

他问罗日科夫：“罗日科夫，你认为这就是那件雨衣吗？可是凶手难道真敢把它卖掉吗？就是换上别的扣子，恐怕他也不会这样做。他不会冒这个险，他完全可以消灭罪证——把它扔掉或者埋起来。”

“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卖。雨衣是同犯卖的，确切些说，是帮手。您，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罗日科夫以平时沉着的语气朝我说道，“还不知道这件雨衣的来历吧，您请往这里看……”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不大的硬纸片，递给了我。这是一张拍有衣服扣子的彩色照片，扣子的形状象个蘑菇，灰绿色，是从不同的角度拍下来的。

“这是带橡胶里子的雨衣上边的扣子，”少校继续说着，“我们在露天采矿场，离谢尔多宾老头儿的尸体不远的地方找到的。从扣子上带着的线头上判断，扣子掉下来不久。老头儿同凶手们搏斗时，扣子飞了下来，可是凶手们并未发觉。或许发觉了而没有敢到下边去找。于是，留下了这么个重要的罪证。这件东西本来应该成为我们揭开罪行的线索。可惜的是，这条线中断了。”

“是的。我下了命令，对所有收购旧衣服的商店加以监

视，而且命令抓住卖缝着这种扣子的雨衣的人。清早在集市上赫鲁廖去中尉，真个的，抓住了一个卖雨衣的人，可是那件雨衣上缝的是另一种扣子。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就是我拿给您看的那件雨衣，还记得吗？”

“记得。那么说，您认为，”我大声说道，“这就是凶手穿的那件雨衣？”

“很象是这样。”

“您说，卖东西的人抓住了？”

“是的，抓住了，可是不得不把他放掉。他原来是个倒卖贩，而且雨衣是才从另一个人那里买的。就在我们和他谈话的时候，雨衣的本主已趁机乘公共汽车跑了。有人看见他上车的。真遗憾！……线断了。可是，不管怎么说，雨衣对我们还是起了作用……”

少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火柴盒，从里边取出一个包着碎镜片的小纸包。

“小心，别摔碎了！这是眼镜玻璃的碎片。我们在雨衣口袋里找到的。”

我和克拉耶夫斯基仔细地查看了它，这是非常小的凸状碎片。凭这么丁点儿的碎片来判断眼镜的度数是很困难的。不管怎么说，镜片的度数是不大的。

“看来，眼镜的度数很浅。”我说。

“是的，”少校同意地说，“我要把这块碎片送去鉴定。那里能非常准确地做出断定。”

“太怪啦！度数这么浅的眼镜，照我看是从来没有人戴的。”

少校没言语。

“这么说,你认为,’克拉耶夫斯基问他;“科洛米采夫可能参与了这个案子?”

罗日科夫停了一下回答:

“我听说，科洛米采夫是一个经过严格考验而且完全可靠的人。他早就是一名记者。他在前线几乎当过四年随军记者，得过勋章……不过，根据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同志今天所说的关于梳子的实情，我还得进行某些查询。”他声音冷淡、用几乎带有官腔的语气把话说完。

当时我远未能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只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当我们在集市上的那天，拉诺夫齐村上发生了什么事。



第十章　公路上的一段情节

少校罗日科夫当即明白了，他的对手是一个老奸巨滑的罪犯。当这个罪犯一发现雨衣上一个扣子掉了，就必然要想方设法尽快脱身。他很可能会用把雨衣卖掉的办法，企图消灭罪证。于是，少校组织人员在集市和收买旧衣服的商店等地方进行监视。如果发现有人卖雨衣，而上面钉着指定的那种类型的扣子并且扣子还少一个，那就把他抓住。拍有这个扣子的彩色照片已经分发给了所有监视人员。少校对这一措施并未抱多大希望，但是，他认为，忽视这种做法是不行的。为此，他把自己的助手，赫鲁廖夫中尉派往集市刚刚开始的拉诺夫齐村。次日早晨，约九点半钟，有个人走进了一家收购衣服的商店，想卖一件钉着普通扣子的橡胶里子的雨衣。商店的售货员很机警，把情况向赫鲁廖夫报告了，于是，赫鲁廖夫就把那个卖雨衣的公民抓了起来。但是，如读者们所知，卖雨衣的人供认，这件雨衣是他刚才在集上从一个不相识的人手里买到的。他未能详细说明雨衣卖主的外形如何，只是说他不算老，个子不高，留着一般的胡须，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没注意，穿的什么衣服他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这种帽子这里许多人夏天都戴，他拿着一个装有叶子烟和香瓜的布包。两只脚上穿的是一双新的褐色的

半高腰胶鞋。

赫鲁廖夫同几个精干的工作人员马上去查找雨衣的主人，可是什么人也没找到。于是，赫鲁廖夫就到公共汽车站去了。有一班车刚刚开走。汽车线上的调度员肯定地说他看见车上的乘客中间是有个戴草帽的人，他提着一个装着香瓜的袋子。这个人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汽车站，而且是在汽车起动的时候跳上的车。赫鲁廖夫从调度亭出来，直接就同市内取得联系，向罗日科夫汇报了发生的一切，也报告了公共汽车的车号。

“立刻想办法弄辆摩托车，追上去，”少校命令道，“我从这一头迎上去……要记住：罪犯的主要特征就是一双新的半高腰胶鞋。不要管帽子，帽子他大概已经扔了。”

赫鲁廖夫跑到了村苏维埃。他算走运：弄到了一辆已加好油的摩托车。当他从公共汽车站驶过的时候，时间已是差五分十一点了(汽车离开拉诺夫齐村是十点半)。此刻，罗日科夫少校已骑着摩托车，口袋里带着地图，脖颈上挂着望远镜，朝拉诺夫齐村方面驶来。从市内到村子的距离是四十八公里。在少校熟悉的大路上，从集市那边过来的人群、车马熙熙攘攘。罗日科夫的摩托车超越过大道上的其他车辆：有慢腾腾走着的拉香瓜和西瓜的牛车、装着干草的大车、运着货物的卡车、载着前往逛集的乘客的公共汽车。同时，少校一面驾驶摩托车，一面不停地紧张思索着，心中在盘算：最重要的是要算好在什么地方会遇上牌号为3—16的公共汽车。因为每十分钟可见到一趟，而这些车都一个样子，它们的牌号也不容易看清楚。按时间推算，和3—16号公共汽车相遇

要在十一点零七分钟。这趟车在这段时间内要走约二十二公里，将到达“红光”国营农场附近。少校对这个地方很熟悉。道路两旁种着密密实实的白杨树，前面要拐个大弯，接着就是上坡路，国营农场拐过弯去就是。少校与这辆公共汽车相遇的时间要比赫鲁廖夫早些。



罗日科夫的计算是正确的。当他驶过“红光”国营农场时，蓝色的公共汽车正缓慢地从小山上迎面开过来。少校让公共汽车开了过去，他调转摩托车，看准了汽车的牌号，然后很快地赶到汽车的前面，将它截住。少校一看就知道了，车上没有他要找的那个人。男人当中（共八人）只有两人有胡子：一个年轻的农学家和一位老人——市公园的看门人。这两个人少校是很熟的。当少校问起有没有一个个子不高，留着胡须，穿着一双新的半高腰胶鞋，提着一个装有香瓜的兜，还可能戴着一顶草帽的中年男人上过这辆车时——大

家都回答说，有过。确实有这么个人在拉诺夫齐村上了车，但是他在奥列霍夫农庄附近的交叉口下去了。“他的草帽，在刚离开村子,汽车上坡的时候被风刮掉了,”售票员说“他也没让停车，只是作了个手势，表示不要草帽了，随后用头巾包住了头。”

一切都清楚了：罪犯知道，有人在跟踪他，所以尽量想把跟踪的人甩掉。少校赶到了前边，注意地查看所见到的马车和步行人。过了几分钟，他看到从远方飞驰过来的赫鲁廖夫。少校打手势，命令他停下来，用几句话把情况告诉了他。

“您一定没有很好地查看路上的行人和马车上坐着的人？”他问道。

“少校同志，没能做到这一点，我在拼命地赶。”

“当然，必须要赶！罪犯正是根据这种可乘之机定出了他的逃跑计划的。”—— 罗日科夫懊丧地想了想。

“走，奔农庄去。”他很快地说道。

过了七分钟，他们到了大路的交叉口。从这里已能看见奥里霍夫农庄，它离公路也就两公里半。公路两旁很大一段地里的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少校从望远镜里注意地查看了四周。田野、小道和小路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近处也没有人，远处有几辆大车，几条小道上有三、四个妇女。

“从这儿到拉诺夫齐村只有十二公里,”少校判断说“这段路公共汽车走二十分钟，可见，我们要找的这个坏家伙是在十点五十分时下的车,就是说,”少校看了一下表“半小时以

前。这段时间他到不了农庄。他不可能从收割过的田野上走，那太显眼而且无藏身之处。走大道也不可能——会马上被人认出来。搭马车往前走，他是不会的——很容易被发觉。而且他也明白，您追上了公共汽车，发现车里没有他的时候，自然要往回返，并且要查看所有迎面来的人。往回返，朝村子的方向，和您走对头，那最安全……因此，我们也要朝同样的方向走，沿路查看所有的车辆和步行的人。但是，不查看一下农庄也不行。这由我去干，而您顺着去拉诺夫齐的路走。您要特别注意、留神。”

……赫鲁廖夫用了近半个小时仔细地查看着道路上的一切。他没有见到逃犯，于是返了回来。离村子九公里的地方，过了一个陡坡后，公路越过一条小溪。少校正在这儿的桥上等他。

“我把时间白白地用在查看庄园上了，”他说，“那里，当然什么人也没有。这个坏蛋真够鬼的，他把我们巧妙地骗了过去。您看！”说着，他用手指着桥下边。

桥下边有一个摔碎了的大香瓜，许多苍蝇围着它嗡嗡地飞。

“现在，他玩的花样很清楚了：他一下汽车就搭上了一辆载货的马车或是牛拉的大车，返回头朝着您来的方向走。您，正紧张地追踪，只顾往前奔，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而他就安安稳稳地在这儿，在桥旁下了大车，然后顺着这个河沟若无其事地溜走了，他选择的路是摩托车无法通行的。香瓜很沉，所以他就扔掉了……都清楚了！约摸在十一点二十分他到过这里，也就是四十分钟以前。现在找他就困难了。他

早已跑进树林深处去了。”

少校沉思起来。

“不管怎么着,”他补充说,“您得跟踪他,也许能有所发现。而我奔拉诺夫齐去。我想亲自拿到口供并仔细察看一下雨衣。您把它放在哪儿了?”

“交给村苏维埃主席保存起来了。”

“太好了!我在那里等您。这辆摩托车我一个人想办法弄回去。”

少校到村里去了。就在村子的集市上他碰到了我。这些情况前文里已经提到。赫鲁廖夫中尉深夜才回来的,他疲惫不堪,心绪不佳。他把沼泽地灌木丛和河沟巡视了一遍,每条林间小道都查看过,可是,并未发现逃犯的任何踪迹。

少校注意听完了他的汇报。

“我们是在同有经验的罪犯打交道,”他说,“我们今后也要估计到这一点。”

“少校同志,怪的是,为什么他会如此疏忽—— 去卖自己的雨衣。”

“这不是他的雨衣:他穿的雨衣不应该是这个尺寸。这是他的头目穿的雨衣。我甚至认为,是他头目让他销毁这个罪证的。可是,他自作主张,只换掉扣子就把它带到集市上卖了。看来,他是缺钱花的。可这是个鬼家伙,您注意:他没有到商店去卖雨衣。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雨衣卖给了倒手贩子并且还盯了他一段时间,看贩子干些什么。他看到,雨衣卖出后惹了祸,马上就逃了,使我们没有找到线索……今天的成果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了这一帮人中的两个。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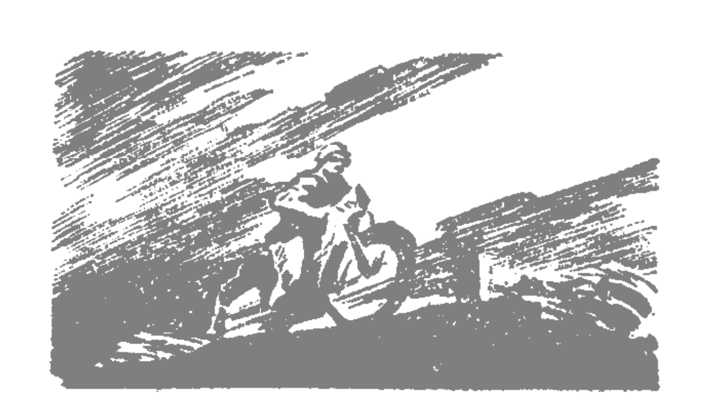
个是头目：高个子，有点儿近视，戴眼镜。第二个是帮手：狡猾的骗子，需要钱用，他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个子不高。”

“带胡子。’中尉加上一句。

“带胡子！胡子和草帽一样，都不能算作是他的特征。他留着胡子这是对的。可是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了。他留着胡子，为的就是必要时好把它剃去。我们还得知这样一个情况：除了个子不高以外，他还抽烟斗。”

“少校同志,这是怎么得知的？”

“您忘了，在他的布包里除了香瓜，不是还有叶子烟吗？香瓜他扔了，可叶烟留下了……”



第十一章　森林中的亮光

我们吃过早饭并稍许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少校就作了如何进行下步搜索的指示。他本人同克拉耶夫斯基要仔细地搜查就近的地区。我和赫鲁廖夫去查看更远些的地区。派我往右，沿林边搜索，而赫鲁廖夫往左，沿河岸走。七点钟前我们两人得赶回来。

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我拿了把镰刀，以备过杂草地时清路用，随即出发去侦察。我沿着山崖边上的一条荒芜小道往前走。走了不久，右边出现了茂密的森林，左边矗立着峭壁。我聚精会神地查看着峭壁，指望找到个山洞，被填堵的入口或是隐避的通道，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峭壁到处都很坚硬，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天已近黄昏，夕阳西下，寒意袭人。长长的树影在石崖上构成了稀奇古怪的图案。炎热消失了，然而，口渴得比先前更加厉害，因为从早起，我一口水也没喝，又一直在烈日下活动，吃的又是面包夹咸鱼子。但是，需要忍耐。我继续朝前走着，心里还想，一回到车上就把还剩下的几瓶纳尔赞矿泉水喝个够。

又走了一段路，右边的森林里出现了一大片旷地，到处都是碎石。左边只见峭壁有一处宽宽的裂缝，里面全是塌落的岩屑，踏着它可以爬上峭壁。右边是几片不大的平场。几

乎紧靠林边，在一片稠李灌木后边，我发现有一个带轮子的东西。

走近之后，看见是一口井，我高兴极了。在一个不大的窝棚下边是一个用大口径洋灰管制成的井口，管口上方的铁框上有个绞车，绞车的一端安有一个带棘轮装置的大摇柄。在往上绞吊斗时，这个装置能起不使绞车倒转的作用。绞车的各个部分都没有损坏，尽管锈得很厉害。大方吊斗被磕碰得变了形，但是不漏水。显然，这口井已很久没人用了。我往井里看了看。这是一个在岩层上凿出的深长竖井。井底有昏暗的水影。我握住了摇柄。绞车吱吱地响了起来，吊斗开始下落。接着，我就把它摇了上来。

多么令人失望呀！我以为，从这么深的井里一定能绞上又干净又凉的水，喝它个够。可是，吊斗里竟然是些发臭的污水，浮面除了油点子，还漂着许多火柴杆儿、瓶塞儿、小木块、碎橡胶块和其他脏东西。我尝了尝水，一股酸溜溜的味儿，还发出硫磺和烟的气味。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喝了一些污水，——可把我渴坏了。

缓过劲儿来之后，我又精力充沛地继续搜索。我顺着裂缝中的碎石往上爬，查看着每块小石头、每个洞穴、每道裂缝，可是，仍然毫无结果。我爬到了峭壁顶上，查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地窟窿或通气口，可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这次我又毫无所获。现在，能聊以自慰的只剩下一种想法：但愿我的朋友们能交上好运……已经六点半了，该回去啦！我立即顺着碎石坡下来，但发现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这里既无旷地，也无水井，周围都是树林。现在我才明

白：真糟糕，我迷失了方向。当我往上爬的时候，太阳照着我的后背，而现在我看着它落山。显然，我现在是在山崖的另一面了。我决定穿过树林，绕过石崖走回原处，但是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对我已是力所不能及的事了，因为脚下的乱树枝和高高的蕨草绕绊着我的腿，灌木丛阻碍着我的去路，我又不时地碰撞在大石头上，简直寸步难行。终于我筋疲力竭了。于是，我又回转身来，再次爬上峭壁，找到了好象是原来的那个大裂缝，顺着裂缝又爬了下来，结果又走到了一处未见过的地方。此刻，太阳已落到树林的后边，夜幕已开始降临，凉风拂拂，几处洼地上已浮现出雾气。已经快八点钟了。我想，我的同伴大概不会再等我，所以我也没必要再赶路了。

我已疲惫不堪，只好坐在石头上。

我坐在峭壁的边儿上，不知所措。我面前是一条茂木成林的宽阔的山谷。宛如一条银带的溪水蜿蜒在谷底，而远处的群山已在迷茫灰暗之中。约半公里处的树林中，能看出有几所矮长的建筑物圈着板墙，四角上立着小瞭望塔。正中间有一个带有小平台的塔楼，平台周围有栏杆。照我估计，这是法西斯分子遗留下的战俘集中营。许多小路和林间小道从四面八方穿过树林通向这里。我很早就想看看这个集中营。现在机会来了。再说，黑夜即将来临，摸着黑儿从这里是走不出去的，而且在这个老集中营里过夜总比在光秃的石头上要好。所以，我先选好了通向集中营的最近的一条小道，接着，下了峭壁，走进树林。我感到寒冷和一股袭人的潮气，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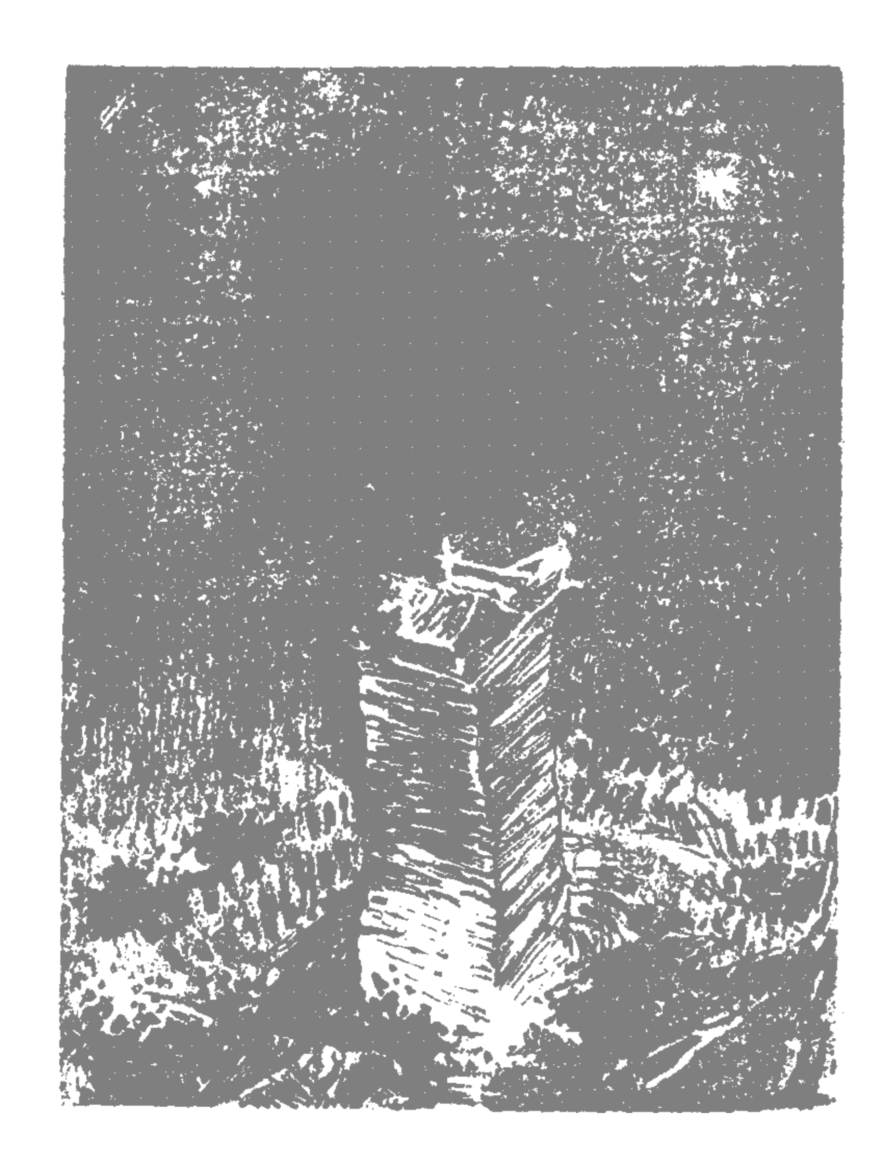
把上衣的扣子扣上，鼓起勇气朝前走去。

森林中寂静无声。树木象在沉睡，纹丝不动。唯一听得到的就是我践踏泥泞小路发出的咻哧咻哧的声音和被踩断的枯枝噼啪噼啪的声响。偶尔有夜鸟无声无息地在头顶上掠过。过了一刻钟，我踏着已塌毁的小桥的木架过了小溪，走近了集中营。一团团生了锈的铁蒺藜网拉在根部朽坏的一根根木桩之间；高高的木围墙上边拉着电网，但多处的围墙已经倒塌了；一条长满了牛蒡草和荨麻的壕沟底上的积水都已经发绿，还有两扇倾斜着的沉重的大门。这就是集中营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

我本想好好地查看一下集中营，指望能找到些感兴趣的东西，譬如，书写的密码文。可是，天已完全黑了，只好等到明天再仔细查看了。我走遍了营棚，到处湿乎乎的，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味。板床和地板都长满了杂草。窗户被拆掉了，屋顶也坏了……不行！不能在这里过夜！最好是到塔楼上去，就在那儿睡一觉。我顺吱吱作响的梯阶爬了上去，上边比较暖和而又干燥些。在平台上堆着干草：看来，曾有人在这里过夜。我倒在干草上，用上衣尽可能盖住身子，把时刻不离身的镰刀放在旁边，立即打起盹来。

我醒来的时候，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象是听见有人的脚步声。好象有人在塔楼下边走过，随后就出了集中营的大门。我仔细听着，可是万籁俱寂、鸦雀无声。只有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和铁蒺藜被风吹动的声响。但是，我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我站起来走到栏杆跟前，周围漆黑一片。天空也是黑压压的，层层密布的乌云看不到一点星光。下 边什么

也看不见，真象是站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风钻进了衬衫，一股冷气串到全身，我立即打起寒战。



可是，真的，就在离集中营不远的树林里有个光亮闪了一下……不，我没有看错！有人用手电筒照路，顺着小道走。

究竟是什么人深更半夜地离开住户如此之远，在这种僻静的树林中走呢？我盯着手电筒发出的星光般的亮光。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亮光渐渐向远处移动。这是怎么回事？起先我想，这可能是幻觉……可是不然！我清楚地看

到，手电筒的光渐渐变弱。后来，看见那个人走近了小溪而且用手电筒照着小桥。他现在正给自己照着路。可是走到小溪那边之后，他又掉转手电筒，往回照着，而且一亮一灭地照了好几次。真见鬼！他为什么向自己的后边照？什么人才会这样做？奇怪的过路人这种非同寻常的做法使我吃惊。

困惑不解的事一般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惧。这时，老实说，我也犹豫起来，是否应该下去跟踪这个神秘的亮光。可是，我手里没有武器。而内心又预感到，我要遇到危险。但是，这种似怕非怕的感觉立刻就消失了。我想到："罗日科夫或者克拉耶夫斯基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稍有犹豫。什么危险也吓不倒他们。"于是，我拿起镰刀，这身边唯一的武器，急忙从塔楼上下来。我的眼睛已有些适应黑暗了，所以我在黑暗里已能辨出树林和建筑物的轮廓。我从围墙里出来，顺山坡向上跑去。草丛绊着我的脚，一个不小心就会撞在灌木上。可是，我仍然踉跄地跑着。

我集中注意力分辨着黑暗中的一切。远处的那个小小的亮光一闪一闪地一会儿照着灌木的枝杈，一会儿又照着微风吹得摇晃着的树梢。拿手电筒的人看来是走在一条小道上。我穿过树林，径直地向他那儿跑去。灌木的针刺划破了我的双手，枝杈抽打着我的脸，寒冷的露水浸透了衣服。

我终于走上了小道。亮光离我已近多了。在漆黑的夜里，这点亮光显得象探照灯的光柱那么亮。当他向后边照射的时候，湿漉漉的小道就象复盖着一层薄冰似的发出光亮。这时，为了不被发觉，我屏住呼吸，尽可能躲在树干后面。我和他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了约有半个小时。

已走到林边，灯光开始向上移动——现在的小道是顺着山坡往上去的。这里比在树林里亮了些。在夜幕中我也辨清了两个人的身影。走在前面的是个妇女，她后边是个男人。我离开小道，紧跟着他们，从这丛灌木后边出来又跑到那丛灌木的后边。遇到开阔地我就在湿漉漉的草地里匍匐着前进。他们走上山岗后，站住了，两个人朝一个方向看了一会儿。他们的身影在微弱略呈红色的黎明前的寒光下，在黑暗的天空衬托中已清晰可见。男人是个高个子，穿着黑色大衣，戴着汽车驾驶员的盔形帽；妇女很象是一个大约十五岁的身材匀称的姑娘，站得稍许远些。她身穿一件红色的短上衣和一条深色的裙子。她的头用一块三角头巾紧紧地包着，头巾的边角迎风飘摆着。他们背朝我站着，所以，我没法看清楚他们的脸。后来，两个人又朝前走去。我跟随他们走上山岗，这时我不由地止住了脚步，吃惊地看着。树林的上空是一片红光，红光眼看着扩大，越来上升得越高，象熊熊燃烧的火炬，染红了大半边天。一团团的火星随同黑红色的浓烟升上天空，被风吹向远方。这时，从茂密的树棵后边出现了鲜红的火舌，紧接着又是一个，再一个……把这块地方照得通明，象天亮了似的。

突然，我身后的树枝唰啦啦地响了一阵，我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去，一个人的两手已经掐住了我的喉咙。接着，觉得有人踹了我的小腿一下，我就仰面倒了下去。但是，倒下时，我可能是下意识地把两手一抡，猛地将镰刀朝从后边扑来的人的肩头砍去。他大叫了一声，立即松开了我。于是，我跳了起来，他很快又抓住我的手并把镰刀夺了过去。

我转过身子，只见还有个黑影从灌木丛里窜了出来，准备向我进攻。“跑，赶紧脱身！”——我仿佛听到了内心的启示。于是，我就拼命地顺山坡往下跑，后边的人一直追我。我本能地意识到了正确的方向：顺照明的小道，径直朝着火光跑去。心口嗵嗵直跳，就象要把胸膛撞碎似的，气也喘不过来了，但是，我仍使出了全身的气力跑。火星在我周围飞溅，浓烟呛得我喉头火辣辣的，眼也睁不开了，可我并没有停下来，因为我知道，只有跑才能使自己得救。我终于跑到起火的地点，是几垛原木在燃烧。火焰冲天，原木烧得弓翘、崩裂，发出啪啦啪啦的爆裂声。火星四溅，浓烟滚滚，到处是崩散的带火的木屑。我一手遮住了脸，窜过两个大火堆，在还未烧尽的杂草和还未熄灭的木屑上跑着，直穿过已经烧焦了的灌木林。烈火已在身后。现在，火焰掩护了我，暂时他们追不上我了，可以停下来稍稍歇一下。

这里的路对我好象很熟，一点儿也不错，这正是我们郊游时到过的、法西斯分子未来得及筑成的工事附近的地方。而烧着的也正是姑娘们曾在上边坐着照相的那几垛原木。

忽然，我又听到后边有人追来。敌人们落在我后面了，可是，现在烈火的光亮从后边照来，他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还得快跑，可是再跑，两腿实在吃力了。突然，我听见一声爆裂的巨响：啪的一声！……接着又一下：啪！……“原木爆裂得真够响，”——我想着。“烧焦的木屑大概飞出了好远……”啪！又是一声——我听到第三声了，而且不知什么东西击在了我前面的石头上。这时，我才猛然想到：“是在开枪呀！在向我射击……”致命的危险起了鞭策作用，不知

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儿，我的两腿自动地飞跑起来。于是，我就顺着路，朝拐弯的地方拼命跑去，因为拐弯的地方可以使我避开子弹和亮光。

很快跑到了拐弯的地方。我马上躲入黑暗之中。我又向前窜了几步，面前就是一片黑色的河面。我未加思索地从岸上跳入了水中。

我周身燥热，所以并未觉得水凉。浸湿的上衣使我动作困难并把我拽向河底。我扔掉上衣并使出周身的力量向看不见的对岸游去。追来的人也到了河边，我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一声清脆的枪响之后，紧跟着就是一声回音，子弹击起水花，落在我的身边。“别动弹 藏起来！”——又是内心的启示。我潜入水中，激流很快把我冲下去了。又是一声枪响……一声，再一声……

只听得，子弹一颗颗在我身边啪啪地落入水中。

黑暗使我得救了，敌人把我的上衣当成了他们的目标。过了几分钟，我抓住草和树根爬上了彼岸，躺在了地上，我已是筋疲力竭，头脑麻木，身不由己，而唯一能意识到的就是自己已得救了。凉风吹透了我的全身，上下牙齿互相磕碰着，浑身发抖。

然而，很快我就清醒了。应该承认，这一夜我干得太蠢了，蠢得无法原谅。我跑到了开阔的、光亮的地方，还象个孩子似的在那儿看熊熊的烈火。我放过了该盯住的人，而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他们象捉兔子似的紧紧地追我，还险些把我打死。

“少校一定不会赞扬我的，”——我懊丧地想着。“说



不定再也不会让我参与这件事，那他也是对的。而现在，正在该行动的时候，我却呆着，象只落汤鸡……如果是少校，他准不会坐失良机。而克拉耶夫斯基又会怎么做呢？失败时他是不会灰心丧气的，也不会胆怯，而定会顽强地把已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



我真恨我自己，我忘了寒冷和疲劳，毅然决定游回对岸，再去侦察。

于是，我又钻进水里（现在我觉得河水暖和多了），重新向对岸游去。在我面前火光的余辉中，清晰地矗立着乌黑的峭壁轮廓。

我小心翼翼地、尽可能不出声地游到了河的中心。这时，我感到岸上有人，他们轻微的对话声和脚步声听得很清楚。忽然，传来一阵拍水声，接着我听到了嗡嗡的声响，很象是陀螺在旋转。

“送到你那里去，完事赶紧回来。十分钟后一定要回到这里！”传来一个人的声音，他显然是在

下命令。

响声离我很近了，接着就在我身旁，不出五米的地方，一只小船疾驶而过。

小船不大，有三米来长，船上顶多能坐两个人。船帮刚刚露出水面。船头上坐着的就是我在树林中见到的女孩了。在火光的余辉下我看清了她面部的侧影，是一张粗俗但好看的脸，黝黑的头发，呆板而无情的嘴。我从未见到过她，可又觉得有些面熟。

船尾坐着一个男人，他没戴帽子，留着当地很多农民都爱留的那种长长的胡子。我觉得他很象那个在树林里和我搏斗的人。小船迅速逆流而去，大概船上装有电动引擎。

我知道，我发现了重要情况，于是就游了回去。我在岸上把衣服拧干后顺一条小道朝可能走上大路的方向走去。

当我看到一个乡村的时候，天已放亮。我敲了敲村边上第一家农舍的门。人们亲切殷勤地接待了我，给我吃大油煎鸡蛋，又请我喝茶。我的精力稍微恢复了，衣服也烤干了。于是，我走出村子，上了公路。等公共汽车一到，我就上车到了工厂。

到家我没休息，而只是整了整衣服，就又立即乘公共汽车奔市内向罗日科夫少校汇报夜间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去了。

第十二章　又一个谜

我在办公室里正好看到了罗日科夫少校。

“好，请讲吧，您跑到哪儿去啦？遇到了什么意外的事？”他微笑着说。

我把自己认为值得重视的情况都详详细细地对他讲了。讲我是怎么走迷了路，怎么在集中营里过的夜，怎么发现了神秘的手电筒亮光，又怎么跟踪那个拿手电筒在森林里走夜路的人，还有，不知为什么他走路时不用手电筒往前照路，而向身后照。

“您对他这种奇怪的做法到底怎么解释呢？”少校问。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看看，身后有没有监视他的人？”

“要是这样，那他就会采取完全另外一种做法。正好相反，他是用手电筒给身后另一个人指路的，但是，他的目的是不让同行的女人弄清走的是哪条路。如果当时您能想到这一点，那您就会慎重而小心地行事了。这一切都清楚了……请您接着讲下去。”

我当时不理解少校说的话。我接着往下讲的是，在我一心朝着火光升起的地方看时，遭到了两个陌生人的攻击木料堆着火的事他已经知道了他详细询问了追击我的人的外貌和他们的衣着。当我讲到自己顺着布雷区从燃着的火堆旁

奔跑的时候，他的脸上立即显出了严肃的神情。

“哪个布雷区？”他问。

“就在法西斯分子未来得及筑起的碉堡那儿。”

“真是莫名其妙！您这是从哪儿知道的？”

“看林人说的。他的一条狗就让地雷炸死了。”

“什么看林人？我怎么不知道那儿有什么看林人？这个地区从来没布过雷…… 有意思 这得弄清楚。”

后来，我又对他讲了，我是怎么在子弹射击下渡过河的和后来又怎么决定游回去继续侦察的。

“那么说，您真的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决定游回去的？”他问。

“是的，是这么决定的。”

“真就下水游了吗？”

“游了。”

他瞧了我一眼，尽管他什么也没说，可是，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出他是称赞我的作法的。

我把事情讲完后，他说道：

“您后来往同游是很对的。关于这条小船我们已有耳闻，可是，掌舵的人没见到过……怎么，那个姑娘您没觉得面熟吗？”

“说真的，罗日科夫同志，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但是，在什么地方就想不起来了。”

“她不象哪个人么？”

“不……不知道。”

他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姑娘是谁，他已猜得差

不多了。但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我当然也不便于提问 。

我起身要走，可是他用手示意，让我等一等。

“再坐一会儿，”他说，“还可以再告诉您一些有意思的事。很显然，记者科洛米采夫与此事无关。我已经通过电报做了些调查。”

少校从桌上拿起一张纸。

“这就是他的特征：高个子、黑头发、长长的波浪式的头发、小胡子、近视眼、戴眼镜、左手肘腕处有枪伤……”

“是，是的，”我打断他的话，“是有个伤痕，我看到过。”

“看到过？太好了！谢尔多宾被杀害的那天夜里他在契尔尼戈夫村内，直到现在他还在那里。除此之外，已经肯定，他同您告别之后，确实是坐飞机走了。”

“一切都清楚了。”

“老实说，这不是完全清楚了。需要同他个人谈谈才好。我要拍电报请他到这儿来一趟……现在，这里还有个材料。”

少校从桌内取出一份电报并开始读着：

“‘黄塑料制的鱼型儿童梳子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由哈尔科夫特种工艺生产社生产的。现在，这种东西早已停产。样品、照片、或者是图样找到后立即寄出。’看来，这不过是巧合。谢尔多宾和其他当地的居民可能在仓库什么地方得到了这种梳子，因为这里不卖这种梳子，而科洛米采夫是在别的地方买到的。巧合的事是常有的。不管怎么说，还是同他谈一谈的好……我这里还有份材料。这是化验室对我

们从雨衣口袋里找到的碎眼镜片提出询问的答复。我把全文读给您听：‘对你们提出的询问现作如下答复：经过化学和光学分析已完全证实，你们寄来的碎玻璃片是怀表蒙子上的，而根本不是象你们所想的那样，是视力镜片上的。还要向你们报告的是，这个玻璃蒙子的尺寸同任何规格的表蒙子都不一样，它的边儿磨得太光了，已没法安在我们生产的表框里。这个表蒙子或许能安在特制的或老式怀表上。’对这份报告您可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么说来，雨衣的神秘占有者本来就不是近视眼，也并不戴镜子。”

“第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二点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喂，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少校换了一种亲切的语调接着说道，“发生昨天伤脑筋的事之后，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罗日科夫同志，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没觉得疲劳，甚至并不想睡觉。而且，好象也没有感冒。”

“精神高度兴奋的时候常常会是如此。人的潜在力量比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且您的体质是很强壮的。”

“可以说身体非常结实：我喝了井里非同一般的污水也没中毒。”

“什么井里的？”

“离我到过的那个地方不远有一口井。这么脏的水，我这一生从来也没有喝过！水是污浊的、酸的，有一股烟味儿。水面上还漂着油点、火柴杆和瓶塞子。我差点儿喝下去一块橡胶皮……”

少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



“奇怪，奇怪……”他说，“附近没有村镇，连一个住户也没有,是不是?”

“都没有。这使您感到奇怪吗？”

“您不觉得？……我们在寻找地下工厂，现在我们碰上了一口井，它是在渺无人烟的地方的岩石中凿出来的，而在井里我们又发现了工厂排出的水，难道还不奇怪吗？”

“罗日科夫同志，您认为，这口井同地下工厂和它的排水道有关系？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凿口井通向地下排水道呢?”

“可能，这本身并不是水井，而是个据有某种目的的竖井，譬如说，为了通风、往上运送采掘的岩石，往下运送工人或为了别的什么用途。类似地下铁道工程局开凿的小型竖井。”

“对，对，我看到那儿挂着个吊斗，碰撞得奇形怪状，好

象有人用它往上吊过很重的石头。”

“看，是不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很好地考虑考虑。这口井应该特别仔细地全面查看才是。说不定，这里正是解开一切谜底的关键之处……现在，我要和您告别了。请回家休息。我觉得，我们明天会有好多事要干。再见！”

我们分别了，我也得回家去好好睡一觉。



第十三章　地下实验室

但是，我也没能很好地休息一会儿。达济扬娜和安娜已经在家里等着我呐。他们向我提了一大堆问题，问我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整整一个昼夜没有回来？对这样的质问我毫无防备，只好现编，说克拉耶夫斯基怎么邀请我去打猎，我又怎么迷了路，整整一天在森林里转，在沼泽地弄得全身都湿透了，在一所倒塌了的棚子里过的夜，直到早晨才找到了大路。说得很不连贯。

“那您一整天什么东西也没吃？”达济扬娜问道。

“不，吃了……我用枪打死了一只野乌鸡，在柴火上烤熟后吃了，’我瞎编了一通。

“您究竟怎么把它打死的？”

“用枪。”

“那枪在哪儿，是您的枪？”

“今天早晨我把它还给克拉耶夫斯基了。”

一切都挺象是真的，但是，我从安娜的眼神里看出了，她并不相信我的话。

这一天没怎么出去散步。在家里呆着的时间更多一些，我们聊天、玩牌，直到我开始打盹为止。

第二天大清早，是少校罗日科夫亲自把我叫醒的。克拉

耶夫斯基和两个我以前没见过的上尉和中士在汽车里等着我们。赫鲁廖大不在。象两天前那样，汽车顺公路飞驰，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渡口。汽车停在了摆渡人的小房旁边并给了个信号。赫鲁廖夫从看守室出来，很快走到了我们面前。

“少校同志，”他报告说，“看管摆渡的人加连巴已溜掉了，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他。”

罗日科夫的脸抽搐了一下。

“原来如此，”他含糊不清地嘟哝着，“出乎意料的消息！真没想到……”

“昨天傍晚他还在这里，”上尉证实说，“我们看见他在渡船和岸上。六点钟时他去过商店。十点钟时看守室的窗子里亮着灯。可是，当我们两点钟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人去楼空！……应该承认，我们的敌人比我们干得出色，分秒必争。他们当然已估计到，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决不会闭口不谈他夜里干了些什么，所以他们就赶紧消灭踪迹。真可惜！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下命令吧，少校同志！”

“我命令你们同我们一道走。而您，上尉阿尼西莫夫，”他转身向着坐在汽车里的同志说，“留在这里，特别仔细地搜查一遍。也许您能找到些可能有助于发现罪犯踪迹的线索或者找到什么根据，以便肯定他的真名。‘加连巴’大概是个假名……咱们快走，不能再耽搁了。”

我们继续赶路。渡船把我们带到对岸。马力充足的汽车迅速地上了陡坡，沿着计划的路线奔驰而去。

少校的情绪不好。他坐着一声不响，焦急不安地用手指敲着公文包。克拉耶夫斯基不停地抽着烟斗。我耐不住就向少校问道：

“罗日科夫同志，您怎么知道，看管摆渡的人是他们的同谋者呢？”

“是您提醒的呀。”

“是我？”

“嗯，不错。您夜里不是听到他们中间有人命令小船回家一趟并在二十分钟后回来吗？这条小船经过十分钟的行程所能到达的地方只有一个住户，那就是看管摆渡的人的住处。这个事实至关重要。经过我们调查之后发现，看管摆渡的人无缘无故地把胡子剃掉，事情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事情的发展有了变化。罪犯们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们，就消声匿迹了。这给我们增加了麻烦。我担心，到井边还要冒场风险。”

但是，他想错了。我们乘车到了“和睦之柱”，徒步走完了两天前我们开辟出来的那段小道，从这里我领着大家又走了约半公里，就到了那口井跟前，井安然无恙。绞车也完整无损，而且没发现丝毫有人来过的痕迹。

少校仔细看过了这口井。

“在岩石层中凿出来的，”他说。“是的，这里是不可能指望有地下水的。绞车能承担得起很大的重量。一切都清楚了！喂，我们来测量测量吧！”

井深整整有十米半，而水深只有一又四分之一米。随后，为了查一下井里，看有没有有害的气体，我们向井内投

进一张点燃的纸。纸落到水里才熄灭了。看来，井里的空气对人体无害。于是，我要求第一个下井。少校瞧了瞧我，同意了，但是条件是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命令。我脱掉身上所有不必要的衣服，爬进了吊斗。他们给了我一根折叠尺，又把一个大电池灯挂在我脖子上，接着就把我慢慢地送下井去。忽然，我脚下的水拍溅起来。我把吊斗沉入水内，自己站在吊斗帮上，这样，我也沉进齐腰的温乎乎的脏水之中。现在，我看到了大家期望的情况：这个竖井和一条大管道连接着，管道是倾斜的，往上去朝一个方向，往下朝另一个方向。我量了一下，管道是椭圆形的，高整一米，宽七十公分，管腔的一半在水面下边。人可以勉强通过这条管道，不过只要顺着管道上到水平线以上，那爬行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我通知上边，已查看完毕，紧跟着就得到少校让我上去的命令。链和齿轮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响声，不一会儿，我已经在地面上了。我又激动，又高兴，把情况都告诉了自己的同伴。我们着手整装，准备开始地下侦察。少校决定第一个下去，接着是我，最后是赫鲁廖夫中尉。克拉耶夫斯基由于有条假腿，不便于参加这次活动，所以就留在上边，和中士一起呆在绞车旁边。他们两个也和我一样，都穿上了运动服和运动鞋，胸前挂上电池灯。少校拿来三个能够密封的橡胶口袋。他在每个口袋里各放了两支蜡烛、两盒火柴、一张纸、一个卷尺、一块表和一个指南针。他又把照相机和一定量的镁放进我的口袋里，给赫鲁廖夫放进一些木用工具，而自己则带上了一团结实的线和一支手枪。我们带上口袋并用

绳子把它在身上缠紧，一个一个地下了竖井。

这次的地下探索我记得很清楚。在齐腰的水里爬行是很吃力的。空气不足，两脚常在复盖着一层淤泥的管道上打滑。

还好，这个罪没受多久。越往前走水越浅，很快我就到了没有水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爬着走了，这样就轻松多了。我们一直顺斜坡往上爬了很长时间。记得，特别使我感到受罪的是那根沉重的小铁棍，我一直把它握在手里，顺管道底拖拉着。

这三十二米（后来才搞清楚）当时对我就象是一段遥遥无尽头的距离。我已经精疲力竭，弄得我到处是伤，手脚不时地碰上管道底上的尖石头和玻璃片。少校忽然喊了一声：“到头了!”——于是，我只见他站了起来。管道在这个地方突然向上拐去，往上约在三米的高处是扇栅栏，顺着钉进墙里的铁扒锯子可以爬上去。

少校蹬着扒锯子爬了上去，用肩膀顶了一下栅栏，把它顶开了，这原来是一个盖子。

我跟在他后边，来到一间约三米的圆筒形小屋里，地上有厚厚的一层淤泥，顶上有个排水沟口，一个铁梯子通到那里。从各种迹象来看，这是个集水室。

我们顺铁梯上去，打开排水沟口的盖，马上来到一条黑暗狭窄的长廊，它向两个方向伸去，宽一米，高差不多两米。地上铺着橡胶垫。我看到顶上有一些小电灯泡。

“喂，现在我们已经在法西斯分子的地下王国里了，”少校说，“要继续探寻，先得留有退路。”

他点燃一支蜡烛，把它放在靠近排水沟口的地上。随后，他拿过一大团结实的线，把线头系在排水沟口的盖上，线球递给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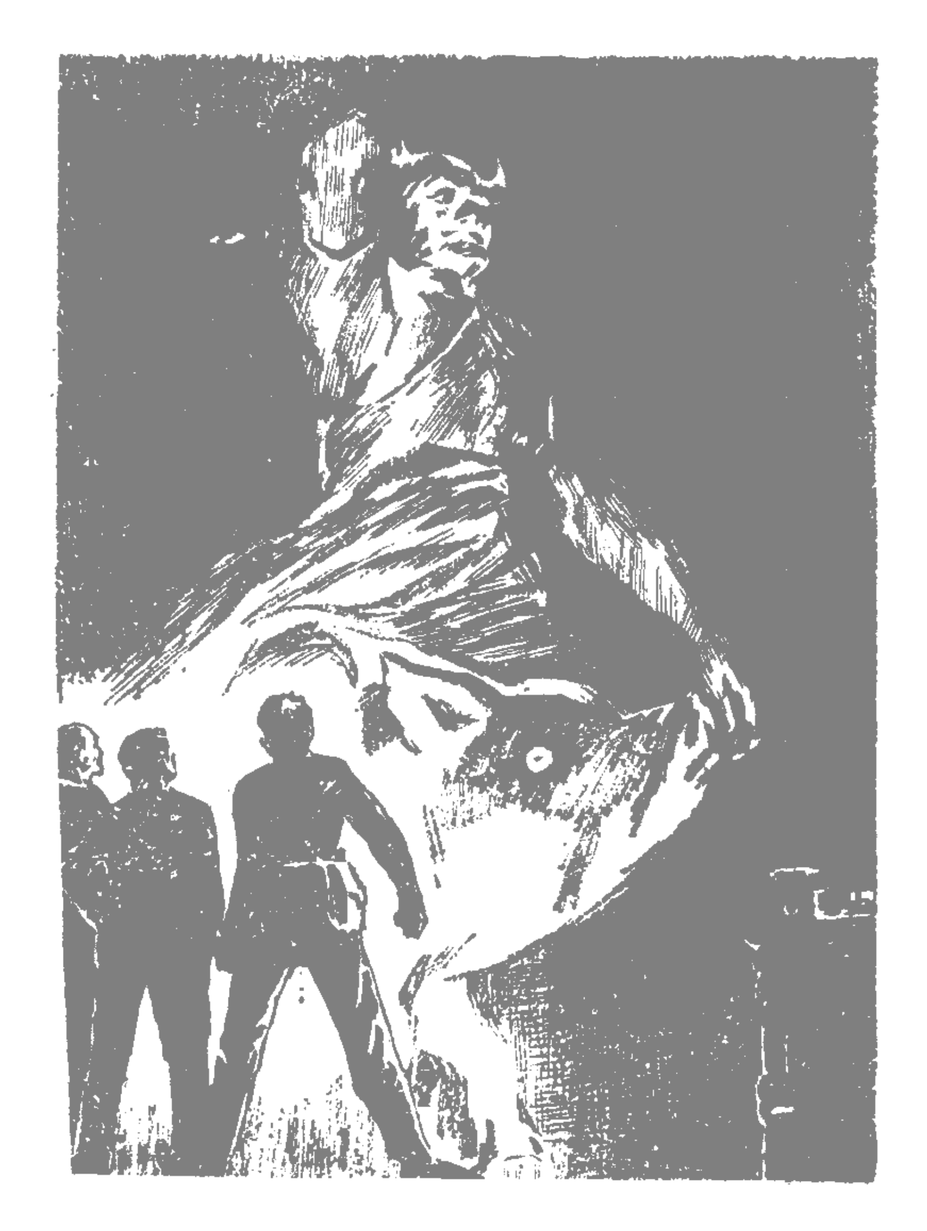
“您来管这条阿里德娜线（引路的线。根据希腊神话，阿里德娜给了泰宰一团线，从而帮他逃出了迷宫——译者注）。”他说。“好吧，现在开始前进，走得不要离我很远，无论是按钮、开关、还是电闸，千万都不要碰。”

我们顺着长廊鱼贯而行，仔细查看每个角落，同时不停地用铁棍敲各面的墙壁。走廊是弯曲的。手电的亮光只照得着不大的一块地方。前后漆黑一片。忽然，在廊道拐向左边以后，地方就宽敞多了。摆在搁架上的化学器皿在灯光中闪闪发光。我们走进了实验室。它的样子很象又矮又窄而且很长的地下掩蔽室。一排排的试管、烧瓶、盖着滤纸的漏斗、放有量管的架座、盛试剂的玻璃瓶、蒸馏水罐、真空箱、瓦斯炉、干燥器——一切都有条不紊。看样子，实验室仿佛刚刚用过，好象化学家们马上就要回来接着进行紧张的实验。

“这儿来，这儿来，不要分散！”我听到少校的声音。

他顺走廊朝前走，正在查看隔壁的房间。我们应声跟了过去。这间房显然是个负责人的办公室。地上铺着地毯。一侧靠墙摆的都是书柜，靠近另一边墙有张秘书用的桌子，再靠前是一个大的电壁炉，旁边有一堆纸灰。正对着门，在屋子深处摆着一张写字台，在写字台后面靠着墙有一个可着整面墙那么大的怪东西；我们一时没能看清那是什么，在灯光下只能看出闪烁着铜光的手、脚和兽面只是当我们走近些并把三束灯光都照到墙上的时候，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墙立着一尊足有两人高的古代目耳曼神的青铜铸像。他披铠带甲的魁梧身躯半侧身地骑在一头野猪上。他左手抓着野猪



的嘴。野猪的头转扭向一边，挣扎着的样子，两只绿色玻璃眼睛闪现出凶暴的神态。偶像的右手高举过头，拿着一个沉重的锤子，锤头差不多已碰到了房顶。他头戴角盔，从盔下边垂肩披着几绺浓密的卷发。偶像的脸故意做得很粗暴，象一副毫无生气的假面具，毫无表情，神态僵死，令人毛骨悚然。因此，整个铸像显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残酷形象。我们

看了他很久。

“这是什么奇特的怪东西”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把这么个贵重的大家伙放在这里干什 么！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些怪想法是法西斯分子们特有的，”少校指出，“他们喜欢用吓人的形象来控制群众的思想。他们认为这种做法能起到使人绝对服从的作用。”

“可是，把这个东西弄到这儿来，要费多少人力啊！就是分几部分也不可能通过排水道运进来。”

“这只能说明，”少校说，“还有一个，至少是曾经有过一个正式的入口。至于劳动力吗？劳动力对他们来说是不值钱的。他们使用了数以千计的奴隶。”

我们面前摆着一张很漂亮的核桃木的写字台。一个大型的中世纪古堡式样的青铜文具架，带有两扇门的塔形座钟，带有垛子边的塔型笔筒，一个录音机和两台电话机—— 这就是我们在书桌上看见的东西。所有的抽屉都拉开着，里边空空的，一张纸也没有。壁炉旁的一堆灰烬已说明了文件的命运。

“干得很彻底，少校同志，”赫鲁廖夫说，“甚至连张吸墨纸都没剩下。”

“连灰都搅乱了，”罗日科夫说，“只剩下看看图书馆了。”

少校和上尉看书去了，我却到隔壁的房间去看了看。挨着图书室的是一个不大的房间，里边有几张床铺，一个桌子、几把椅子和几个枪架，——显然，这里是哨兵住的地方。接着是一大间有好多床铺的掩蔽室——工作人员们的宿舍。再往前就没有走廊了，我刚想回到同伴们那儿去，忽然看到

廊子尽头有个厚实的小门，于是我把它打开了。一股浓浓的墓穴气味迎面扑来。灯光照在了门前的桌子上和坐在桌子后边一动不动的一个人的身体上。他的胸、头和左手在桌子



上，右手直直地几乎搭拉到地上。一条粗铁链铐住他的一只脚，曲曲弯弯地伸在地上。链环在灯光下象是一条神奇的蛇的鳞片似的，闪闪发亮。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离奇，使我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了回去。没敢进屋，我就向少校去汇报这一可怕的发现。这时，少校同赫鲁廖夫正迎着我走来。少校看到我不安的脸色，问道：

“您这是怎么啦？您怎么面无血色……是不是找到铐起来的尸体了？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最后一间屋子里，”我回答说。“您怎么知道的？”

没等少校答话，赫鲁廖夫对我说：

“在录音机听到的。他们忘了毁掉小轴录音带，上边留有最后的命令在这儿，您看。”说着，他递给我一块纸

上面是罗日科夫从德文译成俄文的一段文字：

致 VL 第 172 号工程命令

1. 根据元首的指令，我们这个工程暂时停工。

2. 所有设备、仪器和器皿应保持完整，以备使用和返回时立即复工。

3. 所有的文件和图纸立即交给我。一般通信一律销毁。

4. 全体工作人员今天 22 点开始撤退，于明日 4 时撤退完毕。5 点钟把闸门沉下。

5. 把暗中破坏工作的背叛元首和德国的奥托·基辛格，还有俄国工程师帕西柯留在单身禁闭室，用锁链铐上，给他们两周的面包和水。

希特勒万岁！

VL172 号工程长官，突击营总指挥冯·李姆舍。

我被发现的情况惊呆了。这就是说，在那个发臭的单人禁闭室里，刚才在我面前躺着的就是达济扬娜的父亲，维克多·伊凡诺维奇·帕西柯！

当大家以为他已被带往德国去并一直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却被锁链锁在地下监狱之中，离自己家很近的地方，而且是活生生饿死的。这太可怕了！

我走进单人禁闭室，四下里看着。房间不大，阴森低矮，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不大的水槽子。地中央安有一个铁环，上面系着两条铁链

子，一条伸往帕曲柯那里，另一条伸向阴暗角落的一个地方那里。勉强能看出在堆破烂东西上还有一个缩作一团的尸体。无疑，这就是勇敢抗拒了元首命令的基辛格。

罗日科夫在察看桌子，赫鲁廖夫拿着灯，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搜集散落在地上的纸片。

“少校同志，”他忽然说，“纸片下边有尘土。”

“我也看出来了……这些纸片是不久前才扔在地上的，纸上的硬脂油迹还是新鲜的。你再看，扔着的好多火柴也都是苏联生产的。有人在我们之前到过这里，而且就在不久以前，可能只有两三天。毋容怀疑……啊，他妈的！”少校突然骂了一句。“这是什么？……看呀，来看，他们从桌上偷走了一个文件！我们来迟了！文件就曾放在这里，在死者的手下边！毫无疑问，是他的记事本。”少校指着桌面上一点灰也没有的地方。大概，这里原来放着的是练习本或与它大小一样的一些纸张。

我从未见到罗日科夫如此激动。他抓起赫鲁廖夫拾起的那些纸，开始在灯光下仔细查看。都是些空白的纸，只有一张不是。少校匆匆忙忙看过了这张纸上写的东西，随后放到了桌子上没有灰的那块地方。

“从这里拿走的，没错！”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是的，他们抢到我们前面了……嗯，没关系！不能灰心丧气！……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把所有这些都拍下来。还得赶紧出去。”

在镁曝光下。我把单人禁闭室、办公室和其他几处都拍了下来。少校把纸收到一起，放进了橡胶口袋。

我们没费力就找到了排水沟口，顺排水道下到了井内。克拉耶夫斯基同中士很快把我们拉上了地面

我们浑身是汗，从头到脚都是污泥，强烈的光线使我们睁不开眼。我们当时的模样是真够人看的，不由得使他俩大笑起来。我们不得不赶快到河边洗个澡，换套衣服。然后，大家坐下来，吃了些东西。少校把看到的一切情况都讲给了克拉耶夫斯基。少校现在已经恢复了常态，很冷静。

“今天我们一天不顺：我们让看摆渡的加连巴跑掉了，错过了机会，没得到重要文件，现在，文件已落入敌人之手。但是我想，目前敌人还在附近，没走远。一个星期前我就布置了人监视各火车站、公路和市镇。他们无处可逃。他们是溜不掉的。”

“为什么你认为，被偷的文件这么重要呢？”克拉耶夫斯基问。

少校不声不响地打开了橡胶口袋。

“从一切迹象看来，这是笔记本的第一页。”他说，一边把纸递给克拉耶夫斯基。“这一页是丢了的或者有意从笔记本上扯下来扔了的。自己读读看。”

克拉耶夫斯基读过这张纸，把它转给了我。上边写着的是：

> “我现在坐在这里，被锁在链子上。我没有卖身投靠祖国的敌人，也没有畏惧威胁，因此被判瘦死之刑。
>
> 昨天，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地下工厂，可是，却向我们宣布了判决。但是，这很好，就是说，他们已被粉

碎而且正在逃跑。

为了使我们遭受长期的折磨，给我们留下了面包和水。这也很好：现在，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地下工厂和厂内进行的工作统统记下来。我要把基辛格教授向我口述的他的发明纪录下来。这是一项他拒绝向法西斯分子吐露的伟大科学秘密。

让这一伟大的科学秘密为苏联人民造福、为全人类造福吧。

乘我还有气力，乘蓄电池还供电的时候，我要不停地写。

或许，要过很多年这个笔记本才会得以重见光明。

或许，那时候已不知贫穷为何物的人类已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时人类会使这一科学的伟大发明为和平的生活服务。

那时候，手中拿到了这个笔记本的人们大概也不会从中发现什么新东西。但愿我们这两个不幸的人能给他们留下善良的回忆。这两个人为了没向凶手们交出可怕的武器而捐躯。

以下是我的记述。一九四一年三月我们这儿……”

写到这里中断了。

我把这张纸还给了克拉耶夫斯基。这一页当然是故意撕下来的。敌人有什么必要来证实俄国人的英勇刚强和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呢？他们不会以此来向自己主子们讨好的，他

们的主子们并不大愿意知道，一个普通的俄国人是宁死也不背叛祖国的。

“这个基辛格是谁呢？”我问克拉耶夫斯基。

“是个有名的物理学家和知名的反法西斯人士。战前他尚在狱中……可是，突击营总指挥冯·李姆舍，”克拉耶夫斯基说，“却已丧命了。他乘坐的列车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被游击队炸毁了。整个营队无一人逃生——所有的人都被歼灭了。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少校催促我们回去。我们上车时，他突然对中士说道：

“中士索夫科夫，您得在井这儿呆几天。我派人来接班并把帐篷、武器和一切必用的东西送来，也会保证您的给养。除了自己人之外，任何人不得接近这口井。这样，会少些麻烦。”

罗日科夫和赫鲁廖夫在摆渡旁从车中走了出来，向阿尼西莫夫了解了一下情况。告别时，少校说道：

“我觉得，我们匆忙了一些，没好好地把整个地下室都侦察一遍。无疑，那里有个另外的正式入口，特务们就是从那个入口进去的。”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克拉耶夫斯基问。

“在我们之前没有人钻过管道——那里丝毫没有人钻过的迹象。”

第十四章　考虑不周的一步棋

第二天早晨，一阵叩门声把我吵醒。

在似睡非睡中，我心想这是娜杰日达·帕西柯在敲门，就说了声“请进。”

门敞开了，进来的却是莲娜。我高兴得从床上跳了起来。

“莲娜！是你来了！太好了！你真可爱！”

“谢尔盖，昨天晚上……我实在想念你。我再也不能等待了，就决定来了。”

“好极了！……快脱下帽子、雨衣，咱们一块走，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儿的女主人。”

我洗理完毕，就把莲娜介绍给娜杰日达·帕西柯和达济扬娜。其实她们已经猜出了莲娜与我的关系。老大娘亲切地接待了我的妻子，而达济扬娜却显得相当冷淡。安娜·希德罗夫斯卡娅很快也来了，她和我妻子认识后，立即挖苦起我来。

“真可以给谢尔盖发一张‘模范丈夫’奖状，他从不向任何女人献过殷勤，对我和达济扬娜也不大注意，他大部分时间是去打猎……当然，还得补充一句，那就是他打猎是不带猎枪和猎狗的。”

“我是和克拉耶夫斯基一块去的，他是猎人协会的主席，”我极力为自己辩解。“猎枪是在他那儿借的，狗也是他的。只不过没有打着什么东西。”

“我给你带来了一管猎枪，”莲娜说。

我确实不会撒谎，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莲娜对我所说的一切都信以为真了，而安娜却相反，她完全不相信。

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因为她带着讥讽的笑容看着莲娜，又和达济扬娜交换了眼色。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怎么能把实情告诉莲娜呢。

几天过去了。我们经常到郊外游玩、划船。我、莲娜、达济扬娜和安娜四个人总是一块出去。别佳出远门去了，一直没和我们在一起。

我对那次井下的搜索总是不能忘怀，即使在我们游玩的时候，我脑子里盘旋的仍然是当时的情景。其实，那一次地下侦察仅仅是揭开了VL172 工程这一大秘密的序幕，在那灰色山岩的底下还有许多奥秘。这种想法不久就得到了证实。以下是足以说明这种设想的根据：

我们进入地下密室所通过的那条排水道，根据它的断面看，是用来排出大量废水的。它的排水量超出一般实验室废水排出量的好几倍。一个实验室单独也未必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工程。显然它是供某个企业使用的。

在冯·李姆舍的指示中曾谈到过大量的工人和一个水闸，而这个水闸我们没有见到。我们根本也没有发现地下工程的入口和出口。当然排水道不可能是进出口，因为穿过里面的污水出入，简直是不可能想象的事。

进入地下室后，我们查看的仅仅是从排水沟口往右去的走廊所通向的一个实验室；往左去有什么设施，我们就不知道了。

所有这些情况使我不能平静。我随时随地都在揣度，法西斯匪徒建立这个地下实验室的企图何在。可是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是罗日科夫，还是克拉耶夫斯基都一直没有露过面，就象故意与我为难似的。

我曾几次打电话想和克拉耶夫斯基取得联系，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刚刚出去”、“出城去了”或是其他类似的答复。我又不能给罗日科夫打电话，因为这样做是绝对禁止的。

我很自然的想到，可能莲娜到来的消息已传到少校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认为，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已不是适当的人选了。井边的侦察工作一定仍在继续，但不会再让我参加了。当然，我什么也没有告诉莲娜，我应该信守我答应过少校的诺言。

莲娜发现我抑郁不欢的神情，就从另一个角度去猜度我情绪不佳的原因。

一天晚上，她说：“你大概想去打猎吧，谢尔盖，那就去吧！我正好也要到城里集市上去一趟……那就明天去。”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真的，你去吧，”她继续说道，“打个电话和克拉耶夫斯基联系一下，你们就一块去，我反正得进城。”

晚上，我给克拉耶夫斯基去电话，结果还是白搭，他不在家。于是我决定一早就动身到井旁去瞧瞧，看那儿在干什

么，是不是正在进行侦察而把我撇开了。我指望能遇上少校和他谈谈，向他解释清楚，我妻子的到来不应影响我和他的合作。

一清早，我搭上顺路的汽车赶到了渡口，又从渡口沿着我熟悉的小道走到了井旁。在绿色的灌木丛里有一个白色的小帐篷，旁边一个煤油炉燃得咝咝作响。炉子上烧着一大壶水。索夫科夫中士独自一人呆着无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躺在帐篷里的一堆干草上，旁边架着一挺自动步枪。帐篷里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另一个值勤的战士到医务室看病去了，而来接替他的人，要等第二天清晨才能到。这儿没有进行任何侦察，少校也不在。

中士象接待老朋友那样接待了我，请我喝茶。

“少校经常到这儿来吗？”我问索夫科夫。

中士摇了摇头。

“自从那次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也许是忙吧。有什么事吗？”

“我想和他谈谈，我现在呆着也没事干，可是总该做点什么呀。”

我心里闷闷不乐。索夫科夫也看出了这一点，他深表同情地向我建议：

“您给他写封信，今天就交给通讯员送去。我现在正等着他来，”他说着，一口口地呷着茶，“也该送粮食和报纸来了，旧报都看厌了……我这儿有纸、有信封。如果您愿意，”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添了一句，“我让您下井去，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嘛”

我考虑了一下。真的，我干嘛不再下去一次，独自去侦察一下呢？少校并没有禁止过这样做。他现在忙得要命，一直在寻找被人偷走了的那个帕西柯工程师的笔记本，可时间又很紧迫，也许我的运气好，还能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况且这并没有任何危险，有索夫科夫在上面值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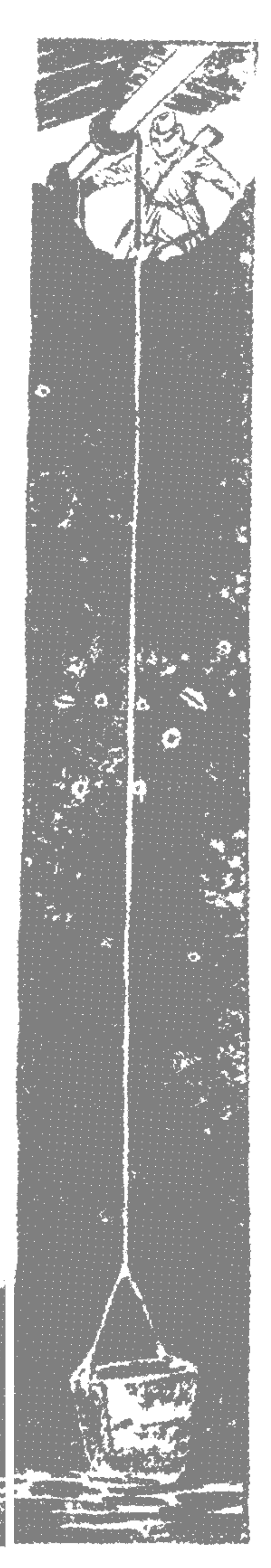
“能找到蜡烛吗？”

“可以匀给你三支。”

我给少校写好了信。信中谈到我热切希望能继续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愿意在寻找帕西柯的笔记本方面出点力，我什么危险也不怕。最后我告诉他说，我就要下到井底去继续侦察地下情况。这封信写得语气虚夸，又毫无内容。

我把信封好，和上衣、证件等一起放在帐篷里，就爬进吊斗。索夫科夫松开棘轮，攥住绞车的把手，开始往下放吊斗。

“等您回到井口的时候，”他说，“用小石块敲一敲铁链，我就能听见。我把吊斗





就留在下面了。”

尽管管道里一片漆黑，得用手摸着爬行，可是这一次通过排水管对我说来可真的不算一回事了。爬到集水室时，我从小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蜡烛点上，毫不困难地沿着梯子进入走廊。这里还是我们那天离开时的样子。蜡烛头仍在排水沟口，还有我们丢下的小铁棍、绳子和少校忘了带走的水壶。我把蜡烛立在排水沟口旁，正准备沿着左边的走廊去侦察，因为那个区域我们上次连看一眼都没有来得及，忽然，从管道里传来绞动铁链的铮铮声，绞车也咯吱咯吱响了起来。显然，这是从井里传过来的，所以听起来就象在跟前一样的清楚。

“索夫科夫为什么要把吊斗拉上去？”我想“是他自己说的要把吊斗留在下面，这样对我比较方便。可是怎么又……真是怪事。”

我站在那儿听，铁链的响声渐渐消失了，吊斗撞在井壁上咚咚直响，斗里的水滴滴地往下落，于是，一阵警觉和恐惧涌上我的心头。我安慰着自己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索夫科夫可能忘了他曾经答应过的事，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他才把吊斗拉上去的。但我仍然抑制不住自己恐怖的心情，正象囚徒们听到把他们永远锁在监狱里的牢门的钥匙和门闩的响声一样。

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和强烈的井水溅起的声音。“索夫科夫跌进井里了！”——我的脑海里闪过了这样的念头。我不顾自己，从排水沟口进到集水室，由此再往下去，进了排水道……

“快！快去救他，他要淹死了……”我催促着自己

水浪翻腾，溅打得啪啪地响。我似乎感到，那可怜的落井人正在污浊的泥浆里挣扎，他尽力挣扎着向外爬，被水呛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我闻到一股略带甜味的电石气的臭气。这是什么？这里哪儿来的电石？怎么回事？臭味变得简直不能忍受了。我感到呼吸困难和剧烈的头疼。

我赶快拼命往上跑。瓦斯气浪在逼近着我。我憋闷得慌……觉得马上就要摔倒。要是那样可就完蛋了！我在走廊里跑着，自己也不知该往哪儿跑。眼前一片漆黑——蜡烛早已灭了……我一会儿撞到墙上，一会儿又撞到桌子上。我只顾往前跑，只要离得远点就行。

突然，地下室的拱顶被一道闪电似的红光照亮了，我听到一阵可怕的吼声向我逼近，就象一列巨大的列车亮着可怕的前灯，疾驶着在追逐我。一股火热的旋风冲了进来，在地道里翻滚着。一声轰鸣，一片玻璃的碎裂声，一种难以忍受的炽热……

“瓦斯爆炸……”——这是我脑子里掠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我仿佛向什么地方飞去，失去了知觉。

第十五章　忠实的朋友

我渐渐苏醒过来。首先感觉到的是有人在摇晃我，把我从一边甩到另一边。我感到头昏脑胀，难以忍受，太阳穴砰砰直跳，恶心想吐。仿佛我是坐在一辆飞速向山下驶去的汽车里，马达散发出燃烧过的汽油味，闻着就恶心。我是怎么坐上车的，到哪儿去，去干什么——这些都想不起来了。我尽力在回想着。处在这种状态下究竟有多长时间，我也说不好，可能有几个小时。

突然，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开始恢复知觉，开始明白我是躺在地上紧闭着眼睛，想睁开眼，可就是睁不开。试着抬一抬手臂，可是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肩一直延伸到手指。于是我才回忆起了发生的一切：想起了下井，想起铁链铮铮的响声，想起了瓦斯爆炸。我好不容易地睁开了眼睛，眼前仍是一片黑暗，没有一线光亮，看不见任何东西，连一个影子也看不见。睁着眼和闭着眼没有什么两样。

我注意地倾听着，四周悄然无声，只听到在我身旁有水滴在石板上的声音。这声音象什么呢？对了，我想喝水，我非常渴……

我又向黑暗中巡视，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莫非我瞎了？……这个念头太可怕了我勉强抬起手来摸自己的

头部。面部烧伤了，火辣辣地发热，眉毛也被燎光了，头部到处是伤，头发也被血粘住了。可是眼睛呢？还完好吗？要能有一点点光亮，有一丝哪怕是最微弱的光线，或是能划一根火柴就好了。可是没有火柴盒，我的小提包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后来，我觉得好象有人找到了我。来了许多人。他们用担架抬着我在黑乎乎的走廊里走。担架摇来晃去的，就象小船在剧烈晃动一样。抬着我向下走去。我想喊“往上抬，别往下走！”——但我听到的只是低声的呻吟。接着我醒过来了。

周围仍然是漆黑一片，什么人也没有。担心失明的恐惧心情又一次涌上心头。我使劲睁着眼，向茫茫的黑暗中查看，忽然见到我面前是天花板和墙壁……是的！我看见了石头拱顶。拱顶上隐约见到了一点淡黄色的亮光，忽明忽暗的。亮光愈来愈强，于是有人走进了房间，他手上举着点燃的蜡烛。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明白，人们在寻找我。

我想竭力地叫喊“：过来！过来！我在这儿！”但我发出来的仍是微弱的呻吟。可是进来的人就连这微弱的声音也听到了。他转过身来，很快地朝我这边走来。我见到烛光在他细长的手里颤动着，听到玻璃碎片在他脚下嚓嚓直响。他朝我弯下身子，我见到一张被微弱烛光照亮的女人的面孔，脸上满是污泥。

“谢尔盖！谢尔盖！你还活着！还活着！……”

我仔细看了看——是莲娜。

“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幻觉。”——我这样想着，把眼闭



上了……

不一会儿，我感到双唇触到了水，我贪婪地喝起清凉的酸葡萄酒。我的气力开始恢复，神志也清醒了。莲娜双膝跪在我面前，把湿布放在我的额头上。我凝视着她的面孔，她象站在病儿床前的母亲那样，脸上显得那样的惊恐和不安。我看着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泪珠一滴滴地从她眼里涌出，沿着双颊往下流，在她那满是尘垢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清楚的泪痕。

“可怜的，亲爱的！”莲娜用手绢擦着我的脸，在耳边轻声叫我。

“莲娜，是你？你怎么来的？”

“小声点，小声点，你别说话，等以后再告诉你……”

“等等，其他的人在哪儿？”

“这儿只有我一人。”

“你一人？……你从哪儿知道我在这儿？谁告诉你的？”

“别说话……以后我都告诉你。”

她把我扶起来，帮我坐到椅子上。现在我才发现，我们

在一间实验室里，紧靠着几具通风器。周围尽是些打碎的玻璃器皿和损坏了的仪器。我得救的原因是：出事时我躺在几具通风器的旁边，而通风器的玻璃被震碎了，从这里流进了新鲜空气，所以我没有被呛死。我的小背包也在地上扔着，是爆炸时甩掉的，包里有蜡烛、火柴。

“得快点，”莲娜说，“他们在上面只等我们半个小时，你能走吗？”

她扶着我站起来。我头晕，但是还能站得起来，这是我所没想到的。我们每人举着一支蜡烛顺着长长的烟雾重重的走廊向前走，一股难闻的烧焦气味使人喘不过气来。到了排水沟口，我们下到集水室，爆炸时，集水室内的淤泥全都溅出来了，现在可以看到直径不同的几道通向集水室的管道。莲娜先进入了排水道，我跟在她后面。我们谨慎小心地爬行，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照着前方。我那受伤的手疼得很厉害，头也发晕。可这算不了什么。我们马上就要爬出这窒息的洞穴，吸到新鲜空气了。看见水了，莲娜蹲了下去，高举着蜡烛，大胆地爬进污泥里，只走几步水就齐肩了。忽然她失去了平衡，两只手摇摆了几下，想抓住管道的壁，结果仰身摔了下去。她在水中扑腾了一阵，又站稳了脚。她把脸转向我，我看到她头部全湿了，一脸的污泥。

“那儿有块石头！”她惊讶地对我说。

“石头？什么石头？……”

“不知道……一块大石头……站住！”

她再一次把手伸到水里去摸。接着，带着紧张的心情讷讷地说：

“谢尔盖，那儿有石头……出口被石头堵住了！”

我们面面相觑，对这种意外的情况感到惊讶。

随后我说：“这不可能！你可能没弄清楚。谁能这么干呢？”

我举着蜡烛尽量向前照，直到水快淹到烛光为止，这时，我看见在管道顶端和水面之间的空隙处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灰色石块。不能再怀疑了，我们的出路被堵死了，就象被砌死在墓穴里一样。我意识到，我们已濒于绝境。

我真担心莲娜，千万别被这一可怕的事件吓坏了。可她却还尽量给我打气。

“没什么，谢尔盖，别担心，”她说。“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们，把我们挖出来的。只不过得在这个洞里呆上几个小时就是了。”

我想问她，从家里出来时，是不是留了条子，说明她到哪儿去了，但我没敢问：看来她当时不会想到这一点。看着她，我真止不住要笑：她的上衣和裙子全湿了，简直脏得不能再脏了。头发上沾满了泥，凝成一束一束的，象小辫子一样。污水从头发上直往下流。脸全脏了，面颊上还有划破的伤痕。

“只好往回爬，没有别的办法了，”她说。

于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在这个狭窄的管道里转过身来往回爬。

第十六章　被封堵在地下的人

就这样，出口被堵住了，我们被封堵在地下迷宫之中。

莲娜没有气馁。

当我们又爬回走廊里，要坐下歇一会儿的时候，她说：“这可真是奇遇了！这到底是谁干的呢？难道是这个小女孩？”

“哪个小女孩？”

“领我到这里来的那个小女孩，她把我放下井的。也许是她早就想好这么干的？把我诱到这里来的？我相信了她……”

“难道不是索夫科夫把你放下来的？”

“哪个索夫科夫？”

“中士。他是奉命看守井口的。”

“不是，那儿根本没有中士。”

“那么，准是索夫科夫碰上了什么糟糕的事，什么不幸的事…… 如果有他放哨，什么人也不可能往井里扔碳化物的……你是说，有个小女孩把你领来的，是吗？什么样的小女孩？她到底是谁？”

“安静点，安静点，谢尔盖，我请求你！”莲娜看到我激动起来，就安慰着我说。“以后我再把详细情况告诉你。目

前，你首先需要的是休息。我想，过几个小时人们就会找到我们，让我们重见天日。”

我们又回到莲娜找到我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通风器的旁边，把地上的碎玻璃片清理了，挪开桌子，拿来了两张卧榻。爆炸只毁了实验室的一面，即我躺倒在地的那一面墙。对面墙边的东西只受到冲击波的冲击，仍完整无损。

我脱下湿衣服，躺在卧榻上就睡着了。实在太累了。

醒后，我觉得精神和体力都恢复了，头也不痛了。我吃惊地看到桌子上放着几个实验用的小三角铁架子，上边支着作试验用的大瓷杯子，里边装有石蜡，每个杯子里都放有燃着的灯芯。

莲娜听到我醒了，就走了过来：

“怎么着，睡足了？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这是你布置的彩灯？”

“是我。我找到了一整箱石蜡。好不好？”

“妙极了！现在我们用不着担心黑暗了，莲娜，你真是个魔法师呀！”

“要喝茶吗？”她微笑着问我。

“什么？”

“茶……也就是柠檬水。说的更清楚些，是就着葡萄糖块喝放了柠檬酸的水。”

没等我答话，她就把满满一大烧瓶开水、两个薄玻璃烧杯放到桌上，还有两个盛着柠檬酸和葡萄糖的罐子，罐子上标着配用量。

“遗憾的是，”莲娜补上了一句，“没有面包，只能请你吃

豆角了。”

“你从哪儿弄来的豆角？”

“在厨房里找到的。”

“在厨房？这里有厨房？……你已经把所有地方都看过了？”

“是的。只是这里没有到外边去的出口。饭厅、厨房和不大的仓库，里面不知道都有什么……再就是没有窗户和门的墙，丝毫也没有出口的迹象。”

“是吗？没有大工厂？”

“没有，我没看见……”

“嗯……莫明其妙！”

我们就这样就着块状的白葡萄糖喝着热柠檬水，吃着豆角。真是一顿独出新裁的早餐。

早餐……可是，现在是早晨吗？

我的表早就停了。莲娜的表也坏了，她忘了把它从手上摘下来，让水泡了。我把表上了弦，未加考虑地拨到了“上午十点”。我们现在按“自己的时间”过。

“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了，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耐不住性地要求说。

于是，莲娜就把我们分手后那一天不寻常的经过详细地讲给我听了。

她是三点钟从城里回来的。在食堂吃过午饭就回家了。当时我不在家。她等我到六点、八点、十点，可是一直不见我回来。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很不放心。她坐在家里的凳子上惊恐不安地等着我。天已完全黑了下来，这时有

一个长着黑头发，用披巾包着头并遮住半边脸，穿着暗黑色裙子和红上衣的陌生女孩子走到她的跟前。大概这就是我在小船上看到的那个女孩子。莲娜还注意到，这个陌生的女孩子嗓音较粗，手很糙，象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的手。女孩子问：

“您在等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吗？”

莲娜感到诧异，但如实地回答了她。

“您，大概是他的妻子吧？”

“是的。”

“那么，我告诉您。我知道，现在他在什么地方。他正处在危难之中，甚至可能……这是他的信——这封信看来不是写给您的……”

“她递给了我一个拆开的信封和你的证件。我惊呆了……我认出了是你的笔迹。我模模糊糊勉强看完了信，知道你出事了，发生了可怕的情况……我要求小姑娘，”莲娜继续讲着，“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和怎么去找你。”

“我领您去那里，”她说，“只是您不要对任何人讲而且什么也用不着再问。这是件非常冒险的事。”

“是不是去找警察局？”莲娜建议说。

“不，不要！这不行！那样我会死的！”她喊着说，声音中有一种令人害怕的绝望语调。

说到这里，莲娜激动起来并沉默了一会儿。

“接下去又怎么样了呢？”我问。

“后来？我按她的建议换上运动衣裙，拿了几支蜡烛和

一些火柴。随后，我们就去了。”

“走着？”

“走着。坐船过了一条河。”

“可是，有二十多公里呐，知道吗？”

“是的，很远。可是，那也得去。结果我们就去了。”

她们在黑暗中默不作声地走着。陌生的姑娘走在前边，莲娜跟随在后。不管有路或是没有路，不顾面前是森林或是灌木丛，她们一股劲儿地走着，最后到了灰色山岩跟前。到这里，陌生姑娘越发小心翼翼起来。她领着莲娜弃路而行，径直穿过灌木，一直顺着山岩边走，她始终都在向四下里张望并仔细倾听着动静。她们就这样好不容易来到了井旁。她向莲娜提出了最后的告诫，她说，将等莲娜半个小时，接着，就把吊斗放下了井底……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莲娜把事情经过都讲完了。“我相信了这个小姑娘。万没有想到，她会如此诡计多端。就是现在，我也不敢相信，她会是这么奸诈……不过，”她又轻声说道，“我总算找到了你，你还活着，我们现在在一起了，这一点已经够不错的了。”

“照我看，”我说，“半个小时的时间小姑娘是不可能往井里扔那么多的石头。这需要几个人的力量才能做到。她可能是个同犯……如果是这样，那她为什么竟如此小心、紧张而不是无所顾及地径直把你领到这里来呢？这里一定别有缘故……你说，我的信你还保留在身上吗？”

她把信封递给了我。当然，这是我想要下井时写给罗日科夫的那封信。这封信没有送出去，所以，少校也不会知道

发生了什么情况。

……吃过早饭之后，我们查看了一下“我们的领地”，希望能有所发现。在离开我床铺不远的墙边，我看到有一个大的钢罐，上边涂着蓝颜色。从里边咝咝地往外冒着气。莲娜走过去，把笼头拧紧了。

“要节省氧气。”她说。

“氧气？你想干什么？补充氧气？”

“是的。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你睡的时候，我把氧气管一直拉到你面前。”

“嗯？难怪我头脑这么清醒了！莲娜，和你在一起可真是万无一失。”我赞扬她说。

当然，我们首先朝仓库走去。但是，回来时却两手空空。箱子里有许多非常好的纸、墨汁、铅笔、两个计算机——但就是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真令人失望！看来，只有吃葡萄糖和豆角过活了。

后来，我领着莲娜把办公室和其他场所都看过了。在微弱的油灯下，这个铜制的大怪物几乎无法看清，而当我站到桌子上，把灯碗向上举起，照亮了这个日耳曼神像毫无生气的面容和举过头的那个沉重的锤子时，莲娜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

“这个怪物太可怕了！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她说。“谢尔盖，我告诉你，再别到这里来了。”

关于单身禁闭室的事，我根本没告诉她。为什么要提起那受尽折磨而死的囚犯的惨不忍睹的情景使她惊恐不安呢？

第二天依然如故，没什么新情况。我们到处查看了并经

常站在泄水口旁边仔细听，是否有锤子和铲子敲击的动静。可是，一片寂静，这使我精神上感到惶恐不安。

傍晚（按照我们的时间概念），我们坐在排水室旁，一直听着。这已成为我们经常消磨时间的方法。四个芯的石蜡油灯发出点点光亮，照着黑暗的坑洞和管道乌黑的洞孔，从那里冒出潮湿的气味。我们默不作声地嚼着葡萄糖块。莲娜有时把灯芯拨拨。我瞧着排水装置，心中算计着，它能排多少污水。得出的结论是，它能排出大量的水—— 大约每秒钟一立方米。

我已经说过，乙炔的爆炸使排水管的口暴露出来，水是顺排水管流聚到排水室的。直径不大的管道有很多，但是，很宽的却只有一条。显然，废水是从地下工厂的主要车间，顺那条宽管道流出来的。这时，我头脑中立即浮现出一种想法，即顺着排水系统查看，而且继续顺着这条宽管道向前走。它准会通向一个地方！莲娜支持我的这一方案。

我们开始查看管道。管道是用铅作成的，断面是椭圆形的，约有 50×30 公分大小。我侧身试着往里钻，勉强能钻进去，双膝紧贴着管道壁，费很大劲才可以往前移动，可是，要往回退就不可能了。不言 而喻，这样做要冒很大的危险．要象蚯蚓一样往前蠕动。如果卡在某个窄的地方或管道的拐角处，或者有栅栏挡住去路，那么就剩下死路一条了。

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爬进去。

莲娜决定先爬进去，她脚上拴根绳子，这样我随时可以抓住绳子把她拉回来。我们有三条十米长的绳子，还是第一次地下探查时留下来的。我试了试它是否结实，把两根结在



一起，然后牢牢地捆在了莲娜的脚上。

她拿着一盏石蜡油灯，侧身钻进了管道口，绳子一米米地拖进了黑窟窿。忽然，绳子猛地被往里拉了一下，接着，我就听到了莲娜大声地叫我：

“过来，谢尔盖，过来！……这里有个新地洞，特别大！”

我把绳子的这一头捆在胸间，把我们的“宝贝”口袋（里面装着葡萄糖、石蜡、柠檬酸、火柴）拴在一只脚上，爬进了管道口。

第十七章　　日耳曼神像的秘密

在管道里很难爬行的情形实在难以想象。脚在光滑的管道壁上不停地打滑，借着手脚的撑力，每次最多只能向前挪动四分之三米。由于身体处于异常的状态中，两臂和脖子疼得实在难受。铅的味道也令人作呕。特别是快到尽头的时候，管道猛向上拐去，这时，前进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我终于克服困难，从管道钻了出来，舒展开我已麻木的四肢。莲娜帮我把绳子解开：

“看哪，谢尔盖，咱们到哪儿啦！”

她拿着油灯，拉着我顺梯子往上走。

我们很快来到一个黑暗而空旷的地方。我们的小灯放出的微弱光亮仅仅照明地板和墙壁的一部分，而这里给人以一种茫无边际的感觉。起初，甚至形成一种印象，好象我们已来到了地面，好象我们于静静的黑夜里站在山岩的脚下，头顶上是乌云密布的天空……

可是，这时莲娜拍手喊道：“啊呜！……啊呜！……”回音立刻从四面八方回荡过来，错觉立即烟消云散，我们明白了，现在仍然处在地洞之中，而且是个并不太高的地洞。我们非常小心地顺着墙边往前走。墙上挂满了电线、小管儿和电缆。莲娜发现墙上有一个刀形开关而且在我还没来得及

制止她时，她已经把它合上了。刹那间，耀眼的光线立即把四周照得通明。照亮了所有的地方——天花板上、四周的墙壁上和所有的设备上的小灯泡都一齐亮了。操纵杆、测量仪器、配电盘上的小灯泡也都亮了起来。真象一串串的彩灯！

我们从黑暗中立即来到了光明的王国，开始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把眼眯了起来。

"莲娜，这么干太危险了，"我对妻子说道，"少校曾严厉禁止过触动任何电钮、开关和类似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真的？"莲娜大吃一惊，"我再不这么干了！"

这是一个利用天然岩洞建成的厂房，里面安装着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地面是台阶式的。最高处是一台我所熟悉的矿石破碎机。这部机器的钢齿能破碎最坚硬的矿石，还有能把矿石磨成最细粉末的球磨机，再就是机械过滤器、离心机、抽水机、自动磅秤和贮矿槽。第二层上安置着大桶、拌合机、过滤器、离心机、抽水机，最下边是结构非常复杂的电炉，我一下子没能搞清楚是什么东西。全部机器设备都不是大型的，可是，在技术上都是先进而完善的。

就种种特征来看，我们面前是座生产率不高的冶炼工厂——一昼夜可以加工三至五吨矿石。

地上撂着几块矿石。我拾起了一些矿样。这是一种闪光的黑色沉重矿物，它带有黄绿色的细脉和小斑点。我和莲娜都确定不了这是什么东西。

在第一层台阶上有一扇门，从这里有传送带向破碎机供料。从这扇门进去是一条又黑又窄的隧道，它可能是通向矿

场的。我们本来想通过这条隧道走出地面，可是里面的空气令人窒息，油灯的光亮也颤颤欲灭。这说明隧道与外界不通。所以，我们也就暂时放弃了查看这条隧道的想法。

另一个第二层台阶上的门更令人感兴趣。它敞向一条又宽、照明又亮的通道，顺这条通道我们来到一间办公室的门前，而这间办公室同我们过去见到过的那间一模一样。同样的一张桌子，靠后墙立着同样骇人的日耳曼神的铸像，还有前面堆着灰烬的电壁炉…… 不过，这里没有书柜，摆着几张办公桌，也没有安乐椅，而只是几把普通的椅子。现在，在明亮的灯光下，这个大怪物显得尤其难看、可怕。

“谢尔盖,不要走近他!”莲娜不安地悄悄说道。“我请求你!”

办公室旁边是另一个房间，里边摆着许多空的绘图板、桌子和柜子。这是工厂的设计部门。

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大的修理车间，后来又看到了一个电话室和一个贮藏所。贮藏室内堆满了各种食品，而不是纸张和墨水。这里有大量的饼干、罐头、茶、白糖、甚至各种牌子的酒。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食品，能在这个被困的地穴里呆上一段较长的时间了。

走廊仍向前延伸，可是，我们已决定，今天到此为止。我的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于是，我们躺在设计室的卧榻上，很快就入了梦境。

我隐隐约约听到很远的地方有敲击东西的声音，于是醒了过来，象是什么地方有击打金属的声音。是真的，还是梦？我叫了一下莲娜。

“我好象也听到了类似的声音，”她回答说，“我只是没想惊动你。起来吧，咱们接着去查看。象是有人在敲什么。”

仓库往前去的一个房间是蓄电室，接着是浴室。继续往前走，廊子被一面严实的钢板墙挡住了，墙上画着个大“A”字，是用哥特式字体（见棱角的艺术体字形——译者注）写的。

“这里就是出口！”莲娜喊了起来。“字母‘A’——这大概就是德文字‘Аусгang’，俄文意思是‘出口’。终于找到了！”

我仔细地查看了这块钢板墙，上面没有把手，连个缝隙也找不到，是块完整而光滑的金属板。从敲板面发出的声音来断判，这扇门很厚，象战舰的装甲钢板似的。

“如果说这是通向外边的出口的话，那我们也未必能从这里出去。打开这样的门，谈何容易，”我说，可是自己又在想：“真怪，也不象水闸，可是，李姆舍的命令中明明讲到，从这里出去要经过一个水闸。”

我们返回去，吃了早饭。而这时，令人纳闷的敲击声又听到了。现在，声音很轻，不明显而且一声与一声之间有较长的间隔。声音是顺着铁的通风管道传过来的。这会是什么呢？根据敲声判断，非常象莫尔斯电报机的电码。这可不能忽视。我立刻把电码记了下来。确实是一段电文，只是太短而且简直不能理解：

“耳朵，然后是眼睛。”

这个电码呼号重复了好几遍，接着，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这些声音到底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呢？非常可能是从地面

上，因为通风管道必定要通往地面。这些信号究竟是谁发的呢？当然是少校了，也只能是他。他肯定知道我出了事，也知道我在这里。而现在，他是用莫尔斯电码向我作指示。可是，“耳朵，然后是眼睛。”这个怪句子到底表示什么意思呢？

一个新谜！我们煞费苦心地猜了一整天。我也几次用莫尔斯电码向少校呼问这句话的意思。但是，都没得到答复。我灰心丧气地躺下睡觉了，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这句讨厌的话一直在我头脑里转。终于我得出了结论，一定是罗日科夫暗示我们要多听少看，因此，我们能否得救也就取决于能否注意倾听到什么了。

我的猜想是不对头的，因为少校不会采取这种方法。这一点我自己也完全意识到了，但是，想到这里我只好告一段落，于是我就睡着了。

妻子把我叫醒。

“谢尔盖，你听着！”她激动地对我耳语道，“咱们到办公室。我有个想法……”

办公室里点着灯。莲娜走近了日耳曼神像。

“你看，”她指着野猪的头说，“耳朵和眼睛……你再来看这里，可千万别去碰：这个眼睛象是活动的。”

我仔细一看，确实，绿玻璃眼和青铜的眼框之间有一圈显而易见的空隙，这个眼睛非常象是按钮。我刚想去碰它，莲娜立即制止了我。

“别，不要，不要碰！”她抓住我的手后，喊道。“不行，不行，这有危险！”

“这有什么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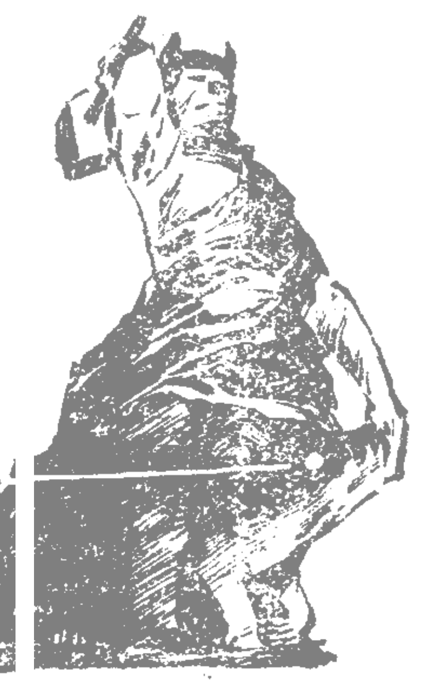
“不知道，什么都可能发生：或是爆炸，或是射击，或是一股电流。要极为小心才是！我请求你！”

“可是，不管怎么样，也得试试呀，不是吗？”

“要采用一切预防措施才是。要想得周到些。”

她说得非常肯定而令人信服，我只好听从了。

我们找到了一条约五米长的钢管，把它用一根绳挂在吊灯架上，然后我们身子紧贴着墙，用钢管的另一端去碰野猪的那个眼睛。



刚一碰——刹那间，庞然大物高举着的那只手在空中闪动了一下，铜



锤打在钢管上，发出了巨响，而那只手抡了一圈之后，又恢复了原位……我们两个人都倒在了地上，就在此刻，野猪的那只眼睛立即闪出了吓人的红绿光，接着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我们马上从屋里跑出来。这时，到处都是警报的响声，信号灯一眨一眨的，铃声四起……我们在走廊里乱跑，不知应该怎么办，也不知怎样才能躲开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警报声。可是，突然警报声停了，显然，响过一定的时间后，警报自动停止了。

“罗日科夫给我们的主意可真不错呀！”我略喘了口气说道；“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已真的变成肉饼了。”

“我也一样。”

“可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忘了看一下耳朵。我们去查看一下耳朵，好吗？”

“好吧！”

怪物两个耳朵中的一个是紧贴着头的，根本不能动弹，而另一只耳朵却向前探着。我小心翼翼地，不仅怕碰着，而且连气都不敢喘，仔细把它查看了一番。无疑，这只耳朵也是可以动的。耳朵根的地方看得出，有润滑油的痕迹。有了上次沉痛的经验教训，我们再次决定从远处行动，还是用一根钢管。我们用一根钢管象按按钮那样，去碰那只耳朵，然后象扒拉杠杆似的，用力左右、上下的拨弄它，全然无效！青铜的耳朵在野猪的头上一动不动。只剩下一个办法没去试了——那就是，象用钥匙那样，扭转它。我把钢管的头弯成了三棱形，把它放在了耳朵尖上并开始小心谨慎地转动着钢管。钢管的三棱形顶端很轻松地转了整个半周，什么变化也没出现。毫无动静！

我们向各个方向拨动了这只耳朵。它只是象个开关那样，发出哔啷的声音。

莲娜头一个猜到了是什么原因。

“显而易见，”她说，“应该先转动耳朵，随后再碰眼睛。你想想那句话：‘耳朵，然后是眼睛。’懂了吗？”

去碰危险的按钮太可怕了。我们拿着钢管，不由自主地看着偶像持铜锤的那只手又一次轻轻地碰了一下那只眼

睛……它又闪出了可怕的红光，可是，这次巨大的偶像的躯体却轻盈、平稳地转向一边，在它左边出现了一条通道。

通道里一片漆黑。



第十八章　地下水闸

我们手拉着手，怀着惊奇和恐惧的矛盾心情望着敞开的道口。这是通往自由的道路、重见天日的道路。可是，这条路是多么黑呀！从办公室里射出的光亮穿过屋门，只能照出低矮的拱顶和梯子的头几个梯蹬。梯子陡直地延伸下去，底下一片乌黑，有股象是墓穴里的潮湿味和寒气从里边散发出来。

少校完全正确，他给我们指明了出路。可是，究竟为什么他的指示只是这么简单呢？他又为什么没回答我的问题，也没有详细地说明情况呢？结果，当时使我们险遭严重的不幸。对这一点我仍困惑不解。这种困惑的感觉常常引起我的不安和畏惧。我现在就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个黑洞却使我感到害怕。我觉得这是一个诱人的陷阱。何况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有，地方干净、明亮，也比较安全，所以不想离开这里，深入那凶吉莫测的黑暗地道里去。

“我们用不着慌，”我说出了我的想法，“我们先得把一切都查看好，研究一下。下去之前，要有所准备，作到能进能退，以防万一。”

莲娜表示同意。

我走到了道口的跟前，好好瞧了瞧。日耳曼神像的面向

位置与屋子的侧面墙壁相平行，它闪出了一条不到一米宽的通道。这条道正在那可怕的锤子打击范围之内。野猪眼睛中射出的红绿色光线正横射过通道。我发现这道光线直对着安在门框上的一小块玻璃。

“嘿，”我想，“这道光线值得怀疑。象一个带有光电管的自动装置。谁知道这个自动装置的控制作用是什么？可能那只手和大锤又会抡下来。可得当心呀！”

我往后退了几步，把一个沙发垫子扔进了通道。当垫子在空中掠过那条绿色的光束时，没有立即发生什么变化，可是过了没有多大一会儿，这一庞然大物先是动了一下，然后迅速而平稳地转过身子，又站到了原处，通道关上了。就在这时，野猪眼睛的亮光也熄灭了。

一切都明白了。原来眼孔里射出的绿光束是一个光电自动控制器。当人进入通道后，这一装置就自动封闭通道口。这就是说，如果这道光束不被任何物体切断的话，门就不会关闭。野猪眼睛离地面约有一公尺高。因此，从光线底下爬过去，完全是可能的，特别是我和莲娜对爬行已有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更不成什么问题了。

我做了几次开门和关门的试验。然后，避免接触这道光束，用一块木板在绿光的上下移动，又在绿光下面把椅子拖来拖去，试验了几次。最后，我终于确信我的猜测是正确无误的了。于是我们决定进入通道。

我们带了一根小铁棍、火柴、还有那一度起了很大作用的油灯。提包里装满了面包、饼干、罐头，水壶里装满了酒。于是我身贴地面，在这座青铜偶像的脚旁爬了过去。莲

娜跟在我的后面。接着，我们沿着一排灰色的冷冰冰的石阶走了下去。我数了，我们一共下了五十二个台阶就来到一间上面是拱形天花板的相当宽敞的大厅。

忽然，前面出现了微弱的闪光，原来是我们的灯光映射在黑色的水面上。我们来到了一个象游泳池一样的地下港口，脚下是一个码头，约有两米来宽。"码头"左右两边都与漆黑的通道相连接。这里空气郁闷、阴暗、臭浊、潮湿，寒气逼人。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不禁打起寒战。莲娜缩成一团，把上衣的钮扣全都扣上了。

我们朝水边走去。

坚固的铁梯子一直通到水下。梯子的扶手在烛光的照射下在水中发出暗淡的光亮。水象墨汁一样黑。一看就知道很阔很深。

毫无疑问，我们来到的地方，正是冯·李姆舍最后一次指示中提到的那个水闸。

忽然，吹来一阵微风，油灯的火苗闪动了一下，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留神！你看见了没有？"

"这是什么？"

"火苗在晃动，有风！"

"这有什么呢？"

"象是门关上了。"

"谢尔盖，你怎么啦？这不可能……上面没有人啊。"

"得去看看。"

"别去！别去！你别走，等等！"莲娜害怕起来。"说不定



那儿有人。他们在暗处，而你手里拿着灯，别去，我求求你！”

她急忙把两个油灯都吹灭了，把我拉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她的恐惧也感染了我，我紧贴着墙，手里攥着那唯一的武器——小铁棍，准备对付那神秘莫测的敌人。当时，我真后悔没有带上一支手枪，好多抽屉里不是都有手枪吗？如果手中有枪，碰上对手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也许他这时正在上面的门旁站着，一会儿就要下来……真会这样吗？也许这是我在胡想？不过要是从天花板上掉下一块石灰或是有一张纸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把那道绿光哪怕是刹那间切断的话，门也可能自动关闭。再说，我们没有查看过矿场，很可能那里有人藏着……

我们站在潮湿的角落里，在黑暗中向四周窥视，并细听着是否有什么动静。这时，我和莲娜都有同样的想法：门肯定是关上了。

果然如此，在平安无事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镇定下来了。上去查看了一下梯子，发现原来被灯光照得通明的入口已经被一块厚厚的钢板封住了。地道口的盖子盖上了。“为什么我没想到用一根结实的棍子撑住门呢？那样就可以保住我们的退路了。为什么当时没有慎重地考虑到这一点呢？”

“我们也不要太难过，”从楼梯上下来时，莲娜说，“这个大水箱应该是有出口的。否则少校就不会告诉我们铜像的秘密了，对吗？谢尔盖。”

她现在精神仍然饱满，而我的情绪比较低沉。

“还不清楚是谁给我们打的电码信号，”我想。“也许根本就不是少校，也许正是那些堵井的敌人，他们现在又把我们引进了这阴森可怕的地狱，使我们葬身地下。”

“谢尔盖，万一给我们发信号的不是少校，而是另外什么人……”莲娜猜中了我的想法。“而这里根本就没有出口……”

“不应该过早的绝望，莲娜，我们什么都还没有查看过呢！”

“我并没有绝望，我只是认为可能有敌人，应该有所警惕。”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查看我们被监禁的这个地方 。

入口的右侧是一条大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通向一间狭窄的房间。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橱柜和一部电话。往四周墙上一瞧，上面挂满了潜水用具，这使我们非常惊奇。这是一些浅水作业轻便潜水用具。一共有十付。十付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只是尺码大小不同。每个潜水器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个能扣在潜水员双肩上的带有玻璃视孔的大铜面罩，背负式带有软管和开关的压缩空气瓶和一双沉重的潜水鞋。可是，橡皮潜水服却没有，看来，在温度适中的河水里进行浅水作业用不着潜水服的。

桌子上除了电话机外就只有一盏大煤油灯，几个贴着德国商标的空酒瓶和一个杯子。

如果别人能戴上这种潜水用具下水，那末，我们也能做到这 点。不过，他们会使用这种潜水器具，而我们不会。但

是，我们可以学会使用它。我一个人先冒冒险，下去试一试，然后我和莲娜再一起下去。

已是半夜了。黑夜里在水下活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等到天明。利用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弄清潜水用具的结构并试用一下。

我们把煤油灯点燃，莲娜着手准备早餐。

怀疑这里还有人暗中活动的想法刚刚在我们头脑里消失，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新情况，又使我们不安起来。当时，我正在开罐头，这时，莲娜突然呆住了，仔细倾听着什么……

“谢尔盖，你听见了吗？”她低声说道。

“什么？”

“别作声……”

我走到门旁，朝黑暗里望去，在寂静中隐约听到轻微的呻吟。我觉得这呻吟好象是从水里传出来的，这就格外可怕了。我浑身冰凉，妻子站在我后面象发疟疾似的打颤。

“谢尔盖，这是什么声音？”她悄悄问道。我听得见她的牙齿在打战。

“有人在呻吟，应该去看看。”

“站住！等一等！”

“要去，你在后面拿着马灯。必要时，马上熄灭它。”

我拿起小铁棍，又走到小平台上那儿什么人也没有。马灯的黄光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声音不是从这儿来的。我们小心翼翼地经过梯子口向对面的通道走去。那儿也没有人，唯一的一扇门也闩上了，门闩上还缠绕着铁丝，也许声音是

从那儿传来的。我和莲娜用小铁棍毫不费劲地就把铁丝撬断了……

就在门槛旁边躺着一个人，他身穿一件湿漉漉的绿色军上衣。他已经死了，僵硬的身体歪斜地倒在地上，两手摊开着，毫无生气的眼睛呆滞地瞪着。我把马灯贴近他的脸一照，立刻认出，他就是索夫科夫中士。他是胸部中弹而死的。我攥住他的手，手已经冰凉了。

“莲娜，”我说，“他不会呻吟的，他早已死了。”

“等一等，”她说着，拿起马灯朝黑暗的角落里走去。

“这儿有个女孩子！”——我听到她惊讶的声音，“正是那个带我来到井旁的女孩……谢尔盖，她也死了！谢尔盖，是打死的！”

起先我以为在通风管道旁边放着的是一堆湿漉漉的烂布，现在我才看清楚，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深色裙子和红上衣。过去曾在一个极不寻常的场合见过这个神出鬼没的女孩。这又是什么？一条大的深色披肩已从死者头上掉了下来，露出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孩子的头。怎么头发剪掉了！啊，原来是一个男孩子！是男扮女装。我认出他来了，他是别佳。是的，是他！他那匀称的身材和一张好看的脸，我还记得很清楚……多么可怕的意外啊！我把耳朵贴在这个不幸的男孩子胸前，他的呼吸已经停止了。我拿起他的手，从手里掉出一块小石片。我明白了，他曾用这石块敲过通风管道，给我发信号。他的手还是热的，可是没有脉搏了。他刚死不久。

“可怜的孩子！”我想，“是什么可怕的势力把你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了呢？这一奇异的乔装又是什么用意呢？”

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使莲娜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紧紧依偎着我，无声地哭泣着，浑身发抖。我也差一点哭了起来……

“快离开这儿，快……快……”她低声说声。

我们决定不等天明就立刻下到水底去。

我已在摆弄潜水用具，不知这些东西应该怎么使用。忽然，电话铃出乎意外地响了起来。我和莲娜都惊讶地发呆了。我甚至惧怕起来，这和看到死人复生、听到坟墓里的人说话一样可怕。这说明上面肯定是有人了！这个可怕的、来无影去无踪的人把我们锁在这儿，现在又给我们打电话，这是为什么？显然是想了解我们是否在这儿……要不要去接电话？也许，还是不要暴露自己为好。我犹豫起来。这时，电话一直在响。我又有了另一个想法：首先，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其次，他肯定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也怕我们。于是，我又大胆地拿起电话：

“喂！”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好容易才打通了。”

“罗日科夫同志！是您！您是怎么到地下工厂来的？”

“根本就不在地下工厂。”

“您现在从哪儿打电话？”

“是从没有完工的德国工事给您打电话……您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儿有电话线路，并且出乎意料的是，能和别处通话。我已经一连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拨了所有的号码。您在哪儿？”

“大概是在水闸这儿。您记得吗？指令中提到过这个地方。我认为，这里应该有通到河里的水下出口……这儿有潜水服，我们已经准备下水了。”

“您说的‘我们’是指谁？”

“我和我的妻子。她是来水泥厂工作的。”

“是这样的……明白了。”

“罗日科夫同志！被打死的索夫科夫尸体在这儿。”

“是吗？”

“还有别佳，也死了，他死了刚刚不大一会儿。”

“还有别佳？他是穿的女孩子衣服吧？”

“是女服。”

“原来是这样。我过去担心的就是……”

少校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是想，”少校继续说，“穿上潜水服下水。可是你们会使用它吗？”

“不会，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最好等一下，我去叫个潜水教官来谈谈，话筒可别放下……”

等了很久，大约三个小时。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把莲娜折腾得精疲力尽了。她睡着了。我坐在桌旁打盹，手里一直拿着电话筒。

终于在话筒里听到了声音，少校先说了几句，后来潜水员和我接上了话。根据我所谈的情况，潜水员确定，这是他见过多次的一种带自动供氧器的德国潜水服。据他说，用起来并不难。他仔细地告诉我，潜水用具的部件应该怎么安

接，怎么穿，怎么用，怎么试，还有在水下怎么行动，并建议我们下水时要尽量慢一些，在水下走动要小心，不要着急，要使身子保持直立状态。

“你们能从水底下过去的，不会有问题。”他鼓励我，“就是要稍挨点冻，现在水有点凉。”

我们穿上潜水服，细心地检查了各个部件。穿上沉重的潜水鞋，这时要挪动一步都是很费力的。我拿上小铁棍，莲娜带了一个空酒瓶。根据少校的指示，在我们进入河床的时候把瓶子扔到水里。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打开空气阀，钻到了水里。

河水简直象冰一样凉。直到现在，只要我一想起那一次进入冰水的滋味，不禁还要打寒战。当时，我在前面，莲娜在后面，我们抓着冰冷的梯子扶手，一步步地潜入水底。刺骨的寒气从脚跟直侵入脑髓（读者还记得，当时我们下水时没有穿潜水橡皮衣）。

我们下到大约十公尺深的地方就是水底了。底下淤积的烂泥齐膝深。下面寂静无声，一片昏暗……只听得从面罩往外冒小气泡的声音。我们艰难地沿着粘糊糊的墙壁摸着前进。后来，走进一个宽敞的水下通道，就顺着那光滑的底面往下走，渐渐亮起来。通道也开阔多了。不一会儿我们已经走在沙底上了，水已呈现出半透明的绿色。再走几步，就到了河床，这儿就是我们应该等候潜水员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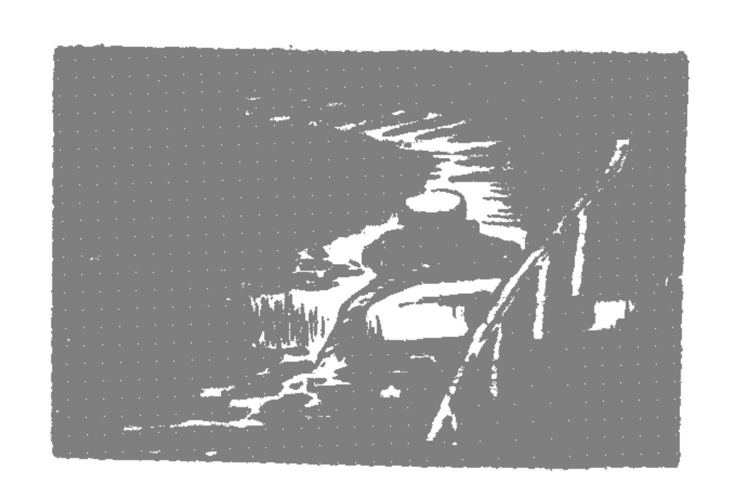
我扔下瓶子，瓶子先是缓慢地，随后愈来愈快地浮向水面。这瓶子就是规定的信号。

现在已能看清周围几步远的地方。我细细地察看着：在

河底的泥沙中，东一个西一个地露出一些石头桩子，还有钢梁、厚铁板和固定铁链的牢固的铁环，链条上长满了绿色的水草。一群小鱼围绕着铁链游动。这是一项工程的残骸。

我们两人冻得半死，靠得紧紧地站着。幸好还没有等得太久。周围墨绿色的水开始动荡，我们逐渐地辨别出一个穿着橡皮衣的潜水员的笨拙体态。他的面罩活象一个海象的头。面罩上面冒着许多小气泡。他身后又出现了另一个潜水员，拖着一个系在绳子上的浮标。这浮标就象小孩玩的气球一样，是用来标明水下入口的。随后又出现了第三个、第四个潜水员，最后一人示意我们跟着他走。我们走着，艰难地挪动着冻僵的身躯。

这时，阳光透过清澈的河水照在泥沙、小石子和娇嫩的水草上。水面上的粼波在水底映出无数闪烁着的光点。鱼群由于我们的出现而东奔西窜，就象一道道的银光射向四方。我们头顶上的水面如同一面带着一些奇异图案的摇摆的镜子……这面镜子离我们愈来愈近，我用头顶破了镜面，透过面罩上沾满水珠的玻璃视孔看见了河岸。岸上站着罗日科夫同志。



第十九章　促膝谈心

我们终于逃出了那黑暗的坟墓，重新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关怀和同情我们的朋友之中。

我又见到了明媚的阳光，蔚蓝的天空，郁郁葱葱的树木，感受到温柔的微风，还听到那愉快的鸟语——这失而复得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无限的喜悦。

我们和罗日科夫亲切地会面了。我感到，他见我安然无恙地活着，非常高兴。他那通常是过份严厉的表情，现在也变得慈祥起来，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他的声调听起来不再是那样严肃，而是和蔼可亲的了。

我坐着，喝着茶，十分激动，语无伦次地向他讲述我们在灰色山岩地底下的遇险经过。

莲娜睡着了，于是我就无所顾忌地夸奖了她这次表现得是多么的精明能干和勇敢顽强。

少校面带笑容，一声不响地听我说，他不打断我的话，也不向我提出问题。他当然十分清楚我当时的心情，也能理解我当时是不可能把事情经过讲述得很有条理的。

“是这样的，谢尔盖，”他对我说，还是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关于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好好地谈呢。而现在……”他与医生交换了眼色，“您需要的是好好地休息，这一点由医

生负责管。”

我和莲娜坐上一艘停在岸边的小汽艇，被送到了工厂的医院。让我躺在床上，给我服了镇静药后，我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醒来后，觉得体力恢复了，头脑也清醒了，而同时也极为不快地意识到，我头天晚上给少校谈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而真正要谈的却没有谈到，甚至连被敌人窃走的帕西柯的笔记本的下落这一件至关重大的事，也没有询问一下。我还想到，少校对我这次轻举妄动，绝不会轻易放过，我和他之间必然会有一场严肃的谈话。上次少校对我如此和蔼亲切，那完全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因为我当时的身体虚弱不堪。我想起了别佳和索夫科夫的死。正是由于这个小男孩临死前的英勇行为，我们才能从地下逃出来。我还想起了，我几次幸免于死完全是由于侥倖和偶然的一些原因。想到这些我感到很内疚。莲娜看来是了解我这种抑郁不欢的心情的，她从女病房捎了信来鼓励我，但这也不能驱散我的忧伤。我心情不安地等待着少校的到来。天黑时他果然来了。

“您觉得好些了吗，谢尔盖同志？好象已恢复正常了？”他问得够冷淡的。

“谢谢，很好。”

“那么请您详详细细地谈谈，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也就是八月三号以来您所经历的全部情况，尽量不要遗漏任何一点细节。”

我仔细地叙述了全部情况。

我还谈到自己的推测，我认为在那块标有“A”的装甲

钢板背后是地下工厂的第三部分。另外，地下还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在我们进入地下水闸以后，是他随即把门关上的。

“对，”少校打断我的话说，“您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在我想与你们取得联系而连续拨着所有的电话号码时，我听见象是有人拿起了话筒，可后来又把它搁下了。我当时以为是你们，现在看来还有另外一个人。”

又是一阵可怕的感觉涌上心头，原来当我和莲娜在地下室呆着的时候，我们正处于危险之中。

少校看看我，微笑了一下。

“有点后怕吗？”他问道，“不用说，你们当时是处在险境中，……再继续往下谈吧，你们是怎样下到水闸里的，又是怎么找到索夫科夫中士的尸体的？”

我对他谈完了我们历险的经过。

“罗日科夫同志，我知道，我做得太轻率了，在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前是不该下井的。”到此我说完了。

“是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您这种自作主张来辩解。您本应该照看别佳，还要尽可能地保护他。我想起了，您曾经许诺过要这样做的。而现在这孩子遭到了不幸。”

“索夫科夫也同样如此。”

“索夫科夫中士以身殉职了。我们正在打仗，这是一场无形的、不间断的、残酷的战争。不招致牺牲的战争是没有的。我们大家，也就是说我、赫鲁廖夫中尉和索夫科夫中士为了祖国利益随时都应准备牺牲自己，这是我们的天职。可别佳就不一样了。不过……”他轻声地补充说，“我自己对此

是有责任的，本应把别佳隔离起来，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别佳离家后不是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去旅行了，而是到敌人的巢穴里去了。我一心想着的就是寻找帕西柯的笔记本。我以为，敌人窃走了这极为重要的文件后就会尽快地隐藏起来，逃离这个对他们很不安全的地方，哪怕是暂时离开一下呐！可情况并非如此。这里必定有原因使他们和地下工厂结下了不解之缘，但这个原因我暂时还未弄清。他们围着水井转，封井口，这并不是因为你们钻进去了，因为电石、石块、水泥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你们，可以说正好碰到他们手里。”

“罗日科夫同志，”我问，“您说，我的侦察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呀，对吗？”

“当然罗，您发现了地下工厂，找到了工厂的真正入口，弄清了雕像的用途。在这以前我们认为这座雕像仅仅是一个怪诞的装饰。如果不是你们，它的秘密别佳就只能带进坟墓里去了。”

我记起了，我和莲娜还带回了几块矿石。我立刻到挂在椅子上的那件衣服口袋里去找，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着我的一些东西，有钱包、手绢、折叠刀、手表，可就没有矿石。

“您找矿石？”少校笑着说，“别找了，我看见这些矿石以后，就把它们拿走了。”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盒子，打开后，里面放着用纸包着的几块黑色矿石，上面还有绿色的细纹。这正是我们在工厂厂房的上层拣来的。

“这是什么矿石？您认出了吗？”我问。

“你们不知道吗？”

“ 不知道。”

“那末你们估计是什么呢？”

“不知道。可能是铜矿，或者是镍矿。”

“你们从未学过冶金学和矿物学？”

“没有，从没学过。”

“ 莲娜呢 ?”

“她也没有。我们两人都是研究硅酸盐工业和水泥工业的。”

“知道了。”罗日科夫扣上盛着样品的盒子，把它放进了皮包。“请注意，谢尔盖同志，”他严肃地说道，“对了，你们对在法西斯匪徒的地下工厂里遇到的情况和你们在那儿看到的一切必须严守秘密。我预先提醒你们，这是一件国家大事，明白吗？我坚决要求你们保持缄默。我能信得过你们吗？”

“可以！完全可以！向您保证！”

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

“不管怎么说，”他补充道，“你们做得对，取回了矿石样品，这样，在我们亲自下到这个地下工厂之前，我们完全有把握地了解了它的情况。”

“可您还没有去过这个工厂？”

“没有去过，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 为什么 ?”

“潜水员查明，挡在办公室通到水闸的道口上的那块装甲钢板非常厚，是用一种特别坚固的锰钢制成的，任何金钢石钻头都钻不透它。就连小规模的炸药爆破也不行。只有极强大的爆炸才能打穿它。可是这样爆炸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整

个地下工厂的倒塌，引起一场普遍的灾难。”

“那怎么办？”

“也许，能够用电流把钢熔化。这让专家们去考虑吧，我们总会有办法来对付这些障碍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少校站起身来告辞。

“好了，谢尔盖同志，好好休息，祝您早日康复。您取得了很好的教训，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鼓励并重视主动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是合理的，是有现实根据的。好奇或是无故地去追求惊险——这些都不是可以任性的理由。任性将会给您带来极坏的结果。”

“是这样，如果不是您的电话，恐怕事情不会这么顺利就完结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潜水员的指点，我们是否能逃出水闸。庆幸的是，您在工事的废墟里找到了电话！”

“赫鲁廖夫中尉找到了切断的电线头。我托嘱他侦察这个未完工的堡垒。当时我们就知道这堡垒与法西斯的地下工程有着某种联系，我们把自动电话机接到了电线头上——于是，正象您所见到的那样，接通了。”

少校再一次紧握着我的手，向我告别，然后就走出了病房。

这样一来，我忐忑不安等待同罗日科夫少校的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依然受到他的信任。少校的话使我很受鼓舞，我决定向他提几个很久以来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

“罗日科夫少校！”我喊了一声，在走廊里追上他。“工程师帕西柯的笔记本怎样啦？是找到了，还是仍旧毫无下落呢？”

少校停住脚步，不满地蹙起眉头。

“谢尔盖同志，”他冷淡地说道，“您没能很好理解我所讲过的有关保守国家机密的话。记住：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提出这类性质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自然会原原本本告诉您的。更何况在这里谈这类事情是完全不适合的。”

他走了。我一个人留下来，满脸羞愧，无地自容地暗自思忖自己这不知分寸的谈话。

过了一段时候，我才详尽地了解到少校和他的部下在寻找被劫文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第二十章　沼泽地上的信号

读者当然记得，上文提到的事件发生时，水泥工厂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一面在安装各种设备，一面在扩大泥灰岩露天开采场。为了能够迅速组织好开采合乎质量要求的泥灰岩的工作，在开采场设计了直接同各开采队保持无线电联系的通讯系统。

工厂委员会主席彼特利亚克夫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他决定用普通的家用无线电来实现这种联系，因为很难指望能够迅速搞到这种设备。当时事情进行得还不大顺利。机器尚未调整好，常常发出吱吱喳喳的响声。谈话时有时因受到其它电台的播音声、音乐或莫尔斯电码声的干扰而听不见。

在我未经允许而准备下井的时候，彼特利亚克夫恰好坐在无线电前，戴着耳机，想方设法弄清发自开采场的电讯内容。突然，他听到微弱而清晰的报时声，难道已是中午了？他看了一下表，感到很奇怪：表上指针指的是差一刻十点。

彼特利亚克夫想“表怎么慢这么多，这样上班非迟到不可！”他打算拨表针，可是惊呆了，耳机里又响起莫斯科中午的报时声。这真不可思议！他把调度工作暂时放下，而凝神去听这个神秘的声音。很快他就搞明白了，这个声音有规律地每隔十五秒响一次。毫无疑问，这不是报时声，而是另外

一种信号。也许是遇难的呼救信号？但又不是《SOS》国际通用的呼救信号。是无线电爱好者在消遣取乐？但信号发出的时间十分准确，是由人手所不能代替的机器发出的。也许这是用短波播放的科学试验信号？彼特利亚克夫觉得这种解释倒合乎情理，于是就没有继续收听下去。但他认为有责任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有关信号的事。

向罗日科夫少校报告关于彼特利亚克夫所反映的情况时，罗日科夫正和克拉耶夫斯基坐在办公室里，商讨当前的情况。已采取了一切措施查寻帕西柯的笔记本及盗窃者。在火车站、飞机场、码头和路口都设置了检查过往行人的岗哨。在城里、农村、工厂住宅区、独家宅所和森林看守人的住处——总而言之，在所有的地方一处不漏地进行了户口检查。可是，在过去的两天里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少校认为彼特利亚克夫的报告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他说：“我们这里没进行任何无线电广播方面的试验。倘若进行试验，不可能不通知我。难道是测风气球从远处飘到了这里，在播放自动信号？即使如此，那我们也会事先得到通知的。”

克拉耶夫斯基说：“也许是从国外飞来的呢？”

“也许是这样。当然应当搞清楚，可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哪！所有的人都派出去了。你能把这工作承担起来吗？”他向克拉耶夫斯基问道：“你有时间吗？”

“我有空。”

“那你就搞一搞。你到警卫部队电台找拉普乔夫大尉，

请他确定这是什么信号，从哪里发出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请他协助。也许，这的确是一个国外气象台放出的测风气球？'

除市广播电台以外，我们市内还有一个军用电台，供部队和边境警卫军使用。克拉耶夫斯基半小时后到达那里。

拉普乔夫大尉对这非同寻常的信号一无所知。虽然信号很微弱，但他毫不费力地便找到了。信号一分钟响四次。借助无线电测向器很快就确定了信号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测向器的天线是垂直的框架形装置，沿立轴旋转，当对准信号发射地点的方向时，信号声最大。如果慢慢地转动天线，就很容易从声音的强弱上准确地判断出信号的来源。

拉普乔夫在地图上用一条线标出了电波的来源。这条线从市内指向西南，斜穿过一条河，又先后在奥列霍夫村和小奔秋克村旁边经过，然后穿过“新路”国营酿酒农场（这里以前是留列茨基伯爵的庄园），再往前穿过森林通向有许多河岔和小湖泊的广阔的河滩地，最后又经过森林覆盖的山丘，一直到国境线。

拉普乔夫说：“我已经请求附近的两个电台注意这个信号，并通知我信号的方向。这样，只要在地图上标明，在几条线的交叉点就可以找到发报机的位置。我们等一下他们的答复吧，不会太久的。”

答复来了，但却令人失望。两个电台暂时都没收到无线电讯号，而我们的电台仍能从原来的方向继续收听到那些信号。

拉普乔夫指出：“这肯定不是测风气球。不然，它早就被

风吹走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它的。我看这是另一种东西。类似功率不大的无线电指示器那样的东西。这种浮标指示器在海里广泛应用。从飞机上将指示器投到海里，可以指出被发现的潜艇、水雷的位置；而在和平时期则用以指示鱼群或海兽群的位置。有时甚至把指示器装在鱼镖上，这样，被鱼镖刺中的鲸鱼就会自行报知它在海中的位置。捕鲸船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迅速找到鲸鱼。很可能我们所要找寻的正是这样的东西。”

克拉耶夫斯基注意聆听着拉普乔夫的解释。现在只有寄希望于附近的无线电台，可能他们最终会有所收获。等了很久，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捕捉到这种信号。

拉普乔夫解释说：“这是一台功率很小的发报机，发射半径至多不过一百公里。可以认为，它的位置最远离我们不超过五十公里，最近也不会少于二十公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附近的无线电台收听不到信号的原因。如果信号一直不停发射，那么夜间或许可以收听到。”

“电池会用完吧？”

“当然有这种可能。”

“还有什么可能呢？”

“接收信号的人会奉命赶到指定地点。”

“您这样认为吗？”

“当然啦！他们不会不行动的。”

克拉耶夫斯基拿出烟斗，不慌不忙地装满烟丝抽起来。耳机里每隔十五秒响起的微弱信号声可能和近日来发生的事有重要的、非常直接的联系。这种想法使他坐立不安。他

想："对这种事不能掉以轻心，也许从这一点可以理出线索，使我们找到盗窃帕西柯笔记本的人。"

拉普乔夫谈到，信号有可能很快就停止，无线电指示器也会被派来的人取走。他的这些话使克拉耶夫斯基尤为不安。他感到不应再寄希望于邻近电台，事不宜迟，便立即给罗日科夫打了电话。

"你说得有理，克拉耶夫斯基同志，这有可能是无线电指示器。看来，我们得找到它。"少校在电话里回答说。

"怎么找呢？"

"很简单，用测向器。拉普乔夫那里有，他那里也有专业人员，但不能只派他们去，明白吗？可我这里所有的人都有事。我已派赫鲁廖夫去检查未筑成的工事。阿尼西莫夫在铁路上执行任务。我已报请上级派人支援，但现在还没派来。"

"我亲自去，"克拉耶夫斯基说"只要拉普乔夫派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再给我们一台测向器就成。"

"你能支持得住吗？"

"有什么办法呢？"

"好吧，……让拉普乔夫听电话。"

少校建议拉普乔夫交给克拉耶夫斯基一台测向器，并派一名专业人员由他指挥，去搜寻不明信号的发射地点。

"您打算布置进行搜寻吗？"大尉问道。

"对，我认为是必要的。"

"同志们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出发。"

“天很快就要黑了，少校同志。”

“难道夜里不能搜寻吗？”

“能倒是能，但比较困难，最好明天去。现在天气不好，有雾，马上就会下雨了。”

罗日科夫命令道：

“拉普乔夫大尉，听着：准备一台测向器，选派一名优秀的报务员，要他半小时后待命出发。要一名可靠的人。”

“一定完成，少校同志。我考虑上等兵斯切潘诺夫合适。”

“好吧，就派斯切潘诺夫去，”罗日科夫表示同意。“好，克拉耶夫斯基同志，行动吧！你如果愿意，可以请谢尔盖帮忙。他正没事干呢，这是个合适的小伙子，能帮得上忙的。”少校向克拉耶夫斯基告别。

（克拉耶夫斯基在那天晚上果真来找过我，但我不在家。当时我正和莲娜一起呆在地下试验室里期待有人把我们从那里救出去。）

克拉耶夫斯基从拉普乔夫那里取到手提式无线电测向器，回到家中，换上打猎的服装，背包内装满吃食，带上斧子、猎枪、手电、猎犬，然后和暂时归他指挥的上等兵斯切潘诺夫见了面。斯切潘诺夫穿着一身便服。两人坐上汽车，将测向器放在脚下，用防雨布盖好。

无线电测向器包括耳机，装着一组小电池、灯泡和其它零件的背包，以及塑料框架的环形天线这些东西。环形天线可以挂在胸前，也可以安在杆状支架上面，支在地上。

环形天线上装有指南针。这样，可以根据南北向的角度差测出无线电波发射方向。这种装置既轻便又适用。

汽车开到城外已是傍晚。绛红色的圆圆的夕阳象个巨大炽热的火球，缓缓地落在云幕后面，万道霞光笼罩着天空和大地。柏油马路、公路、路边石块、静止不动的树叶、涂着白色的农舍和院墙、迎面相遇的行人的衣服和面孔—— 这一切都仿佛是闪烁着各种光采的青铜制品。

汽车沿着克拉耶夫斯基熟悉的道路行驰，经过工厂，穿过通往奥列霍夫村的渡口，直向西行。在到达“新路”国营农场之前，汽车一直未停。从这里往南是个急转弯，他们在这里下了车，以便确定通向无线电指示器的正确路线。斯切潘诺夫将环状天线固定在杆子上，戴上耳机，打开测向器，注意地收听。克拉耶夫斯基望着他不安地想：“万一信号中止发射了怎么办？万一无线电指示器中蓄电池的电用完了，或者更糟的是指示器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这时，斯切潘诺夫原来紧张、严肃的面孔上泛起称心的微笑：

“听到信号了，首长同志！有吱吱的声音。”

但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因此用了四分多钟的时间才准确地测定了信号发来的方向。根据测定的结果，确定的路线指向一个已被暮霭笼罩的盆地，那是一个树木丛生的潮湿地带。只好弃车步行了。他们把汽车留在路边，由司机照管。克拉耶夫斯基将猎犬、猎枪和子弹带都留在车内。猎犬起初不肯留下，狂吠不止，想挣脱铁链。后来它仿佛明白了这是主人的安排，便无可奈何地向着走开的主人哀嗥。

当侦察人员进入盆地时，天色已晚。这里无路可寻，他

们只能径直朝前走。矮小稠密的树丛挡住了去路。 - 堆堆的干树枝和枯叶填满的无数沟壕、坑穴使他们寸步难行。齐腰高的蕨草缠手绊脚。在黑暗中，他们不时碰在横倒在地上的树干、腐朽的树墩和石头上。克拉耶夫斯基的假肢已把他腿上的皮肤蹭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走在前面，不时看着指南针和计秒表上的发光指针。每隔十五秒克拉耶夫斯基便停下脚步，走在他身后的斯切潘诺夫也停下来测定信号。如果信号声比上次微弱，他们便根据下一次的信号重新确定信号发来的方向。这样不断走走停停就大大地拖延了他们前进的速度。为了争取时间，他们行进时便尽可能加快步伐。但一小时最多也只能前进一公里。

我们的侦察人员走出森林时已是半夜。面前是一片辽阔的沼泽地，到处是杂草丛生的土墩和稀疏的灌木丛。

天空乌云密布，黯淡的月光有时穿过乌云透射出来。树丛和奇形怪状的小树，犹如人影从黑暗中突然出现，好象要伸手阻挡这两个疲惫的赶路人似的。又走了三百多步，沼泽地的潮湿气味扑面而来，水在脚下啪唧啪唧地响着。夜色深沉。岸边稠密的苇丛象一堵黑墙似的矗立在面前，无法继续前进了。

信号在这里听起来格外清晰，环形天线稍有偏差都能反映出来。

“显然，无线电指示器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或许就在河的彼岸，”克拉耶夫斯基说道“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把指示器放在这样潮湿的地方……当然，夜间我们是无法找到这台指示器的。这是毫无问题的。没有旁的办法，只好等天亮再说

了……”

他们又往回走，寻找过夜的地方。克拉耶夫斯基不敢点篝火。于是他在灌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挑选了一个亮一些的干燥地方，决定就在这里过夜。

但是，过了不大工夫，飞来成群的蚊虫，不点篝火看来是不行了。蚊子成群成群地围绕着他们飞来飞去，嗡嗡作响，落在脸上、臂上，有的还钻到衣服里。这个地方曾是疟疾传染区。医务人员多年在这个地区进行过消灭疟疾的工作，然而在战争期间此项工作不得不中断下来。

斯切潘诺夫砍了些树枝，架起不大的柴堆，点起篝火。清风徐徐吹来，风助火势，篝火越燃越旺，跳跃的火舌吞噬着条条树枝。篝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冒着浓烟，散发出一股树脂气味。他们用杉木和青草稍稍遮住火焰。

侦察人员已很疲倦，坐在烟可以熏走蚊虫的地方，开始做晚饭。

水壶很快就响起来，起初发出的响声微弱，随后变得低沉了，接着发出呦呦声和咕噜咕噜的声音，壶嘴冒出了蒸气。

克拉耶夫斯基伸直一条腿坐在地上。为了减轻疼痛他不停地抽着烟斗。他感到疲惫万分，抑制不住睏意。

“不行，这样我们会耽误事的。斯切潘诺夫同志，请把测问器调好，咱们再听听。”他说道。

斯切潘诺夫安好天线，将耳机线拉长，戴上耳机。

“一切正常，”他接着说，“还是吱吱的声音。”

“天亮之前，我们轮换收听，”克拉耶夫斯基说，“这样有

把握一些。”

吃完晚饭，克拉耶夫斯基盖着雨衣躺在地上。斯切潘诺夫正在吃着夹肉面包。忽然他停止了咀嚼，脸上流露出大为吃惊的神色。

“克拉耶夫斯基同志！波——爱——沙！……”

“什么？什么波——爱——沙？”

“波——爱——沙！我们连队在呼叫！”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是在呼叫。波——爱——沙——是向我们呼叫，大概……”

“什么？呼叫？在呼叫我们？……快收听！快听！”

他急忙拿出笔记本，打开手电，准备记录。

“怎么啦？听到什么？”

“现在只是呼叫……有了，请收记！‘克拉耶夫斯基同志，’”——斯切潘诺夫开始收记。——“‘请准备场地。点燃篝火。三点我将用降落伞空降。罗日科夫。’”

克拉耶夫斯基看了一下表，两点二十分。他忘却疼痛，一下站立起来。刻不容缓，在四十分钟内必须清除出一块至少五十步见方的场地，并在两角堆放两大堆篝火。斯切潘诺夫拿起斧子在过夜地点周围砍伐灌木。克拉耶夫斯基把砍下的树枝连同枯树枝和干草一起拖到场地的两角。篝火还没燃得很旺，他已听到教练机马达的声响。飞机在离此地比较远的上空飞行，然后开始盘旋、下降。

“看到我们了！”克拉耶夫斯基松了口气。这种声音使他想起往事。那些漫长的冬夜又浮现在他眼前。那时，他是游

击队队长，曾多次等待过这种声音，盼望得到来自后方“大地”的消息和支援！

飞机就在很近的上空盘旋。克拉耶夫斯基抬起头来，就在他头顶的上方一个被篝火映红的降落伞象巨大蝙蝠的翅膀一样正徐徐下降，最后降落在篝火附近。克拉耶夫斯基奔向那里。罗日科夫站在地上，正手忙脚乱地拿开绳索。

“罗日科夫，是你呀！”

“是我，跟我一起来的还有阿尼西莫夫中尉和一名报务员。”

“也就是说，你认为这里很重要了？”

“不错，我认为你确定的方向是正确的……等一等，我把降落伞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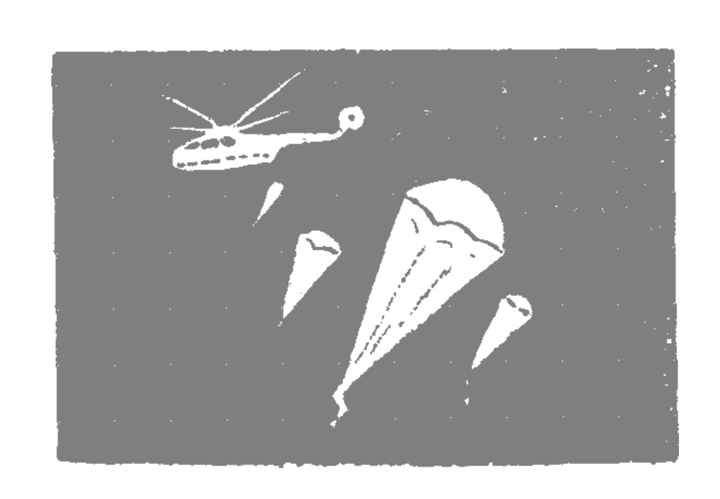
好。你的腿怎样？”

“有些疼。”

“嗯，我就猜到了……好吧！以后的事我来负责。你现在当后备军。”

四名跟随少校同来的军人也顺利地降落下来，在叠降落伞。另一个大降落伞象个大被褥降落在旁边的草丛之中，这是空投的装备。

“好吧，”罗日科夫对报务员说，“小伙子们，把篝火熄灭掉……现在需要测量一下信号发射地点的距离……阿尼西莫夫中尉，您把装备整理整理，把船安装好。我现在要和克拉耶夫斯基同志谈谈。我们得好好谈谈。”



第二十一章　不寻常的芦苇杆

朋友们在熄灭的篝火旁躺下。罗日科夫把几根璎珞珀树枝掷进篝火堆里，一股芳香的青烟沿着地面四散缭绕，驱赶开讨厌的蚊群。

“你把假腿摘下吧！”少校看见克拉耶夫斯基蹙着眉头揉腿，便对他这样说。

“没关系，过一会儿会好的。否则以后更麻烦，再装上去的时候可真受不了啊！……你说，你怎么忽然想起用降落伞空降到这里来的？以前好象你对我的搜索活动并没放在心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我不过是想起了以前的一些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在这块沼泽地上寻找帕西柯的笔记本。昨天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少校继续说“我向机场询问过当天飞机起降情况。结果查明，除了六架普通客机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飞机在我们这个地区上空飞行过。我放心了，不过，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模模糊糊记得，好象哪天还有飞机在这一带飞行过。直到昨天下班后，当接二连三的电话铃声不再打扰我的时候，我才蓦然想起，城市近郊还有一个小机场。这是由疟疾防疫站管的。机场只有两架‘波一2’型教练机，是在沼泽地池塘喷撒有毒粉剂用的。这我早就知

道。我还知道，这两架飞机有时在疟疾病流行地区上空飞行，两名驾驶员我都认识，是很可靠的小伙子。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安德烈·巴兰诺夫，战时有好几次是他送我到敌后去的。当然，我对他们不产生任何怀疑，对他们的飞行也没多加考虑，不过，为了万无一失，负责到底，我还是给疟疾防疫站站长打了电话。原来最近只要天气许可，每天都在喷撒药粉。昨天上午恰巧是巴兰诺夫值勤，共飞行过三次，但没搞清楚，他飞过哪些地区。疟疾防疫站站长对我说：'这可以问巴兰诺夫本人。'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记得我昨天还允许一位特写作家上了他的飞机。'他的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开始向他详细打听，这位公民来自何处，姓名是什么，为什么他突然想要飞行……当然，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是来自基辅市的一位作家，正在写一篇关于同疟疾作斗争的特写，想亲身体验一下飞行的感受。我把巴兰诺夫请来，查问了有关那名乘客的情况。此人原来叫什么哥里戈里耶夫·华西里·彼得罗维奇，是从基辅来的。我又四处查寻这个哥里戈里耶夫，然而，哪家旅馆里都没有他的踪影。总之，他没在城里任何地方办理过登记手续。他的身份证号码以及他是否持有某个作家机构的公函，都无从查起。谁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巴兰诺夫和他一起正巧是在发出信号的地区上空飞过。”

“那么，据你推测，无线电指示器是从飞机上投下来的而未曾被飞行员察觉罗？这样的事可能吗？”

“完全可能。教练机上，驾驶员坐在前座，他看不见后面的人在于什么。喷撒药粉时，粉雾弥漫，从飞机上扔个什

么东西下来他也无法发现。”

“这就是说，无线电指示器是哥里戈里耶夫投下来的啦？”

“当然……嗯，怎么样？距离测出来了吗？”少校对走过来的几名报务员说。

“是一百一十米，少校同志，”报务员回答说。“不过，我们不能保证十分准确，因为灌木丛妨碍我们对基面进行测量，而且天也黑了。”

“谢谢你们。可以走了。但是夜间要有人轮换值班，直到天亮。”

报务员们便走了。

“这么说，近在咫尺了，”克拉耶夫斯基说道。“可是他们怎样确定距离的呢？”

“非常简单。他们间隔一定距离放置两个收报机，都对准信号发射地点，再依照指南针确定出来的三角形的两个底角，然后从函数表中查出所需数字。自然他们自己用不着演算这类三角习题。”

这时，阿尼西莫夫中尉从灌木丛走了出来。

“小船已准备好，”他说道。“安装好以后在水上试过了，没有问题。桨也准备了……少校同志，您还是去睡一会儿吧！”他对罗日科夫说。“到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呢。克拉耶夫斯基同志，您也睡会儿吧！”

“好的。天一透亮就叫醒我们。不过，您要记住，别再生火了——破晓时，‘客人们’可能会光临的。”

寒气越来越重，岸边晨雾弥漫，万籁俱静。在森林中碰

上黑夜的行路人无法抑住睡意而警醒地进入梦乡。就在这黑夜将逝的当儿，却正是恶人、歹徒伺机而动的良机

“少校同志，少校同志！它不见了！”阿尼西莫夫中尉在拉扯罗日科夫的衣服，把他叫醒。

“啊？什么事？谁不见了？……”

“无线电信号消失了。已经有五分多钟听不到信号。”

少校一跃而起。克拉耶夫斯基也站了起来。

“五分多钟了？为什么不早些叫醒我？”罗日科夫顾不得听到回答便朝着收报机跑过去。

两名报务员在收报机旁不住地旋转天线。少校立即明白这样做是白费劲，因为信号是间断性的。

他命令报务员将两台收报机的天线朝相反的方向转动，并将天线与河水流向保持平行，然后注意收听。

“只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少校说，“‘他’坐小船划不了多远，我们会监听到信号的，只要……”

“如果‘他’把指示器关掉了怎么办？”

“我也这样考虑，既然‘他’已经把无线电指示器搞到手，那无线电信号现在对‘他，已完全没用，而且甚至会给‘他’带来危险。我看绝不能浪费时间……克拉耶夫斯基，你留在这里指挥报务员，我到那边去看看。”

少校做个手势示意阿尼西莫夫一同去，但不是朝河边，而是往相反方向的树林跑过去。他们俩你拉我一把，我帮你一下，很快攀上一棵树，四下观望起来。

天色已亮。他们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的、长着灌木丛的

洼地，地面缓缓地向下倾斜，一直到一条宽大的河边。河岸长满芦苇，是片沼泽地。对面的河岸却十分陡峭，是沙地。岸边长着粗矮的橡树，高大的槭树；一丛丛野蔷薇和金银花夹杂其间。发黄的树梢在一缕朝霞映照下，犹如镀上了一层金色。罗日科夫拿出地图，找出他们夜宿的地点。

从这里向左，河流朝西拐去，河面大大加宽，分出几条河岔，河水越来越浅。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河水流过一段又向右面，即朝北流去，拐了一个大弯。

淡红色的晨雾缭绕水面，影影绰绰，忽而这里，忽而那里，露出光秃挺直的芦苇来。罗日科夫和阿尼西莫夫在一条离此地很远的河岔处发现一只黑色小船，船上有个人弓腰坐着，拿着一支桨。这人面前直立着一个圆形的抄网，就象捞虾用的那种网。小船在芦苇荡里时隐时现，它忽而在雾中消失，随后又突然在别的地方从雾中出现。这人不慌不忙地在划桨，显然他根本没有猜疑到有人在监视他。

“阿尼西莫夫中尉，上船去追赶他，”罗日科夫下命令说。“不过，要小心别弄出声来，看来他还没有发现我们。”

少校从树上跳下，急忙向报务员们所在的地方走去。

“斯切潘诺夫同志，”他吩咐道，“您赶快沿河向前去，要在岸上走，监视一只小黑船。船上有个穿黑上衣的人，手拿一支单桨。他身前是个无线电测向收报机的天线，样子象一个捞虾用的圆弓网。明白吗？您要动作快些，他已划出半公里远了。假如他上了岸，您就设法扣留他……”他又对另一名报务员布置任务“：您要和我一起。”接着他向克拉夫斯基说明自己的意思：“我们要截断他的去路，河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我们总会碰上这个家伙，把他抓住的……”

“别走，别走！您等一下！脱下衣服！”他看见一名报务员径直走进水里，便喊叫起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报务员朝对岸游出去了好几俄丈，用手拍打着水，发出响亮的声音。

克拉耶夫斯基看少校脱下衣服，将手表、指南针、火柴和手枪都塞进皮靴里，将靴子和衣服紧紧卷成一包，顶在头上，用皮带兜住下颌把它系紧，然后才从容不迫地下水游过河去，尽量不溅起水来。他在对岸用衬衣拭干身上，迅速穿好衣服，顺着沙土坡走上去，消失在树丛之中。和他同行的战士身上却水流如注。克拉耶夫斯基目送他们走后，又开始注视着阿尼西莫夫。

塑料制的小船轻巧牢固，狩猎或者进行科学观察时用这种船非常方便。但船身宽，船底平，这影响了船速。阿尼西莫夫中尉使出全身气力划桨，而小船划行速度依然很慢。

克拉耶夫斯基想道：“他不会赶上的。这只小船不行，划手也不怎么样……全部希望都在罗日科夫身上了。”他不打算继续袖手旁观下去，迅速将两个已经失去作用的收报机藏在灌木林中，便沿着河岸追随斯切潘诺夫向前走去。

罗日科夫和报务员在这个树木稀稀拉拉、易于通行的树林中走得很快。他们用指南针来保持正确方向。不一会儿，便走上一条通往目的地的小路。罗日科夫边走边想，自己由于一时性急，派阿尼西莫夫坐一只单桨平底小船去追赶显然是徒劳失算的。“他怎么赶得上那个渔人呢？那人所坐的小船

要快得多！何况阿尼西莫夫又是个急性人，大概会惊动那个人的。当时应当大家都沿着河岸去追赶，堵截那人的去路才是……唉，白费劲啦！”这时，正象少校所想的那样，只听得从远处传来了枪声：一响，又一响……少校停住了脚步。“果然是这样！”——他思忖着。——“现在中尉要么是拘捕了这个可疑的打鱼人，要么是惊动了他。总之，要赶快。”

从地图上看河流转弯处两岸间的距离不超过两公里，但是山丘间的小道曲折蜿蜒，距离就加长了。罗日科夫和同行的报务员立即跑步前进，还是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到河边。他们先下了一个陡坡，顺着一道小沟壑，从杂草丛走过才突然来到水边。他们面前是一条不宽的支流，两岸没有杂草，水流湍急。沟壑地开阔起来，出现了一片沙滩，河底平坦，象个小浴场。很明显，这是个可以涉水的浅滩。

“他是不是已经划过去了呢？”——少校在考虑。——“如果还没有划过去的话，会不会经过这里划过去呢？”他知道，这条河流除了这个支流以外，还有几条小河岔，不过水都比较浅，水面狭窄还生满芦丛。

“这样吧！”他命令报务员说，“您爬到山岩上去，若见到小船，便通知我。但要谨慎小心，以免被人发现。”

报务员脚蹬山石，手抓树根，爬上岸边耸立的一块不大的山岩。他沿河道看了一下，便马上挥动军帽示意，他的确看到了小船。少校解开手枪皮套，疾步奔向浅滩。就在此时，河流转弯处出现了一只小船。船尾坐着一个老头，他身穿黑上衣，头戴一顶拉得遮上眼睛的带沿便帽，蓄着灰白长胡须。老头灵巧地划一只单桨，小船紧贴对岸，在平滑的

水面上飞驶前进。看不见船上有网。

“喂，同志！”罗日科夫喊叫起来。“划到这边来靠岸！”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喊叫使那个人吓得一愣，蓦地缩成一团，似乎准备使出全部气力急速前划。少校察觉到了他的意图，便走进水里，并且用手去摸枪套。这时，那个渔人才向岸边划来。

“嗯，干什么？送您过河吗？”他仿佛不高兴地问道。

“上岸来！”少校对他的询问置之不理。

这个老头哼哼哧哧，唉声叹气地从小船上爬出来。

“这当然是个搞联络的家伙，他是划船去取无线电指示器，”——少校想着——“可是我们能否揭穿他,这还难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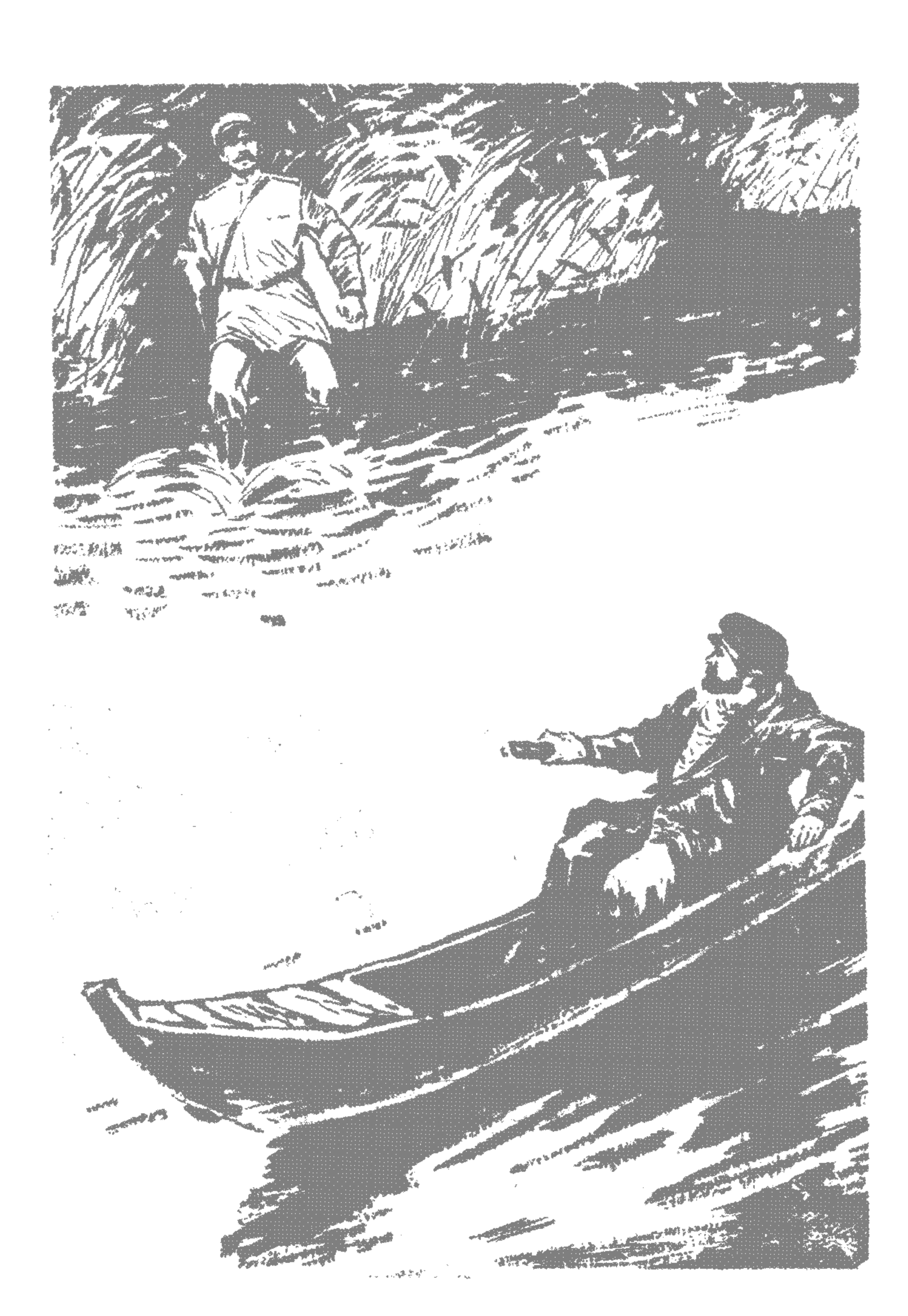
老头以嘲弄的口气说：

“那么，这是您的手下人在追逐我了？是个年轻人，愣头青，还用手枪打了好几下！象这样就打死个人也不费劲儿！”

少校不听他的一派胡言，迅速搜查了他，但是除了烟丝和烟斗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发现。在小船上也没查出任何值得可疑的东西：只有几根小钓竿、渔叉、面包和一小篮西红柿、一瓶酒、一筐鲜虾。可是，无线电指示器却是连影子也不见。

“有证件吗？”少校问。

“证件？……身份证在家里。这里谁都认识我，要证件干嘛！我在此地渡口看守人小屋住了四十个年头了。您去打听尼契波连柯好了——每个人都会告诉您的。我干嘛要随身带证件呢？我的证件在家里，可以拿给您看。”



“这以后再谈，你要交待，把船上的无线电指示器藏在哪里了。”

老头刹那间显得有些惶恐不安，他的眼睛四下张望。但他旋即镇静下来，两眼看着少校。他眼睛里流露出过份惊异的神情，然而在其深处却隐藏着恐惧。

“什么指示器？我什么指示器也没有啊！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您真想得出来，什么指示器！我是个知根知底的人，在这儿住了四十年啦！

罗日科夫很熟悉这种掩盖着恐惧心理的傲慢目光。“又暴露了自己，”—— 他想。这时，少校已深信不疑，站在他面前的是个特务分子。

“那么，说说看捞虾网吧！”

“当然，网是有过的，这我不抵赖。不过，我把网留在水里了。你们的人一开枪，我就把东西全都扔了。哪儿还顾得上网呢？……”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把网找到的。”

“那可太劳驾了，还是一张新网呢！请你们找到吧！”

老头已经完全恢复常态，镇静下来，说话时泰然自若。不过，可以听得出来，现在他的话音里带有一些讥讽的味道。

“等着吧！”—— 罗日科夫暗自想道。——“过一会儿就得让你俯首贴耳。”

这时，阿尼西莫夫乘着他那只不灵便的小船划过来了。中尉落在小船后面有一公里多的路程，若不是罗日科夫及时把老头截住，老头当然早就无影无踪了。

“阿尼西莫夫中尉，”少校命令道，“您把小船拉上岸。我们一起把被拘捕的人带走。您的小船让报务员背走。”

他们顺着来路走回去。阿尼西莫夫走在最前面，他身后是被拘留的尼契波连柯，再后面是罗日科夫。报务员殿后，他头上顶着那只轻巧的小船和船桨。过河时因为船小，每次只能渡两个人过去。首先过河的是中尉和报务员。报务员过河后又把船划回来。然后，少校和被拘留的老头过河。再让中尉划船来接报务员。

过夜的地方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有收报机放在灌木丛中。

“阿尼西莫夫同志，”罗日科夫命令道，“把人带走。从国营农场打个电话，再派辆车来。把无线电收报机带上，报务员同志也和您同走。我还留在这儿。”

少校对这一天的成果并不满意。因为这次行动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没有找到帕西柯的笔记本。不错，拘捕了一名充当联络员的特务。当然，这也是收获，但是，少校根据经验知道这仅仅是第一步，离破获整个特务组织差得还很远呢。罗日科夫对阿尼西莫夫的表现也不满意。“他干得可真蠢，”——少校思忖着，——“过早地暴露了自己，把事情全弄糟了。笨手笨脚的。不过，必要时，我们会把芦苇荡搜个一草不漏，把河道也清扫一遍，不管怎样，非找到无线电指示器不可。它总不能不翼而飞吧！”

克拉耶夫斯基吃力地走出洼地后，沿着树林边缘朝前走去。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一条很宽的河面，河中到处是浅滩和

芦苇丛，其间有小河道。雾已散开，但是，克拉耶夫斯基用随身携带的高倍双目望远镜无论如何仔细观察，也没发现他所找的那只小船。后来，他看到了阿尼西莫夫的小船，中尉正在使劲摇动单桨，划向一个小河道。过了几分钟他也不见了。就在此时，克拉耶夫斯基听到接连两声枪响。水面传来的枪声听起来使人觉得开枪的地点近在咫尺。克拉耶夫斯基明白，虽然离那儿较远，但必须用望远镜把事情发生的地点查看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假腿使他行走困难，可是他还是尽可能地快步向前奔去。走了有半公里，来到一个高地。他居高临下，仔细查看河面。

从望远镜里看到，河面上粼波动荡，闪闪发光，阳光照射下的水气飘忽颤动，微风吹拂着的纤细的苇杆左右摇晃；他还看到一群群的小鸟在浅



滩上飞来飞去，有时停在芦苇杆上，使芦苇低垂弯曲下来，野鸭展翅溅起水花，笨重地飞离水面。克拉耶夫斯基仔细观看每条河道、小水泊和浅滩。有根芦苇杆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根芦苇杆挺立在一个周围都是芦苇丛的小水泊的水面上，它不象其他芦苇杆那样随风摇摆、弯曲，而象钟摆似的左右摇动。克拉耶夫斯基越看越对它那令人不解的摆动感到诧异。就好象水面上有个插着长羽毛的大鱼鳔在左右摇晃。这果真就是他们前来寻找的那个无线电指示器吗？怎样才能找到这根芦苇杆呢？从河岸高处虽然距离较远，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然而在下面沿着河面看，在水草丛中便很难发现它了，找到通向它的道路也很不容易。

克拉耶夫斯基只好在岸边找到一棵孤零零的大树，再从这里用望远镜看这根神秘的芦苇杆。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草图，把这段河岸及所有能看到的小河道、浅滩及小水泊都标绘在上面，根据指南针确定了方向。然后他削了一根长木棒，将雨衣、背包和其他用不着的东西放在草丛之中，点上了烟斗。他决定，绝不空手而回。于是便按照指南针指出的方向穿过灌木丛和芦苇向前走去。他很快便发觉，径直前进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是水深挡住去路，就是一块块的泥泞沼泽地使他寸步难行。有好几次不得不绕到旁边，随后再用指南针对准大树寻找原来的方向。

克拉耶夫斯基在浅滩和水深的地方从一处芦苇丛走到另一处芦苇丛，起先他的衣服只浸湿到膝部，后来湿到腰部，最后竟连胸部都湿漉漉的了。

有几次他好不容易走到一片隐没在芦苇丛中的水洼旁，

心想终于找到了所寻找的地方，但立即发现水洼里没有长芦苇。他喘口气，又向前朝另一个小水泊走去。这些小水泊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克拉耶夫斯基担心自己是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他这样在芦苇丛中找了足有一个小时，突然停住脚步，惊喜万分。他见到就在近旁，有一根长长的芦苇杆在微风阵阵吹拂下，象是个节奏器上的指针左右摆动。他折断根芦苇，把那根芦苇杆拉向身边。芦苇杆倾向水面并滑动着。他将这根芦苇杆拿出水面。这是一个两米半长的普通钓渔竿，但其底部有个长三分之一米，两指粗细，涂着浅绿色的金属管。这正是无线电指示器！克拉耶夫斯基毫不犹豫地拿起找到的东西，沿着最近的路，涉水穿过泥泞的道路和芦苇丛，向过夜的地方走去。

罗日科夫看到克拉耶夫斯基浑身湿透，沾满污泥，不穿大衣，没戴帽子也没带背包，在沼泽地上艰难地、一瘸一拐地走着，感到惊愕万分。他起初甚至想到他的朋友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可是看到克拉耶夫斯基那兴高采烈的面部表情和肩上扛着的长长的钓渔竿，罗日科夫明白了，他是胜利而返。

“克拉耶夫斯基，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从水里捞到的。你看这是什么？”

少校接过芦苇杆。

“就是这东西，无线电指示器！绝不会错！……你是怎样找到的？”

“我从望远镜里看到的。”

“啊？……向你祝贺！这也就是说，特务分子找到了指

示器，想带走它。当发现有人追捕时便把指示器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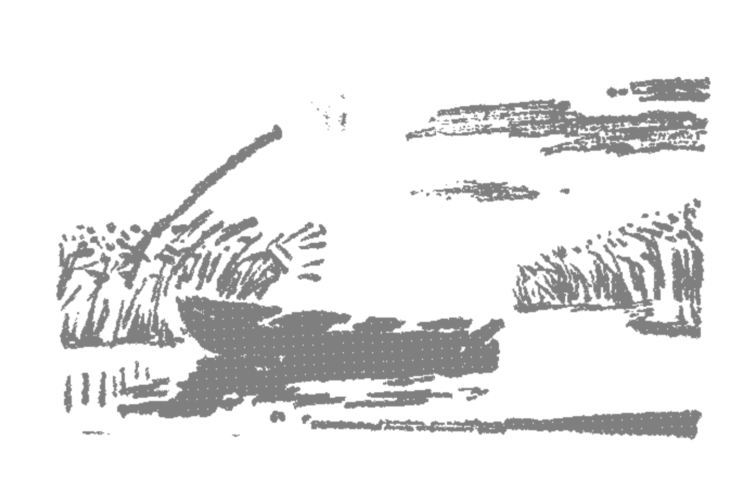
少校仔仔细细把指示器端详了一番，然后轻巧地将芦苇杆拆卸成五小节。

“设计得真不错！”罗日科夫说。“携带十分方便。再看看这是什么？”

他将指示器的小管放在耳边，凝神细听了好一阵。

“定时装置停了。这个坏蛋考虑到要把定时装置关上。他大概转动的就是这个小环……这东西真有意思，没说的！”

半小时后，他俩坐车回到城里。又过一小时，少校已坐在自己办公室内把无线电指示器全部卸开，细致地进行研究了。



第二十二章　假工事

当我和莲娜被困在地下试验室里，期待着有人会来搭救我们的时候，少校罗日科夫正忙于搜寻无线电指示器，而中尉赫鲁廖夫也正在遵照他的命令查看法西斯分子未筑成的那个工事。这个工事早引起了少校的怀疑。

罗日科夫对中尉指示说：

“毫无疑问，修筑这个工事为的是掩人耳目。它所处的地点就很不平常，既没在桥头，也不靠近浅滩或渡口，从进行瞭望或射击这方面的要求看，也不是一个有利的地形。象这样的工事在防御地带的工事体系中也许还有意义，但在这块地方孤零零地修个工事是毫无用处的。依我看，修筑这个工事是别有企图，是为了掩饰通向地下工程的地道出口。对于这一点必须坚信不疑。然而，现在重要的是：那帮歹徒是否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藏身之所？这个地方对他们很合适，偏僻人少，旁边就是山岩。请注意，加连巴曾散布流言蜚语，说这儿埋着地雷。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很可疑。您要仔细查看工事。此外，把索夫科夫换下来，他只身一人呆在井边已经是第六天了，现在我这里需要他。让上等兵卡尔米里钦去替换他。”

赫鲁廖夫、卡尔米里钦、还有三名战士带着能用得上的

工具迅速乘汽艇来到灰石岩。然后上岸顺着一条小径来到工事前。那里没发现有什么变化，有几堆石头，石缝间长着草。有的地方堆放着生锈的铁梁架和一捆一捆的铁丝。还有几处高高地堆积着已破裂的混凝土块。有几个水坑里面是绿色的积水，已成了青蛙栖息之所。在原来堆放木料的地方到处是烧焦的木块和灰烬，附近的灌木丛也被烧毁。周围不见人迹。

中尉首先派卡尔米里钦到井边去替换索夫科夫。卡尔米里钦背上一大袋粮食，肩头挂上自动步枪便出发了。他需要绕过山岩，穿过森林，经过以前集中营所在地，要走五公里左右的路程，因为没有可以直通水井的小路。

……赫鲁廖夫和战士们开始查看工事，他们从一个射击孔爬进去，顺着光滑的台阶往下走进地下通道。那里漆黑无光，散发着一股潮湿、霉烂气味。打开了手电筒，灯光照射着发霉的石壁、混凝土预制板砌成的通道顶和还显露出有窄铁轨的水洼。从地下通道可以进入一间宽敞的屋子——中央掩蔽室。这里倒挺干燥，但使人感到窒闷。一排排钢柱支撑的天花板悬在头顶上，看上去似乎要倒塌下来并且会把人压得粉身碎骨。由这里可以走到上面第二层地下通道，而从那儿又可通往上面的火力点。这些火力点已接近建完，是些有孔隙、并有钢罩遮掩的混凝土圆形小碉堡。赫鲁廖夫查看了这些地方，然而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有许多脚印、蜡烛头、火柴棍，但这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曾经有很多人到工事里来过。

中尉又下到底层的通道去，想把通道的各个地段都检查一遍。通道的一端沿缓倾的斜坡直通向地面。一条小窄铁轨

从这里伸展出去，绕过山岩，一直延伸到深深的沟壑之中。沟壑差不多已被碎石填满。无疑这是堆积从地下开凿出来的岩石的地方。罗日科夫少校的看法是正确的，工事掩饰着地道的出口。可是出口在哪里呢？赫鲁廖夫中尉又返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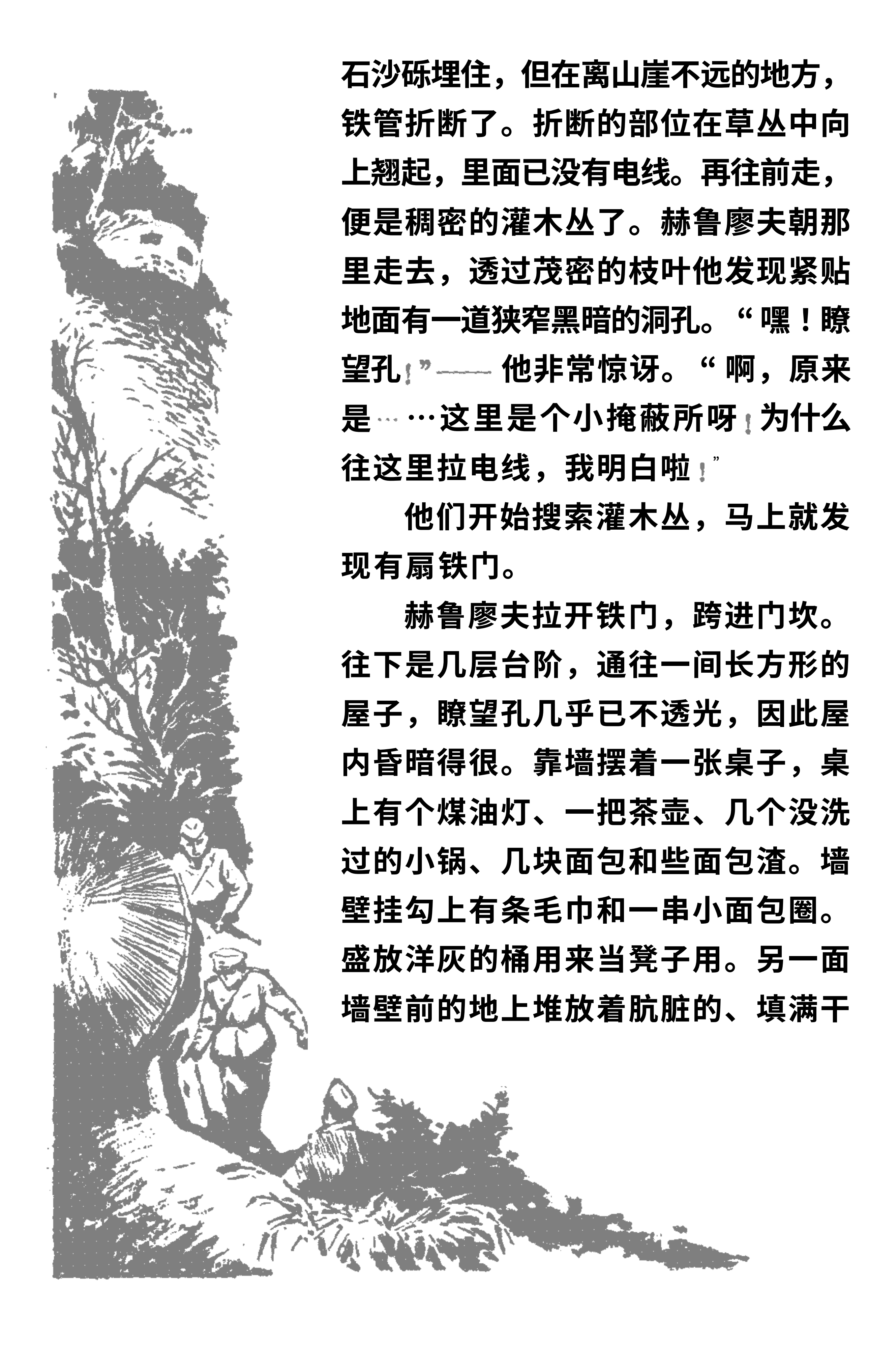
通道另一端的尽头是一堵坚实的墙壁。小窄铁轨在离墙不远的地方中断，而且一般铁轨终点必不可少的道岔和会让站这里也都不见。中尉暗自想道："这就是说，小窄铁轨不可能是在此地中断，而必定是延伸到现在已被严密堵塞住的地道中去的。不知道这堵墙有多厚？"他用手电筒朝上面照射，只见混凝土象石头一样坚硬，没有一条裂纹和缝隙，只是在上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根通连着地道的普通水管。"这根水管是干什么用的？"中尉想道，"要搞清楚它通向哪里。"水管起初顺着顶壁向前伸延，然后沿着小阶梯向上弯曲，最后伸入墙壁中，看来是通向外面去了。赫鲁廖夫命令一名战士用小石块敲击管子，而他自己却和另一名战士走到外面。他的做法很聪明，因为只有借助听力，他们才能在碎石、杂草丛中找到那根生了锈的铁管。这根管子已经锈腐不堪，有好几处都已破烂，管子上有许多小窟窿，一经敲打就碎成褐色粉末。

"中尉同志，这里发现一根电线！"战士报告说。

赫鲁廖夫弯腰一看，管子里有一根铅笔粗细的铅皮电线，更确切些说，这是一根电话线或是信号装置。当然，也可能这是连着地雷的引爆线路。"要小心从事，"——他心想。

"要小心哪！"他对战士们说，"可千万不要拉断，或者割断电线。最好别去碰它。"

铁管引向山岩脚下。有的地方被杂草掩盖，有的地方被碎



石沙砾埋住，但在离山崖不远的地方，铁管折断了。折断的部位在草丛中向上翘起，里面已没有电线。再往前走，便是稠密的灌木丛了。赫鲁廖夫朝那里走去，透过茂密的枝叶他发现紧贴地面有一道狭窄黑暗的洞孔。“嘿！瞭望孔！”——他非常惊讶。“啊，原来是……这里是个小掩蔽所呀！为什么往这里拉电线，我明白啦！”

他们开始搜索灌木丛，马上就发现有扇铁门。

赫鲁廖夫拉开铁门，跨进门坎。往下是几层台阶，通往一间长方形的屋子，瞭望孔几乎已不透光，因此屋内昏暗得很。靠墙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个煤油灯、一把茶壶、几个没洗过的小锅、几块面包和些面包渣。墙壁挂勾上有条毛巾和一串小面包圈。盛放洋灰的桶用来当凳子用。另一面墙壁前的地上堆放着肮脏的、填满干

草的床垫和枕头，上面胡乱铺着几床被子。还有一个盛着水的大木桶，用木板盖着，木板上面放盏煤油灯。这种种情况都表明有人在这里住，而且他们是不大讲究卫生和生活条件的。

“原来这帮家伙在这儿安了窝呀！”赫鲁廖夫思忖着不禁冷笑一声。“见不到人我就呆在这儿不走……哪怕等上一个星期也行！不过要赶紧向少校报告。”

他开始查看这间屋子。发现了一大堆食品：有饼干、罐头、茶叶、香烟，还有果酱。桌子下面酒瓶林立，有一筐腐烂的葡萄和一个装着煤油的铁桶。屋角堆着一捆脏衣服和一套尺寸不大的男人衣服，也许只有半大的孩子才能穿。屋内没有电话机。中尉匆忙把屋子检查完毕，给少校写好一份简短的报告，就派一名战士去杰尔卡奇村打电话向少校汇报。

“我们就在这里过夜。”他对另两名战士说，“等等看这儿的主人是否回来。我们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他们的人只准进，不准出。同志们，就这么办，怎么样？”

“您放心吧！中尉同志。”

赫鲁廖夫决定两名战士轮换值班：一人坐在外面，不要出声，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另一名战士在这个时候睡觉。他自己决定留在屋里不休息。

秋日漆黑的夜晚很快来临。赫鲁廖夫坐在瞭望孔旁吸着烟。他明白自己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战士的人数太少。如果特务分子单个地回来那还好，要是他们同时回来怎么办呢？如果开了火又采取什么措施呢？应当活捉这群匪徒。赫鲁廖夫对索夫科夫也放心不下。已经过了四个小时，可还不

见他的人影。会不会是卡尔米里钦迷了路？他找到那口井没有？卡尔米里钦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天还没黑他就出发了……中尉心中异常烦躁，一支接一支地不断吸着烟。忽然，他听到敲墙壁的声音，这是值班战士在发信号。

他透过瞭望孔听到战士的低语声："中尉同志，森林那边有亮光，有人往这边来。"

赫鲁廖夫走了出来，果然，在下面很远的地方，黑暗中有个星星般的亮点，有个人打着手电筒沿着小路径直向工事走来。"这是索夫科夫，"——中尉认定是这样——"那帮人是不敢在夜间打着手电筒走路的。"

"马尔克夫！"中尉呼唤一名战士，"快跑去告诉他关上手电筒，否则会把匪徒吓跑的。不要出声，轻一点……"

战士跑去执行任务。赫鲁廖夫这才放心了，索夫科夫有自动步枪，他的到来会大大充实他们的力量。

听到一阵在石块上行走的沉重脚步声，黑暗中显露出一个战士的熟悉的身影，但这不是索夫科夫，而是那个上等兵。他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中尉同志，"他说，"索夫科夫中士失踪了，那里只有二连的一名列兵彼得洛夫。"

"怎么失踪啦？"

"是这样……按照命令，列兵彼得洛夫在清晨到了那里，而索夫科夫已经不在原地了。彼得洛夫等他，高声喊他，在周围寻找，还是没人。帐篷、大衣和自动步枪都在原地放着，唯独索夫科夫本人不见了。"

"彼得洛夫为什么不向任何人报告呢？"

“他怕离开岗位会出事儿。他等在那里，怕有人来……中尉同志，这事可不妙呀！”

“看过井下吗？”

“没有，没看。”

“为什么？”

“没想到要去看，中尉同志。”

“唉，你呀！

赫鲁廖夫不安起来。象索夫科夫这样有高度自觉性，又严守纪律的人绝不会擅离职守，更不会把武器也抛置不顾的。既然他不在岗位上，那就是说，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赫鲁廖夫觉得，应该马上赶到井边查看一番，弄清那里的情况。也许索夫科夫失足掉进井里了？也许他受了伤躺在那里，急需援救？但是，怎么能够离开这里的重要岗位呢？把埋伏在敌人巢穴里这样重大的任务委托给谁呢？……最后，他决定亲自到井边去。他指定马尔克夫为班长，把自动步枪交给了他，向他们详细地交代了，在什么情况下应如何行事，命令他们坚守岗位。然后他才和上等兵一起沿着小路向下走去。夜间的黑暗立即吞噬了他们。

赫鲁廖夫不愿点煤油灯。他们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沿小路摸索前进，只是在非常难通过的地方才用手电筒照照路。他们穿过森林，经过已荒废的集中营，涉过小河，又在森林中走了很久。然后，顺着通往山崖的石头小路往上去，又走了一段时间，终于来到井边。彼得洛夫在那里等着他们。中尉首先往井里看了看，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把一张点

燃的报纸投进井里，报纸在燃烧着，红色的火光映照着井壁和模模糊糊的井底。井底没有水。上等兵往井里扔了一块小石头，小石头如同落在枕头上一样，没有一点声响。他们俩的脑子里都闪过了可怕的想法：也许井下有索夫科夫的尸体 ！

“中尉同志，请允许我下去！”

“我自己下去。把手电筒给我。你们用绳子把我吊下去。”

链条响了起来，绞盘发出轧轧声响。赫鲁廖夫手拿着电筒，开始徐缓地下降。他抓着链条向黑暗处仔细查看，但什么也看不清。吊斗噗哧一下落在什么软东西上了……。中尉心里感到轻松，因为下面是一大堆褐色的潮湿的纸。赫鲁廖夫向周围看了看，他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井内抛进厚达两米左右的大石块。这样，水道就被堵塞住了。在石块上又撒了洋灰，随后把盛洋灰的纸袋也扔进井内。这样做是为了消灭痕迹，洋灰遇到水就变成了比岩石还坚硬的混凝土。目的是什么呢？中尉得出了结论：这是为了掩尸灭迹，更深地掩埋起不幸的索夫科夫的尸体。

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中尉把上等兵和列兵留下，在井边值班，他自己则急忙赶往杰尔卡齐村，打电话向少校汇报。他没找到罗日科夫，便向值班人员讲述了汇报的内容。接着，他又返回工事，因为他对那里的情况很不放心。他赶到那里时，天色已经亮了，那里一切依然照旧，没有来过任何人。

……少校出去搜寻无线电指示器回来之后，看到赫鲁廖

夫送来的两份报告，此外，还有民警局转来的通知，说三天前离家外出的谢尔盖至今未归。少校想到，应立刻赶到“灰石岩”去。他急忙处理完身边的事务，乘上一艘摩托艇，便向“灰石岩”驶去。和他同去的有一小队爆破手和一名电工兼电话员，他们随身携带着爆破材料和一台少校在地下实验室曾见过的那种型号的德国电话机。



第二十三章　记者科洛米采夫

罗日科夫同志曾到医院来看过我们。他来后的第二天，当我和莲娜穿着病人衣服在花园里坐着的时候，他又打来电话，说有急事请我去一趟，并且马上就派汽车来接我。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他的同意，允许我回家把自己修整一下。十五分钟后，我已经坐上了汽车。

“赶快回来，”分手时，莲娜十分不安地对我说。“如果你一时回不来，也要告诉我一声。不然，我会不放心的。你要注意安全，不要无谓地去冒险。”

“没有必要，我不会去冒险的。”

“你保证吗？”

“我保证。”

汽车顺着花园的林荫路开走了。莲娜一直站在台阶上，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能看得到她那孤独的白色身影。

家里我谁也没遇到。大家都给别佳送葬去了。不去送葬也好，因为和不幸失去独子的克谢妮娅相见，我实在受不了。我换了身衣服，刮了脸，就急忙坐上汽车走了。

汽车在公路上奔驰。我无心观赏秋日的森林美景，浏览那已经收割过的广阔的田野和那映在平静河面上的寒冷灰暗天空的倒影。我们的车驶到大楼前时，我才从沉思中清醒过

来。马上有人带我到办公室。我看到罗日科夫坐在办公桌前，他对面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个穿深蓝色西服、一头黑发、个子高高的男人。这人背朝着我，但似乎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转过身来，看到他的脸，我猛然一惊，在我面前坐着的竟是记者科洛米采夫……

不对，不是科洛米采夫，他是我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这人浓密的黑发和胡须简直和科洛米采夫一模一样；戴的眼镜，穿的西服和皮鞋也相同。甚至西服上衣口袋里的钢笔、穿的内衣、系的领带也和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在旅馆里看到的那个人的完全一样。但他还是另外一个人，是个我不认识的人。

“谢尔盖同志，请稍等一下。”罗日科夫对我说。他盯着我看了看，用手指触碰了一下嘴唇，然后继续说，“我马上就结束同记者科洛米采夫同志的谈话，请你坐在这里。”他向我指了指紧靠记者身旁的椅子。

“少校同志，如果您不再需要我，”记者说着站了起来。“那么，请允许我离开这里。火车还有一个小时稍多一点就要离站了。而我还没来得及参观你们这美丽的城市呢。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的。”

“难道已经这么晚了？”少校问道。

记者将左手西服衣袖和内衣袖口往上一提，于是我看到一块椭圆形的金表。和他相貌相同的那个人所戴的那块表也是这样的。戴表的那只手腕上，稍靠上也有一个被子弹打伤的疤痕。这时，遵照少校无言的命令，我把头掉转了过去。

少校说：“好吧，我不耽搁您的时间……您现在准备到哪

里去？”

“离这里不远，到白石码头去。那里今天举行新建的大型谷仓揭幕式。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在仪式开始前赶到。市执委会主席的请柬送来迟了。我本打算直接去那里，然后再到您这里来。后来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我就乘飞机到您这里来了。我将改乘火车，从这里走。”

“我听说，您是一名专职的体育记者？”

“是的。但我现在有空余时间。据说，那里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更何况，现在的天气又是这样的好。”

他向少校告别，向我点了一下头就走了。

“罗日科夫少校，这个人根本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个人。”只剩下我们俩人时,我向少校说道。

“当然不是。他才是真正的科洛米采夫呢。我把他请来，也特意把您找来，就是为了让您看看他。而您老人家却迟到了，搞得我不得不和他寒暄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么,那个科洛米采夫呢？”

“那个是冒牌货,是伪装的。”

“怎么可能是伪装的呢？……那伤痕呢？”

“伤痕也是假的。当今的外科大夫可以给您安个假鼻子，更甭说搞个假伤疤了。那个家伙的眼镜也是为了装样子，是用手表的玻璃做的。他和科洛米采夫的身高、发色都一样。他模仿科洛米采夫的发型和衣着，还持有精心仿制真假难分的伪造证件，这证件看来是外国制造的，上面有科洛米采夫的名字,就是这些。”

“那么请问，罗日科夫同志，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事

先找到和科洛米采夫相像的人，要研究他的外型，了解他的生活细节，甚至还要知道他挂过彩、有伤痕……而这一切在国外怎么能探听得到呢？”

“您知道吗，谢尔盖同志，原来还在战争初期，随军记者科洛米采夫的个人档案就落到德国人手里。后来，他们又把档案卖给了另外一个外国的间谍机关。而您自然也知道，在个人档案里是应有尽有的：自传、履历表、各种证件的复制本、照片。特务只需化装成科洛米采夫，并且避免和他本人见面就行了。”

“这么说，他大概是个外国人吧？”

“不是，他是乌克兰人。当然，这是就其出身而言。”

“那您知道他是谁吗？”

“今天早上才知道的。科洛米采夫的到来才使我们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他作的说明和他交给我们的证件，使我们有可能确定了那个冒名顶替他的人的身份。”

我几次想问，这个神秘的冒名顶替的人到底是谁。可是话已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因为我想到，对这类事情表示好奇是要不得的。

少校继续说：“这个人无意之中失言露出了马脚，事情很小，他对他妹妹说了两个多余的词，不多，只是两个词。但这微不足道的饶舌却暴露了他自己。”

“他有妹妹？”

“您和她还很熟悉。”

“我很熟？她……她是谁呢？”

“安娜·希德罗夫斯卡娅。”

“安娜？”

“对，就是她。”

“这不可能！”

少校抬起头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说的话是算数的。”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表情是如此的惊愕，以致少校认为有必要重复说一遍：

“您在旅馆里遇到的那个冒牌的科洛米采夫实际上是叫哥里戈里·希德罗夫斯基，是您认识的安娜的哥哥。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三个月前，他负有特殊使命，越过土耳其潜入我国领土。他化名哥里戈里耶夫，在基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来到这里，这时，他已持有记者科洛米采夫的证件了。我看得出来，您很吃惊，您是否还要说，这也不可能呢？”

“不……但无论如何我难以设想，和我几乎每天见面的安娜突然和敌人有联系，会替他们做事。”

“也不一定是如此。大概，她并没意识到自己在为他们做事。更确切地说，她从来没怀疑过她哥哥的职业，她认为他的职业是记者。她哥哥有什么必要把一切事都告诉给她呢？完全不必要。不告诉她真情，才能利用她。”

“您是从哪里知道这一切的呢？”我问道，可是马上又觉得不应该这样提问题。

少校笑着说：

“有一回，有人曾看到，这个姑娘在船上和一个外表跟

假科洛米采夫相像的男人在一起。后来，在夜晚又看到过两次。但主要的依据是，今天真科洛米采夫将安娜写给她哥哥的一封信转交给我。科洛米采夫收到的这封信原来不是寄给他的。”

“怎么会弄错的呢？”

“安娜写信给她哥哥，可她哥哥事先不知道，或许这完全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她把信寄给了基辅报社编辑部的科洛米采夫，为了准确起见，在括号内她又写上‘希德罗夫斯基’的字样。编辑部知道真的科洛米采夫的地址，就把信转交给他了。是封很短的信。她在信中写道，希望信能寄到哥哥手里，请哥哥原谅她未经同意就擅自写信，因为她等钱用。下面署名字母是‘A’，没有寄信人住址。您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刚刚来过的客人根本没有妹妹，可是收到了一封妹妹的来信，他是多么纳闷。根据邮戳他看出，这信是从我们这个城市发出的。于是他带上这封信来到这里。我核对过笔迹，无疑，信是安娜写的。这封信揭露了冒名顶替的人，同时也证明安娜对她哥哥的阴谋一无所知。”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要把他从国外派到这里来，因为他是这里出生的。”

“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少校继续说，“您是否还记得，您曾对我说过，您看到过他有一把金色鱼形的梳子？后来，您在塔楼内找到过同样的一把？”

“我当然记得。”

“那么，您现在来看看包梳子的那一小张纸，您当时没有注意，把它忽略了。我们在炮眼里把它找到了，并小心地

保存了下来。”

少校打开文件夹，里面有一张从学生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已揉皱的纸。半张纸上写满算术题。这张纸大概在塔楼内放了很久，已发黄，上面用钢笔写的数字有些褪色，模糊不清了。上面写的是：

30 + 15 + 2 + 17 + 3 + 8 = 75
з а м н о й

11 + 37 + 10 + 16 + 1 + 35 = 110
с л е д я т

12 + 40 + 48 + 45 + 16 + 24 + 8 = 193
П е р е д а й

30 + 17 + 31 + 43 = 121
з н а к

16 + 1 + 28 + 29 + 43 + 45 = 162
д я д ь к е

（这下面是罗日科夫按照数字所代表的字母解译的结果：有人在跟踪我，给舅舅发信号。）

“谢尔盖同志，您现在明白了吧？您知道这把梳子起什么作用了吧？”少校看着我惊异的面孔问道。

“这是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的标记吗？”

“完全正确。这是他们彼此相认的实物标记。希德罗夫斯基利用这把梳子使别佳任其摆布。也许，还诱引伊凡·谢尔多宾到山岩去。”

“他从哪里弄到梳子的呢？是在哈尔科夫买的吗？”

罗日科夫没有回答。他打开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小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把黄色的鱼形小梳子。这是一种常送给小孩做礼物、价钱不贵的手工艺品。它的形状大小，它那粗糙、缺乏艺术性的外型，还有它那毫无光彩的黄颜色，都同爱国青少年们所有的那种美观精致的小梳子截然不同。这两种梳子根本不可能混淆起来。

少校接着说：“我是从哈尔科夫搞到这个样品的。是在市商业局仓库里找到的。青少年爱国侦察员们的那种梳子任何地方也没有卖过。那是瓦西里·加夫里洛夫亲手做的，就是代号叫‘舅舅’的那个人，他曾在日用品工厂工作。德寇占领期间，我们这里有过这么一个工厂。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把这样的梳子。您看，结论是什么呢？谢尔盖，您今天怎么头脑这么迟钝不开窍呢？”

“莫非哥里戈里·希德罗夫斯基曾经也是一个青少年爱国侦察员？”

“正是这样！是他把青少年侦察员们出卖给法西斯匪徒的。”

“他的代号就是‘贝都英人’吧？”

“我也是这样想。”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头谢尔多宾的死因也就清楚了，是因为希德罗夫斯基怕被人揭发。”

少校点了点头。

“后来，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少校说，“他的记忆力也开始恢复了。”

“这真可怕，”我心惊胆战地说，“真是残酷无情啊！”

“是啊，您指望他们这种人会发善心！这也是一场战

争，一场无形的战争。只不过是用手枪，而不用大炮罢了！”

少校站起身来，表示已谈完了。

“您最好到克拉耶夫斯基那里去一趟，”我们分手时，少校对我说。“他在生病，见到您，他会很高兴的。请转告他，我很快就会带一件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到他那里去。”

在森林和沼泽地带的这一场奔波，给克拉耶夫斯基带来了不少苦头。他的假肢把他那条残废的腿磨破了。遵照医嘱，他在卧床休息。我去时看见他正靠在床上，身边烟雾缭绕，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他看见我十分高兴，请我自己动手随意安排一顿早点。

我从一清早就没吃什么东西，对他的话表示欣然同意。

克拉耶夫斯基向我详细询问了有关地下工厂的情况。我把昨天对少校讲的那些情况，又仔细地、从头到尾地对他讲了一遍。他对这次历险过程中那些具有浪漫色采的情节并不感兴趣，更多地是打听有关技术、机器、工人人数之类的事。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地下是否还有人，还是只留下了一些自动装置。他希望我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对此也是一无所知。后来，我向他谈了今天早晨发生的事。谈到基辅报社的真记者，谈到安娜写的那封暴露真情的信，以及冒名顶替的假记者的真面目。这件事克拉耶夫斯基已经听说了，因此，他对科洛米采夫外貌的某些细微之处颇感兴趣。

“可惜我没看见他。他已经走了吧？”他终于问道。

“走啦，到白石码头去参加新建成的大型谷仓的揭幕式

去了。”

“这我知道，今天那里举行揭幕典礼。可是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

“市执行委员会发出的邀请晚了一点。”

“是主席邀请了他吗？”

“是的。还付给出差费呐！”

克拉耶夫斯基沉默了起来。他又把烟斗装满，开始抽烟。读者们当然明白，在我们谈话时，我出自好奇心是多么想了解，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找到帕西柯的笔记本没有？搜捕特务的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我终于按捺不住，问道：

“克拉耶夫斯基同志，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克拉耶夫斯基笑了起来，他说：

“您到底还是提起这件事来了！我还以为您对这事不感兴趣了呢！”

他直截了当地把搜寻无线电指示器的经过，如上面读者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一一讲给我听了。他还补充说，无线电指示器在当天就被拆卸开来，在里面发现了密码情报，这份情报立即被送往基辅去进行解译。

“帕西柯的笔记本找到了吗？”我问。

“没找到，只发现了一封短信。”

“那么，也许指示器和地下工厂并没有什么联系？”

“也可能如此。

我大失所望。我们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来找寻帕西柯的笔

记本，这个极为重要的材料，可还是没把它搞到手！无线电指示器已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了。

后来，我有机会见到这个仪器。现在，我把它的构造扼要地描述一下。这个仪器的外形看上去有些象一根有大把手的海上钓鱼的渔竿。它有两米多长，不费劲就可以把它拧开，卸成五节。竿内装有一个轻巧的铅制小管，管子分成三个小格，下面一格放有蓄电池，中间部分装有微型电子管、线圈、继电器、电容和导线等组成的无线电发时器，还有定时装置，使发时器每隔十五秒钟发一次信号。上面的那个小格是放置电稿用的。在这一格里发现了密码情报。黄铜管的上方有一个可以转动的小环起开关作用。这种仪器可以空投，也可在长满芦苇的地区使用。这样的地方在我们地区内很多。所有见过这个无线电指示器的专家都认为，这是国外的产品。

我们谈话的时候，罗日科夫走了进来。他带来了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大圆盘。

“你看看，”他对克拉耶夫斯基说，“阿尼西莫夫从河底捞上来的是什么东西。就在离他快赶上尼契波连柯的那个地方找到的。”

“是什么呀？”

“最普通不过的捞虾网，象这样的网这里每个渔民都有。”

“这是尼契波连柯的东西吗？”

“是的。他承认这是他的网。他还说，他捞虾的时候，看见了阿尼西莫夫，他很害怕，便把网留在水里了。他的邻

居也都证实这是他的网。”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就是说，我们的对手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他除了无线电测向收报机外，还随身带着这张真的捞虾网，以备万一。当他只要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便把这网扔在水里一个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而把收报机藏在较远的地方。”

“真狡猾呀！那你现在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呢？”

“做我需要做的。把网还给原主，并且释放他，给他充分的自由。”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我想。“把一个明摆着的敌人，外国的间谍放掉，让他去消灭自己犯罪的痕迹，让他去给自己的同伙通风报信！怎么能这样干呢？”

“罗日科夫同志，”我说道，“您自己不也说过，他是个狡猾的骗子手，是个阴险的特务吗，怎么能放掉他呢？他会跑掉，会消灭犯罪的痕迹，还会给他的同伙通风报信。”

“有什么办法呢？谢尔盖同志！”少校微笑地回答说。“我们还提不出他的任何罪证来。”

“不是有无线电指示器吗！指示器总不能自己飞到一个地方去吧？是有人把它放到那里的。除了这个渔民之外，咱们没看见过任何别的人。”

“渔民归渔民，指示器归指示器。也许是一个没有被我们发现的人把指示器挪开了。也可能指示器根本没有移动位置，而是我们测量得不准确，有差误。您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吗？”

“这是不可想象的！还有那个尼契波连柯也是个很值得怀疑的人物。”

“为什么呢？他在这里的渡口当看守人已经四十年，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战争期间他被疏散到卡马河去了。经过搜查，没发现什么问题。归根结底，我们仅仅是怀疑，这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罪证。”

少校说到这里，笑了起来。我不明白，该如何理解他的话，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的这样想。我感到莫名其妙。

“怎么，要把这案子放到一边，不管了吗？”我问道。

“谁也没这样说呀！”克拉耶夫斯基说着也笑了起来。“谢尔盖同志，这样吧，”他补充说，“咱们来喝茶，您再拿点吃的来，罗日科夫同志大概也饿了。”

“真的有点饿了，”罗日科夫说道，“不过，让我先给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刚刚收到了解译的密码。是从基辅用飞机送来的。”

“是吗？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马上就给你看。”

少校从衣袋里拿出一封信，从里面取出两张纸来。一张纸上画的是精心绘制的“灰石岩”周围的地形图：弯曲的河流、森林、公路、未筑成的工事、荒芜的集中营、小道，甚至还有“和睦之柱”和勾起我沉痛回忆的那口井。另一张纸上有几行英文字，下面写有俄文译文。再下面是几个密码解译员的签名和印戳。

“下级的情报已获证实，有地下工厂。我暗中去过，仔细查看了全部情况。蕴藏量很大。和卫队长谈过话。他对我们没有用处。拒绝出售科学家的回忆录，并

矢口否认有该回忆录。我担心俄国人已发现我们的行踪。即将查明一切。到时我将毫不动摇地遵照您的指示行事。

格 126”

这便是特务投送的情报内容。我不太懂这份情报的含义。

“罗日科夫少校,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这包含很多内容，谢尔盖同志……首先，直到目前为止，在地下工厂里，或在地下工厂附近还住着一个卫队长。其次，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从前的判断是错误的。事实上，特务并没有窃走帕西柯的笔记本，而且他们正在寻找这个笔记本。”

“那么，这个笔记本究竟藏在哪里呢？”

“在卫队长那里。噢，看来这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敌人没有把帕西柯和基辛格立即处决，而把他们用铁链拴住，还给他们多受几天折磨，也不是为了表示假仁假义，都不是的。这里有他们的如意算盘……这项工程的头目们懂得，已被判处死刑的两位英雄是不会将自己的秘密带到坟墓里去的，他们迫切地想把这桩秘密传给后代。法西斯匪徒的估计完全正确，他们利用了人的崇高理想。两位科学家以为，在地下工厂里除了他们再也没有别的人了。他们为子孙后代写下了他们辛勤的劳动成果。可是，恶棍们却攫取了他们的成果……除此之外，”少校又补充说，“我们从这份情报里还知道了，特务们惶惶然不可终日，唯恐我们跟踪，把他们查出

来。可能他们会孤注一掷。我们还知道了，有个什么‘下级’他向外国间谍提供了关于‘灰石岩’的情报。”

“实在是令人信服的分析。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

“现在嘛，先吃早饭，”少校笑了起来。“然后要稍微休息一下。不能辜负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呀！今天在无线电指示器和记者这两桩事情上都大有收获。”

看来，罗日科夫的确饿了，他痛快地吃了一顿，接着又喝了茶。克拉耶夫斯基又重开话题：

“很遗憾，我没能见到科洛米采夫本人。要是见到他的话，我便能想象出冒名顶替他的人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下，照片是没多大用处的。”

“科洛米采夫急急忙忙要到白石码头去。现在正坐在火车里赶路呢。”

“罗日科夫，不管您怎样看，我总觉得这里有些不对头的地方。我认识市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卡连柯，他是个会精打细算，比较吝啬的人。本地有的是多产作家，他何必要花钱从首都请一位记者来呢？这不是他的禀性。更何况，大型谷仓的落成仪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少校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显然，他的脑子里又有新的考虑。随后，他请主人允许他去打电话，便走出屋去。

我们在继续喝茶。大约过了一刻钟，罗日科夫才回来。他面色苍白，动作紧张。我一眼便看出，发生了什么紧要的事。

“克拉耶夫斯基！”他激动不安地说。“没有谁曾邀请过科

洛米采夫来参加落成典礼。我给市执委会打过电话。”

“噢，是吗？那么说，他欺骗了你了！”

“不对！是有人欺骗了他！这是个圈套，你明白吗？有人诱骗他上钩！”

“真有这样的事！他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吧？”

“当然，他现在成了那帮歹徒的眼中钉、肉中刺。想必是希德罗夫斯基知道了妹妹给他写过一封信，寄往基辅的。他是从谁哪儿知道的呢？自然是从他妹妹那里知道的。他们觉得，面临危险，一旦科洛米采夫把这封信交给公安机关，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的计划就会因此而彻底破产。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刻不容缓地把科洛米采夫干掉。只有这样，希德罗夫斯基才能长期顶用他的名字，冒充他，也才能在较偏僻的地方自由活动。”

“那他的亲属不会发觉吗？”

“他独身一人，四邻也都对记者外出习以为常。我已打电话给铁路沿线各站，指示他们请科洛米采夫下车。我想，在帕内奇车站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需要我自己到那里去一趟……要马上动身！其余的事以后再说。我们那辆大型汽车马上就来。”

克拉耶夫斯基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向衣柜。罗日科夫止住了他：

“克拉耶夫斯基同志，你不必去了。你帮不上我多大忙。还是留在这儿吧！”

“我腿上的创伤差不多愈合了。”

“不管怎样，你必须留在这里，因为只有你一个人了解

这里的情况。我请你参加‘ YH，行动计划，这非常重要。我可以和赫鲁廖夫一起走，还有……”

少校看了我一眼，我走到他跟前。

“谢尔盖同志，您愿意去吗？”

“愿意！”

“不过，这件事可要担些风险呀！”

“罗日科夫同志，瞧您说的！”

“那好，咱们一起去…… 不过，您穿的衣服太单薄，会冷的。”

“我把我的绒衣和毛围巾给他，”克拉耶夫斯基替我回答了。“谢尔盖同志，把衣柜打开。”

这时，一辆大敞篷汽车开到屋前停下。赫鲁廖夫下车，朝我们走来。他穿着便服，还给少校拿来一身便服。罗日科夫一面匆忙地换衣服，一面不住地指示说：

“谢尔盖同志，别忘了带火柴……克拉耶夫斯基，给他一个手电筒。对了，给我们每人准备三块夹肉面包。”

过一会儿，我们便上了车。克拉耶夫斯基在窗前送我们。我只来得及向他喊了一声，请他往医院打个电话，好让莲娜放心。

马达一响，汽车就开动了。砂砾在车轮下轧轧作响。克拉耶夫斯基向我挥手，表示他听明白了我讲的话。

第二十四章　真假记者相遇

天色黑了下来，汽车几乎悄然无声地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疾驰。在笔直的地段，司机便把车开得飞快，路旁低矮的灌木丛、大石块和高大的树木看来仿佛连成一道绵亘不断的墙壁。我们乘的不是轿车，虽然支起了车篷，但这丝毫也遮挡不住阵阵寒风的吹袭。若不是克拉耶夫斯基好心给了我一件绒衣的话，我非冻得透心凉不可。我们已经行驰了一个多小时。忽然，司机猛地减低车速，汽车拐上一条土路，沿着沟壑和山丘朝前开。在这种地方当然是无法开快车的。

少校看了看表。

“到帕内奇车站还有六公里，”他说“可是我们在这种难行的道路上至少还得走十分钟，差一刻九点才能到达车站，就是说在发车以后十二分钟才能到那里……这没关系。只要他们能来得及让科洛米采夫下车就好了。”

罗日科夫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我们跳下汽车跑进值班室的时候，那位记者迎着我们站起身来。他脸上流露出惊愕、愠怒的神情。

“对不起，少校，”他对罗日科夫说“他们告诉我，是遵照您的指示让我留下的。是这么回事吗？”

“不错。”

“对不起……我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我眼看要误事了您知道，我应邀去参加揭幕典礼，可下一班车要到明天才有吧？”

“谁也没有邀请过您哪！”

“怎么没邀请？我收到了电报！”

“是封假电报。”

“假的？为什么您认为是假的？”

“市执行委员会并没拍电报给您。我让您下火车是因为您有生命危险。”

“什么危险？有这种事啊？”

“的确存在危险！有个庞大凶狠的阴谋集团蓄意要把您除掉。因为您妨碍了他们。这伙歹徒设下圈套来诱使您上钩。”

事情的突如其来使科洛米采夫大为震惊，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您说除掉我？就是要杀死？……怎么会这样呢？又是为什么呢？我……我非常感激您，少校同志！”

“不必客气！这是我的职责。不过，我想请您帮一下忙。”

“我能为您效劳吗？”

“当然啦，我们非常需要您的协助。”

“那就请您吩咐好了。”

“我并非不信任您。不过，我想把话说在前头。这件事很危险。如果您害怕的话，我并不坚持要您协作，可以护送您回城里，在那儿会十分安全。”

记者稍微踌躇一下，说道：

“危险又算得了什么！整个战争期间我一直都在前线。我并不害怕。”

“一句话，您是同意了？”

“我同意。”

少校紧紧握住他的手。

“咱们走吧！”他说，“时间不等人哪！”

现在，我们已经是四个人了，又坐上车飞快驰去。

罗日科夫看看表说：

“现在九点零五分。过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公路干线上。从那里到‘白石’车站还有三十二公里，不过，我们可以加快车速，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赶到那里。这就是说，九点三十五分我们可以抵达车站。按照行车时间表，火车在九点二十七分到站。那么，我们就稍微有些晚了。要快点……从‘白石’车站到码头还有五公里的路程。这段路有公共汽车行驶。科洛米采夫同志，上车时您先走，尽量往前坐。谢尔盖跟着您，坐在您后面。赫鲁廖夫中尉坐我们的车，跟在公共汽车后面。我将见机行事，或者和你们在一起，或者和他同行。我们要装做彼此不相识的样子，这便是我考虑的行动计划。不过，要记住，”他对科洛米采夫说道，“您要小心谨慎，别离开我们，也不要流露出对他们的企图已有所察觉。”

我们驱车走上公路干线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汽车全速疾驰。我有生以来还未曾坐过开得这样飞快的车。我们仿佛不是乘车在公路上行驶，而是乘某种神奇的飞弹或者火箭飞行。只是在公路上坎坷不平的地方，车把我们高高颠簸起

来时，这种幻觉才开始消失。迎面的寒风吹得人们透心凉，就象只穿着一件单薄衣衫似的。罗日科夫不时打开手电筒看看表，催促司机开快些。汽车的喇叭声响个不停。

迎面驶来的各种车辆和行人都小心翼翼地纷纷闪向路旁。他们突然出现在我们车灯的亮光中，一瞬间又消失掉。我们超越过去的车辆好似都停滞在原地不动。我可永远也难以忘怀这趟急驶如飞的夜间行车。

终于在前面远处闪烁出车站上白色、绿色和红色的灯火。随后在茫茫夜色中，右边出现了铁路路基和一排电线杆。又过了两三分钟——我们便从色灯信号机、道岔、机车司机室和呼哧吐气的机车旁一闪而过，与一列客车几乎同时驶近车站。汽车立即停下，我们连忙下了车。车又带着赫鲁廖夫中尉，迅速淹没在黑暗中。中尉需要绕个弯，围车站经过道口转一圈，以便在车站出口处迎上我们。

“快些！”罗日科夫催促道。“我们要混进旅客人流中去。”

少校带我们走过偏僻小巷，穿过一个小门，沿铁路备用线往前走。我们越过一道铁丝网，走过调动的列车旁，冒着丧身轮下的危险在车厢下面爬行。然后又相互搀扶着爬上月台。站台上的旅客尚未走尽。我们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行事：科洛米采夫走在前面，我跟着他，少校走在最后。

……事情完全出乎我们的估计。车站附近没有公共汽车。汽车发生了故障，因此进城去无车可坐了。这时夜已来临，还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候车室和台阶上挤满旅客，不住发出骂詈声、怨言，有的人在同马车夫讨价还价。我们的车还不见来。

科洛米采夫高大的身躯在车站出口处刚一出现，便有一个个头不高，脸色苍白，脸修刮得很干净的中年男人走到他面前，彬彬有礼地对他颔首说道：

“假若我没弄错的话，您就是科洛米采夫同志吧？见到您很高兴！我是从市执行委员会来的。派了一部车接您，请上车吧！

科洛米采夫一时感到不知所措。找不到拒绝上车的理由，而一个人去坐车又显然很危险。他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明白应该当机立断，果敢行事，于是便对他说：

“对不起，我听说有辆车接您。劳驾，我能顺便搭您的车吗？我从基辅来，有急事去市苏维埃……有劳您了！”

就在这时，有人在我身后小心翼翼地扯动我的衣袖，将一个冰冷的金属物放在我手里。我用手一摸，知道是把手枪，是少校递给我的。我感到这是对我的信赖，便把手枪接过来，塞进了大衣口袋。

科洛米采夫听到我说的话非常高兴。

“请吧！不胜荣幸！”他回答说。

现在是那个陌生人慌了手脚。他含糊不清地说车太小，“不允许外人搭车”，想表示拒绝。可是科洛米采夫不理会他，把我让进车里，在他身旁坐下。那人不再争辩下去，然而却仔细打量了我好一阵子，仿佛要琢磨透我的来历似的。接着，他坐在司机身旁，汽车便开动了。我往后看了一眼，赫鲁廖夫坐的那辆车还没有赶来。

周围漆黑不见五指。车灯只能照到车前十米开外的地方。道路很平坦。车站上的灯火渐渐暗淡下去，先是聚成一

片，后来变成一个微弱的小光点，最后连这点光亮也被小山丘和灌木丛遮住了。过了一会，汽车急骤转弯，朝山上开去，在崎岖难行的林间路上颠簸起来。马达发出低速排挡运转时的轰隆声。道路两侧是稠密的树林，四周黑黝黝的，使人感到阴森不快。

“这不是好的预兆，”——我暗自思忖。——“看来象是要把我们拉到荒无人烟，连鬼都懒得去的地方。”我回过头，朝车后小窗外张望，希望看到追赶我们的汽车灯光。然而透过湿漉漉的玻璃却连一个小光点也看不见。

又过了令人忐忑不安的几分钟，那个陌生人纹丝不动地坐着，从打开的车窗向黑暗中凝视，我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忽然，他靠在座背上，仓促瞧我们一眼。这时，马达发出异常的声音，停止了转动。汽车抛了锚，车灯也熄灭掉了。司机咒骂一句，从车里钻出来，点上个蜡烛头，打开马达上面的车盖，便在那里鼓捣起来。

“是怎么回事？”陌生人问道，也下了车。

这自然是他们的预谋，把车停在对他们有利的地方。情况显然万分紧急，会对我们下毒手的。不过，我有武器，并且已做好准备应付任何险情。我同科洛米采夫也钻出车子，走到一旁。司机声称：

“汽缸不行了，坏了…… 我不是说过嘛，这辆车拉不了三个人。一个人嘛，倒还对付。咳，真糟透了！”

“那你干嘛要拉呢？”陌生人训斥起他来了。“深更半夜车出了毛病怎么办呢？”

“车子原先没毛病，谁能保得了险。没剩下多少路了，

总共也就是两公里。要是走小道穿过小树林，那离码头还不到一公里呢！我敢保证。”

“也许还能把车修好吧？”

“不行，办不到！黑得要命，没法子修好。三个人是拉不了的，”他断然说。“路很难走，一个人倒还对付。”

“怎么办？只好步行啦。”陌生人叹口气。“真是抱歉，”他对科洛米采夫说，“真糟糕！…… 的确没多远了。我很熟悉这条小道。打着手电筒不大工夫就能走到的。”

他讲话非常自然，可是司机的表演却很拙劣，一听就知道他们居心叵测。

“最好还是等一等吧！”记者回答说。“说不定能碰上过路的车。”

“哪里会有过路的车！”司机插话说。“这条路上连马车都不走，更甭说汽车啦！”

“那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我质问他。

“走这条路要近便些。”

“是这样吗？”

司机被问得哑口无言。那陌生人走到我跟前。在夜色朦胧中我清晰看见他那副苍白、凶狠的面孔和一双充满疑惧神情的眼睛。我迅速从大衣袋里抽出手枪，藏在大衣袖下面。他走到一旁去了。这时双方都沉默不语，气氛有些紧张。

“咱们还等什么呢？”陌生人又开口说，他已经不那么坦然自若了。“咱们走吧。至于您，”他对我说，“汽车好歹会把您拉到地方的。”

“我们就在这儿呆着。”科洛米采夫断然答道。

陌生人止住脚步，略微改变了一下姿势：挺直腰板，身子向前一倾。“他马上就会开枪的，”——我脑中闪过这个念头。我打开了手枪的保险，退到车身后面。又是一阵令人难捱的沉默。只听得阵阵疾风吹得树梢沙沙作响，稀稀落落的雨点敲打在树叶上。然而并没有人向我们袭击。那人蓦然慌乱起来，他惊惶不安，怪腔怪调，哭泣似地说：

“那么，你们随便吧……司机同志，你再试试看，能否把车修好。”

“他怕啦！”——我想。“也许还有别的什么鬼花招……不能麻痹大意。”

他的确是害怕了，不过，怕的并不是我们。我突然发现有道微弱的灯光照在树梢上。这缕亮光越来越强，自上而下地移动，斑斑点点照在树干、绿草和沙土地上。响起马达轰鸣声，我们的车子终于在路上出现了，车灯大开，把车前的一切照得通明。车停下来，我听到罗日科夫那威严而又激动不安的声音：

“出什么事啦？”

我高兴极了，真想奔过去搂抱住我们的救星。科洛米采夫可显得比我镇静。

“车出了毛病，”他说。“他们建议我们步行穿过树林。”

罗日科夫走到司机面前，抓住他的肩膀问道：

“这条路通往哪里？”

“通往旧采石场去。”他回答得挺粗鲁。

“那你干嘛走这条路呢？嗯，快说！”

“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怎么啦？”

“是谁让你朝这里走的？是谁？……”

“是租车的人呗。他……”

司机四下张望找寻那陌生人，可是他已经溜走了。我们察看附近的灌木丛、沟壑和道路—— 到处不见他的踪影。显然，他首先发现了来车的灯光，便赶快钻进了树林。

我们坐的这辆车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少校对此很清楚，他命令道：

“赫鲁廖夫中尉，把这家伙带到码头去，以我的名义把他交给特派员。科洛米采夫同志，您和他们一起走。请公安局长给您安排个暂时落脚的地方您在那里会很安全的。”

……他们走后，我们打着手电筒想从灌木丛中找到林间小道。

“小道一定在这附近，”少校肯定地说。

可是，我们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这条小道。它距离大路有百步左右，与大路平行，后来又渐渐向右边延伸开。小道上杂草丛生，覆盖着一层枯叶。不难看出，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周围四面八方都是稠密的树木。树冠象屋顶般悬在小道上遮挡雨水。因此，罗日科夫少校在这里寻找脚印白费气力。他说：

“总之，冒充市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那个家伙一定会走这条小道的。漆黑的夜里想穿过树林跑掉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追赶他，但需要谨慎从事。也许他们在这里有一大帮人，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咱们可只是俩人。所以，用手电筒照明时，要一亮一熄，而且只能朝自己脚下照，千万不可向前后左右或者向上方照射。要悄悄地一面走，一面注意

听着四下的动静，还需准备好武器。我走在前面，您可别拉下。”

我们往前走去，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抬头仰望时，方能看出上面是枝叶交错的树冠，尤如黑色透花的轻罗柔纱在微风中飘动。只有当手电筒倏然闪光的刹那间，照在密草、树干和条条垂枝上时，我才能看见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少校那处于紧张戒备状态的背影。树木时而自远处传来依稀可闻的轻微声响，时而就在头顶上发出哗哗响声。这时，阵阵疾风刮得树梢摇曳不停；树干轧轧作响，发出乞怜般的呻吟，掉落下片片树叶。我感到神经紧张，寒气袭人，不禁浑身战栗 。

我们这样慢慢地走了许久，逐渐地我产生了一种异常之感。恐惧之心消失了，然而我觉得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并非真实，而是谵妄、是梦幻。我的思想离开现实，沉浸在昔日儿时的回忆之中。我不去想那陌生人，也不考虑当前的危险处境或少校本人，尽管我在准确无误地执行他的指示。我迷迷糊糊直至撞在他的背上，才清醒过来。

树木稀疏起来，周围也显得明亮些。可以看到左边有个小山丘，长满矮小的树丛，有许多石块；右边是个堆积着许多圆形巨石的沟壑。林间小道就拐向这个沟壑，隐没在树丛和碎石之中。

“ 是个危险的地方。’我悄声说。

“ 不错！在这里设下埋伏倒是挺合适的。不过，我不是谈这……咦，这儿好象有灯光。谢尔盖同志，您看就在那上面…… ”

我凝目注视，果然，黑暗之中在树木枝叶间有个时隐时现的小亮光，一会儿被摇曳不定的树木遮掩住，一会儿又显露出来。

“要搞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少校说。

我俩侧耳聆听了许久，只听得风在呼啸，树木轧轧发响，其它再也听不见什么声响了。于是我们便顺斜坡朝上面亮光处走去。

光线是从一所小屋窗口射出来的。小屋的墙壁用粗大石块砌得很不整齐，半塌的瓦顶上长满野草，篱笆也破烂不堪。这在屋后树林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您从左面绕过去，”少校低声说，“我从右边走。要当心…… 要避开亮光。”

我悄然无声地在灌木丛和树木之间迂回着向小屋走近。在离小屋不远的一小块林间空地上，我撞到一堆土上了。旁边黑乎乎的有个新近挖成的坑，长约两米。这是个什么坑？是新挖的排水沟？是陷阱？是挖掘过宝藏的地方，还是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墓穴呢？里面有东西吗？我爬到坑边，往下扔了几块小石头，根据石块发出的声响，可以听得出来，坑深约一米，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谢尔盖同志，到这儿来！”少校说话的声音相当响亮。

我赶忙走到他跟前。

他手拿电筒站在小屋敞开的小矮门旁。在昏暗夜色中我见他脸上流露出罕见的激动神情。

“里面有什么？”

“您自己进去看看。”

我低头走进一个小过道，角落有个盛水用的大空木桶和一把大木勺。另一个屋角有把扫帚和铁锨，上面还沾带着潮湿的泥土。板凳上有一铁锅熟土豆。通向里屋的门半敞开着。我跨进门槛，看到墙壁小搁架上摆着一盏小煤油灯，玻璃灯罩熏得发黑，因此，屋里的灯光很暗淡。有个男人脸朝下躺在屋子中间。他身穿一件灰粗呢上衣，脚上是双破靴子，头上没戴帽子。这人张开双手，脖颈极不自然地弯曲着。他后脑勺上有个鲜血淋淋的大伤口，地板上流了一大摊血。

“是谁？这是谁?……”我惊叫道。

少校走到跟前，弯身将尸体翻过来。我看见死者那发绿的脏污的脸，那双瞪着的呆滞的眼睛和长长的胡子。

“是加连巴，”他启口说“我原来就知道会这样!他是一枪致命的，刚刚被打死，大概还不到一小时。”

这张已经不象人样的死人面孔上仍有某些地方使我感到熟悉。毫无疑问，他便是那天夜里我不顾一切游到河对岸进行侦察时见过的坐小船的那个人。

“罗日科夫少校，我认出他是谁了。这就是夜间袭击过我，又和别佳一道划船的那个人。您曾经说过他是渡口看守人。”

“不错! 您再仔细瞧瞧，从侧面看他的脸。用块抹布将他的下巴遮上，怎么样?”

我从侧面看死者的面孔，不禁惊愕万分。他很象叫我们离开法西斯工事的那个人。他对我们说那里埋着地雷。只是现在他脸上没有胡子。这是多么意外的巧合呀！

“好象我在没筑成的工事那里跟他发生过争吵，那时他



把我们撵走了。这事可真怪！”

“要是您知道，您面前躺着的就是我们曾经追赶了半天都没能追上的那个卖雨衣的人，会更加吃惊呢！这是个老骗子，是个恶棍。他的真名叫李佐古勃。以后我把他的罪恶史讲给您听。我们没能活捉他，真令人遗憾。假如他活着的话，会对我们有用得多。”

“是谁杀死他的？”

“自然是他们那一伙啦！也就是我们正在搜寻的那个人。”

“不过，他究竟为什么要干掉自己的同伙呢？”

“李佐古勃对他们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他们便杀人灭口……好啦，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要赶快回城里。我想我们在那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离开小屋，在户外呼吸到清新空气时，我轻快地松了一口气。刚才所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抑郁不快。

“咱们快走吧！”少校催促道。“现在可以放心不会有埋伏了：凶手已远离此地，正在潜逃中。”

“罗日科夫少校，”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他没走，就在附近。他挖好了墓坑，准备掩埋尸体，是我们妨碍了他这样做的。”

“您说的是什么墓坑？”

“就在近旁有个坑。”

我带他去看我在黑暗中发现的坑。少校打开手电筒，仔细查看起来。

“不错，这是个墓坑。谢尔盖同志，您没搞错。不过，

这个坑不是新近挖的。雨水已把泥土淋得相当湿了。看得出来，这个坑不是仓猝间挖成的，我们在过道屋见过挖土用的那把锨。谢尔盖同志，您的看法不对，这个墓坑不是为加连巴挖的，而是为我们的朋友科洛米采夫准备的。假如他没有听从我的话，那他就会躺在这坑里了…… 走吧！没有必要再拖延了！”

我们没有走原路回去，而找到另一条经常有人走的小道。我们打着手电筒走得很快，路上没有耽搁。走了一阵，这条小道便把我们引到一个陡峭的山丘顶上。这里就是废弃的矿坑。山丘高高耸立着，下面是座小城和一条河。我们走到悬崖边，下面城市的灯火宛如一片撒落的小珠，闪烁发光。依稀辨出一排排平行的房屋、正方的广场和蜿蜒弯曲的沿河大街的轮廓。

可以清晰看到灯光通明的码头、停泊在码头边的一艘轮船。码头和船上的灯光映照水中。稍远些，在河流两岸上导航信号灯透过雾霭发出红色、绿色的光亮。我们无暇观赏夜景，抓着灌木，一起从峭壁上爬下去。

半小时以后，我们进了城，两人都已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全身沾满污泥。我们经过刚举行过揭幕典礼、用宣传画和五颜六色的彩旗装饰着的大型谷仓、几所仓库，走过围墙和商店，来到灯光通明的俱乐部前。罗日科夫少校看看表。

“差十分十一点，”他微笑着说。“我们还来得及欣赏音乐，进去好吗？”

“干什么？”我诧异地问。

“随便去看看……说不定会有什么好节目呢！”

“罗日科夫同志，”我表示反对。“说真的，我现在可顾不上去听音乐会。我累极了，没刮脸，而且穿着这身衣服也不好进去。再说您也该休息了。”

“没关系，咱们还是进去吧！我敢保险，您绝不会后悔的。”

我们走进俱乐部。令我惊讶的是赫鲁廖夫中尉正在存衣处等候我们。他一见到我们，便站起身来，低声报告说：

“少校同志，他在这里，坐第一排。”

“监视他的人布置好了吗？”

“所有的出口都有人把守。”

“音乐会马上结束？”

“快完了，现在是最后几个节目。”

“好，带我们去经理办公室，然后您就去吧！迅速将那人……和另一个人都带来。”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们脱去外衣，尽可能把自己身上收拾干净些。虽然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个究竟，但却没有提出任何问题。罗日科夫少校自己启口说道：

“谢尔盖同志，您马上就会目睹科洛米采夫记者和冒名顶替他的人当面对质。”

“怎么？他在这儿听音乐会？……”

“他在这里。”

“可是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这样冒风险不是很愚蠢嘛！”

“恰恰相反，这样做很有道理。真正的科洛米采夫大概对家里人说，他接到了白石码头发出的邀请，要到那里去。假

如他没回去，那人们首先会考虑这个地方，会在这里开始进行调查、打听，这是很自然的。而这里就会报告说，该记者曾经来过，在某某旅馆下榻，参加过各种庆祝活动，在众目共睹之下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此地、这样就不会对这个地区产生任何怀疑，而在别的地方着手找寻这不幸身亡的记者尸体了。”

“多么奸诈而又冒险的做法呀！”

“怎么对您说呢？他们并不担任何风险，同时也没有耍弄什么狡黠诡计。不过，的确是胆大妄为，刚愎自负，深信自己的罪恶勾当定能得逞。谢尔盖同志，您注意到没有？科洛米采夫还未被杀害，冒名顶替他的人就已经在落成典礼上出现了，而且墓坑也是事先挖好的。”

……科洛米采夫同赫鲁廖夫来了。让记者背朝门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我和少校面对着门坐在他两旁。赫鲁廖夫靠墙站在门口。经理要把那个假记者带到办公室装做要洽谈某事。响起了脚步声，屋门打开后，经理和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一头黑发的男人走进来。我马上认出，这便是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早上在旅馆和我谈过话的那个人。他停住脚步，对其余的人在场感到惊异。科洛米采夫不慌不忙朝他转过身去。这个冒名者蓦地变得面无人色，不由得倒退了一步，眼里充满惊恐的神情。他一个劲地看着自己的同名人。

少校紧盯着他。

“请允许向您介绍这位来自基辅的记者科洛米采夫。”少校从容不迫地说道。

这时，冒名记者已镇静下来，恢复了常态。

“产生了某些误会……显然是搞错人了，”他对经理说着耸了耸肩，同时他的眼睛不由得在寻视门的方向。赫鲁廖夫站在门口，握枪的手放在背后。“这也许是一次不恰当的玩



笑吧？……科洛米采夫是我。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我，经理同志也可以证实这点，而且我有各种证件！”

罗日科夫做个手势请经理离开。

“不要拿你的证件了！”他厉声道。“我们了解，这些证件

伪造得很高明，连号码和日期也和那份真的一模一样，只不过照片是另一个人的。”

“真有意思！那你们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他以寻衅的口吻说话，但是却声音嘶哑，喉咙便塞。

“你是谁？需要我指明你是谁吗？好，按出生证你是哥里戈里·希德罗夫斯基,绰号叫‘贝都英,,是个叛徒,出卖过自己的同志——‘青少年爱国侦察员’。你过去的职业是盖世太保的密探，现在的职业是特务。这便是我们的看法！”

希德罗夫斯基坐在扶手椅上，双手抽搐，揪扯起衬衣领来。然而他仍在负隅顽抗。

“这都是您的猜想!”他声音嘶哑地说“您根本不能证实这一点。”

少校站立起来。

“够了，别再装模作样了!”他说道“你很清楚,要证实这一点非常简单。不过，这事我们要在另一个地方去谈……赫鲁廖夫中尉，搜查他，把他带走。不需要他再呆在这儿了。”

赫鲁廖夫迅速搜查了希德罗夫斯基，把钱夹、记事簿、自来水笔、眼镜盒、各种证件和已为我们很熟悉的那把金黄色鱼形梳子都从他口袋里一一掏取出来。

少校拿走了记事簿、证件和钱币，而把其他物品，也包括那把梳子还给希德罗夫斯基。他被带走了。少校和赫鲁廖夫同他一起乘车离开，我和科洛米采夫则回旅馆去过夜。

白天所发生的事使我感到又疲乏又兴奋，直到天亮方才入梦，但没能睡多久。七点钟少校便唤醒了我。他是一副心

事重重、疲惫不堪的样子，大概彻夜未眠。

“希德罗夫斯基老奸巨滑，”他对我说“他只承认自己冒名顶替，而对其余的罪行一概矢口否认。他狡辩说，自己冒顶科洛米采夫这位著名记者的姓名是为了在边远地区招摇撞骗。还说，所有的证件以及伤疤都是他自己假造的。当然是一派谎言。他矢口否认自己参加过‘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的活动。我很想知道，他将如何辩解那把梳子的来历。司机也在抵赖，不肯讲真话。他说自己开车是听从租车人的吩咐，至于租车人是干什么的，他并不知道。这家伙也不讲老实话。我让赫鲁廖夫押送他们进城去我们那里了……谢尔盖同志，起来吧！还要在林中进行搜索呢！”

当天以及第二天，我们与当地公安人员配合仔细搜索了整个树林，查看了旧矿坑、沟壑、各条大路和小道，还去过那所不祥的小屋，在那里遇到侦察员。他拿给我们看一粒大口径手枪射出的弹壳，是在过道屋的地上发现的。

“这一枪打得很准，”少校端详着子弹壳说。“谢尔盖同志，向您射击也是用的这支手枪。因为我们在岸边沙土地上，就是您跳进河里去的地方也找到了几发这样的弹壳。当时您可真侥倖啊!”

搜索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足以证明带我和科洛米采夫乘车的那个陌生人的身份。在车站、码头以及公路上都没有人见过他。这人好象钻入地下渺无踪影了。

这一无所获的搜寻使少校大失所望。他让我回家，当天晚上我便离开了。他自己决定还在“白石”码头停留些时候。

第二十五章“YH”行动

我想在叙述这部小说最后几章的内容之前，先谈一谈我们，就是我、罗日科夫和赫鲁廖夫不在城里，而在“白石”码头这段时间内，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读者大概还记得，当少校突然决定离开城市时，他曾对克拉耶夫斯基说过，要他参加某项“YH”行动。我现在想解释一下这次行动是怎么回事，以便读者对以后的情况有所了解。

“YH”这两个字母的含义是“揭露尼契波连柯”。尼契波连柯参加了特务组织。他坐小船来这里是为了取走无线电指示器——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然而还没能搜集到他的任何罪证，于是我们决定使用计谋。事有凑巧，尼契波连柯并不知道克拉耶夫斯基已发现无线电指示器，并把它交给了公安人员。罗日科夫当时立即意识到是在同一个奸诈的老恶棍打交道，因此，审讯他时并没有把查获的指示器拿给他看，有关指示器的事也只字未提。尼契波连柯以为无线电指示器尚未被发现。后来，公安人员又把捞虾网归还了他，这更使他安下心来。其实，指示器已放回原地作为诱饵，而其中的秘密情报也被取出，换上了另一张纸。对指示器进行了一番改装：原先的信号每分钟传导四次，而改装后的指示器

却不停顿地发出信号，象电话“占线”的声音一样。这部指示器的特点是：当它浸在水中时，不发信号，而一从水里取出，便立刻开始发动。这种作用是由一个非常简单的装置控制的。黄铜管内蓄电池旁焊上一个小管，上面有几个小孔。小管里有个金属小盒起漂浮器的作用。指示器浸在水中时，小管灌满水，小盒便浮起来。可是把指示器拿离水面，水从小管流出，浮子就落到小管底部。接上电源，指示器便开始工作，发出信号。我们改换了波长，因此，尼契波连柯既不能用这台指示器收到信号，也无从发现所发生的情况。当他把指示器扔入水中时，就切断了电源。拉普乔夫大尉用了不过两天的时间想出这个改变波长和信号的办法，结果很成功。

我们出发到“白石”码头去的次日，克拉耶夫斯基亲自把无线电指示器放回原处，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同时，也决定对指示器日夜不停进行监视。

自然，尼契波连柯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冒很大风险去取指示器的，不过，很可能他要探测一下指示器是否仍在原来的地方，是否一切都平安无事。所以白天是从一个距离很远，又隐蔽得很严实的观察点用一架高倍望远镜对指示器进行监视。此外，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泊着一只摩托艇以备万一。小艇与观察点之间保持无线电通讯联系。夜间设下了埋伏，有俩人分乘两只伪装过的小艇，在芦苇荡中隐蔽，另有两个人埋伏在河岸两边。

值勤人员都配备有无线电测向接收机。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把尼契波连柯释放了，任其自由活动。毫无疑问，他会千方百计把无线电指示器弄到

手，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消灭这个随时都可能被发现的重要罪证。释放尼契波连柯的那天晚上，扎鲁宾大尉和尼奇金中士应罗日科夫少校的邀请，从另一个城市赶到这里来协助工作。

第一夜平静无事。第二天天气晴朗，克拉耶夫斯基和报务员斯切潘诺夫从早到晚在观察点严密监视着无线电指示器。还有几个负责监视的人员化装成猎人、渔民和普通游玩的人，留心查看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可以用望远镜能看到指示器的那些地方。

这天的监视也毫无结果。

不过，后来还是了解到，尼契波连柯曾到这里来查看过指示器是否完整无损。值勤人员从远处用望远镜监视他时，曾发现他和一个相识的集体农庄庄员坐着运干草的大车从岸边经过。

第二天夜里值班人员的安排是这样的：

在一号岗位上是赫鲁廖夫中尉，他刚从“白石”码头回来。他乘坐小艇隐蔽在河流下游，距离指示器五十米左右的芦苇丛里。

二号岗位上值勤的是阿尼西莫夫中尉。他也乘小艇隐蔽在河的上游，离指示器约一百米左右的芦苇丛中。

在三号岗位上值勤的是扎鲁宾大尉。他隐蔽在左岸的灌木丛中。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岗位，因为指示器的位置离这里要比离对岸近得多。

在四号岗位上是尼奇金中士。

命令中要求全体值勤人员均需保持肃静，不得发出任何

声响，集中注意力进行观察、聆听。测向仪的环状天线要对准指示器的位置，而且要求只戴一个耳机，用另一个耳朵聆听周围动静，还要不断变换天线的方向。

克拉耶夫斯基不能直接监视尼契波连柯，因为瞭望所距离指示器差不多有半公里远。不过，他也不愿袖手旁观，白天他在瞭望所呆了一天，晚上决定在那里过夜。他没回家，他的车已经让人开走了，因为怕声张出去，走漏风声。他不愿意去“新路”国营农场过夜，那里的人都认识他。

和他一起留下来过夜的还有报务员斯切潘诺夫。

夜间天气变了，阵阵疾风，乌云布满了整个天空，忽然下起濛濛细雨。河面上浓雾弥漫，漆黑一片。高大的树木，矮小的灌木丛，水中露出的小岛和河岸的轮廓都变得影影绰绰、模糊不清，尤如蒙上一层薄薄的纱幕。它与暗绿色的背景联成一片，浑为一体。瞭望所设在紧靠山崖边挖好的一个小土窑洞里，外面用土和草遮盖了起来。正面只留下一个很窄的缝隙。这样可以挡风遮雨。克拉耶夫斯基坐在缝隙旁边，他只能留心地细听周围发出的声响。当时，他除听到森林的呼啸声，以及不时随风传来的国营农场发电站柴油机发出的单调的机器声外，其他什么也没听见。

“这正是便于进行活动的好时机，伸手不见五指。那些坐在小船上，经受风吹雨打的同志会怎么样呢？”——克拉耶夫斯基思忖着，不禁瑟缩起来。

斯切潘诺夫把锅放在铁支架上，点燃酒精炉开始煎鸡蛋。她们吃完煎鸡蛋，喝了茶，吃了饼干，然后又吸烟：克拉耶夫斯基抽烟斗，斯切潘诺夫吸香烟。窑洞里变得暖和起

来，克拉耶夫斯基觉得全身暖和多了。他坐在无线电发报机的箱子上，把那条残废的腿伸直，靠着墙壁打起盹来。他感到很累，昨天一夜几乎没有合过眼，整个白天望远镜没离手，所以这时有些支持不住了。

夜里十二点多，斯切潘诺夫把无线电发报机调到无线电指示器的波长上，戴上耳机，他也坐下来打盹。风似乎停了，但周围仍然是雾气濛濛，浓雾也透进窑洞里来，使人感到寒冷和潮湿。漫长的秋夜开始了。

突然，斯切潘诺夫一下子跳起来，他睡眼朦胧，不小心一头撞在窑洞里的一根支柱上。

“信号！克拉耶夫斯基同志，有信号，信号！”他开始摇晃克拉耶夫斯基的身子。

克拉耶夫斯基已站立起来，信号声如此之大，离耳机一米远都听得很清楚。

克拉耶夫斯基从窑洞内钻出，试图在周围茫茫的黑夜中看清什么，但毫无结果。他既没看到有光亮，也没看到水面或陆地上有什么人影。他侧耳谛听，没听到一点可疑的声响，既没听到划桨的声音，也没听到人的脚步声。这样过了十多分钟，可是信号声一直未停。他实在忍不住了。

“斯切潘诺夫同志，您留下来监听信号，我去看看那边的情况。”他说完，将手电筒放在口袋里就沿着岸边小路走了，很快就消失在浓雾迷漫的黑夜里。

天快黑的时候，赫鲁廖夫中尉乘小艇来到事先指定的芦苇丛中，用芦苇和蓬草把小船隐蔽好。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

到在芦苇丛尽头的水面上不断摆动的无线电指示器。赫鲁廖夫把测向仪的天线对准指示器。他安稳地坐在小船的凳子上，裹紧大衣，将船桨、手电筒和手枪放在跟前，准备长时间的守候在这里。

很快四周就变得一片漆黑。森林、陡峭的河岸、岸边长满芦苇的河岔都笼罩上一层薄雾，沉浸在黑暗之中。时间过得特别慢，手表的莹光指针在表盘上慢慢地爬动。中尉好动的性格使他坐不住，但又迫不得已非这样不可。要是能坐船沿河去搜索每一个角落，去查看每一个小水泊该多痛快呀！但他不能擅离职守。一动不动地坐着使他两脚发麻。脊背也开始隐隐作痛。大衣淋得又湿又重，帽子也已湿透，冰凉的水滴顺着头往下流。他紧缩成一团，冻得发抖。

耳机内突然响起信号声，赫鲁廖夫忙成一团，险些没从船上掉下来。测向仪立即确定了无线电波的发射地点，或者说，携带指示器的尼契波连柯是在右前方。赫鲁廖夫下了船，立即把船拖出芦苇，他的裤子从膝盖以下都湿透了。然后他又爬到船上，划了几下便到了深水区，很快就划到岸边。他沿着岸边往返划行，搜遍了每一个角落，希望能追赶上敌人乘坐的小船，但他什么人也没遇见。这时，信号好象又从河的上游方向传了过来。

“好一个坏蛋，”赫鲁廖夫想道，“溜得可真快呀！”他把船头拨向上游方向，断定他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信号是对着船行驶的方向传过来的。可是无论他如何使劲划桨向前追赶，前面依旧空荡荡一片漆黑，只有雾霭和芦苇。

“难道他会溜掉吗？”赫鲁廖夫心里很不安。“嘿，你这个

魔鬼，虽然是个老家伙，但船划得还满不错，船也是上等的。”

中尉使出全身气力，躲闪开浅滩、芦苇和木块，向前划去。突然，在黑暗中陡峭的河岸象一堵墙一样横在少尉的面前。赫鲁廖夫惊异地发现，他耳边仍在断断续续地响着信号声。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尼契波连柯扔掉小船，拿着指示器上岸走了吗？但岸边没有一点小船的踪迹。赫鲁廖夫把船系在灌木丛中，费劲地爬上岸。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已收过庄稼的田地。远处有村落的灯光在闪烁。确定好方向，赫鲁廖夫就在田野中照直向前走去。路不好走，地上石块和黄鼠狼的洞口不时地磕绊着脚。他在松软的土地上深一步浅一步地走着，靴子沾满了泥，走起路来感到靴子很沉重，象是穿了一双铁鞋。他一直这样走着，终于走上了那条他所熟悉的小路。这条路是直接通往村子里去的。在村边一间简陋的茅屋里就住着浮标看守人尼契波连柯。这时已听不到信号声了。赫鲁廖夫不再考虑什么，径直向尼契波连柯住的屋子走去，他猜想，大概尼契波连柯已到了家，把无线电指示器拆开了 。

这座小屋座落在一个小土丘上，下面是河流，屋旁矗立着一根桅杆，这是悬挂导航信号用的。屋旁没有栅栏、板棚，也没栽树。屋顶已很破旧，炉烟筒已倒塌。赫鲁廖夫对这间破旧小屋的情况很了解，他曾经到这里来搜查过。他绕着屋子走了一圈，没有迹象表明屋内有人，屋内没有点灯，门上有锁，窗户是紧闭着的。中尉在一条小沟里隐蔽起来。他拿定主意，在这里守候屋子的主人归来。

阿尼西莫夫中尉坐在小船里，也躲在芦苇丛中。他位于河流上游，离指示器较远的地方。他幸好带着一件雨衣，这时雨衣可起了防雨和御寒的作用。当他听到清晰而响亮的信号声后，他以为尼契波连柯已拿到无线电指示器。于是他很快划到放置指示器的地方，无所顾忌地打开手电筒，仔细查看。但什么人也没看到。这时他想，信号是从右岸发来的。他毫不迟疑地向右岸划去，但在岸边同样没发现有人。

扎鲁宾大尉隐蔽在正对着指示器的一棵树后，离指示器也不远。信号一下子响得很厉害。他以为尼契波连柯已拿到指示器，正在向岸边划去，他甚至还有几次看到，在黑暗中岸边有个穿来穿去的小船，听到有划水的声音。他守候在那里，以为小船会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靠岸。可是，结果什么也没等到（实际上他看到的是赫鲁廖夫中尉）。大尉在那里一直等到天亮，但一无所获。

尼奇金中士遇到的情况和大尉遇到的大体相似。他守候在河右岸的山崖边。他听了很久，但总确定不了，信号发自什么方向。他似乎觉得，是从附近岸边的芦苇丛中发出的。他来到河边，搜查了芦苇丛，但什么也没发现。于是他又检验了信号发出的方向，发现信号现在是沿着河流在播发。也就是说，罪犯是乘船在向上游划行。于是，中士便沿着河岸寻找，他迷了路，走了一夜，天亮才回来，他也是空手而归。

结果，四个值勤人员谁也没抓住，甚至没看到尼契波连柯。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漆黑的夜里，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后来，罗日科夫少校详细分析、研究了这次的行动计划，制出了那个地区的地图，在地图上标上了每个岗哨的位置和大体上他们每个人经过的路线。

大家都曾料想，多年的浮标看守人会坐着他那轻便的小船来到这里，然后把无线电指示器从水中取出，于是指示器就会马上播发信号。但这种料想落空了。尼契波连柯是经林间小路从左岸步行来到河边的。他离三号岗位不远的地方下了水，他不顾河水冰凉刺骨，水浅则涉水，水深则游泳，就这样来到指示器跟前。他拿到指示器以后，把它衔在嘴里，绕过芦苇丛向右岸游去。他在水中游了二十多分钟，指示器的小管始终在水里，因此指示器一直没有开动。到了岸边，尼契波连柯找到事先放在那里的渔篓，把他随身带来的筐子用小鱼装满，然后在离四号岗哨不远的地方上了岸，顺着斜坡走了上去。这时，指示器才开始工作，信号才在天空中传播开来。信号惊动了所有的值勤人员。尼契波连柯没产生任何怀疑，他顺着林中小路走到大路上，然后向着“新路”国营农场的方向走去。

值勤人员所携带的无线电测向仪是供较大的范围内寻找发射台用的。上面的圆形天线可以准确地收到来自前方或后方的电波。这样把值勤人员搞糊涂了，每个人都认为发射信号的地点在自己的前方。其实，对赫鲁廖夫和尼奇金来说，发射地点是在他们的背后，他们向河的上游方向走，原以为是在追赶尼契波连柯，而实际上却离他愈来愈远。只有阿尼

西莫夫确定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当他采取行动时，也已为时太晚。

以上的情况，都是罗日科夫事后经过冷静的分析，才弄清楚的。

克拉耶夫斯基沿着岸边的小路走，他穿过小树林，在山崖边停住了脚步。前面一片黑暗，从河面上飘来湿潮的寒气。不管克拉耶夫斯基如何仔细查看，他也无法辨认出，哪里是河水，哪里是芦苇。只有在远处的一个地方，时隐时现地能看到有一个亮光在闪烁。

“正在搜寻呢，”他想。“这很好。这就是说，大家都动起来了。”他焦急地等待着预定的信号——三声枪响，表示特务已被抓住。但时间慢慢地过去，周围依然是一片寂静。此时，他听到有划水声，在黑暗里他看出有一条小船在岸边划动，手电筒的亮光又闪了一下。

“这是自己人，”他这样想，就向岸边走去。“喂，那里是谁？”他轻轻地喊道。

“您是克拉耶夫斯基同志吗？”——这是阿尼西莫夫的声音，“尼契波连柯大概窜到这里，上了岸……”

“是吗？……为什么您这样认为呢？”

阿尼西莫夫没有回答，他很快把船划到岸边，拿起无线电测向仪，跳到岸上。

“信号是顺着这个方向播发的，”他用手指着与河岸垂直的方向。“在水里和芦苇中都找不到他，这就是说，他已上岸了。”

他们向上面的森林走去，又检查了一遍信号播发的方向。阿尼西莫夫是正确的，他指的正是信号发出的方向。

“他既可能在这岸，也可能在对岸，”克拉耶夫斯基说。“不过，对岸有扎鲁宾大尉在值勤，他应该去抓他。我们的任务是在岸这面搜捕他。”

他们按照信号指示的方向径直朝前走去。穿过森林，不大工夫便走上一条向东去的大路。这是直接通往“新路”国营农场的路。很快他们就走出森林。眼前展现出国营农场的一片葡萄园。黑暗中，远处有些地方灯光在闪烁，这是国营农场的房屋。在离森林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所小屋四周栽着小树。农场看守人就住在这里。窗户里亮着灯，看来，人还没睡。

克拉耶夫斯基和阿尼西莫夫围着小屋转了一圈，当即断定，信号无疑是从这里发出的。

“指示器在屋子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希望尼契波连柯也在屋子里。走，咱们进去。”克拉耶夫斯基说道。

他们来到门前，敲了敲门。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开门的声音，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高个子老头。他惊奇地看了看这些不速之客。

“尼契波连柯在这里吗？”阿尼西莫夫问道。

“在这里……你们找他有事吗？”

“找他谈谈。”

“好，你们谈吧。”

阿尼西莫夫和克拉耶夫斯基走进小屋。很快走过穿堂，推开了屋门。屋内点着灯，尼契波连柯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



穿着内衣，用刀子在刮鱼鳞。地上放着一个装满小鱼的带盖的筐子。他一眼认出阿尼西莫夫来，欠起身子，刀落在地上。

“呵，亲爱的尼契波连柯，”阿尼西莫夫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俗话说，旧友重逢呀！是在做鱼汤吗？……好吧，请告诉我们，把无线电指示器藏在什么地方了？……”

尼契波连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克拉耶夫斯基把屋子看了一遍。只见靠墙一面是个大炉灶，上面烘烤着衬衣、破旧的外套和鞋；炉灶上烧着一锅热水。另一个墙角堆放许多捕鱼用具，有各种各样的钓渔竿、抄网、渔叉。看来，房子主人是个钓鱼爱好者。

阿尼西莫夫走到这个墙角，伸过手去，把无线电指示器取了过来。现在它已伪装成渔竿了，在竿尖上系着带有渔漂、渔钩的渔线。

“这是什么？”阿尼西莫夫问道。

尼契波连柯还是沉默不语。

“这是你的渔竿吗？”阿尼西莫夫问那个当看守人的老头。

“怎么是我的呢？……他的，他刚拿来的。”

“尼契波连柯，看到了吧，”阿尼西莫夫继续说，“你的戏该收场了。穿上衣服，跟我们走！哪些是你的东西？”

可是，尼契波连柯没衣服可穿，他所有的衣服都湿透了，在烤着呢。

“你在什么地方把衣服弄湿的？”阿尼西莫夫继续盘问。老看守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异，替他回答说：

“他从渔篓子往外取鱼时，失足掉进水里了。”

“是来给您送鱼吃吗？”

“怎么能是送呢？是来换苹果吃的。”

中尉不想多说了。他打电话和市里取得联系，叫来了汽车。当尼契波连柯穿上干衣服，阿尼西莫夫用车把他带走时，天已大亮了。他拿上无线电指示器，还有尼契波连柯所有的东西、衣服、鞋子和筐。这个筐就是罗日科夫在尼契波连柯小船上看到的那个装满螃蟹的筐子。经过仔细查看后发现，筐里巧妙地藏着一个测向接收器。这是尼契波连柯用来找寻无线电指示器用的。天线就安装在筐子提把的树条里，所有的装置都放在做为筐底外圈的一根粗树条里。话筒藏在扣别筐盖的小木栓内，而电线是和系小木栓的绳子缠绕在一起的。

“YH”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我接受罗日科夫的邀请，参加了此案的审理工作。

他从“白石”码头回来，立即开始审理这个案件。第一次审讯尼契波连柯时，我就在场。对于这次审讯倒是值得一提的。

值班民警把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带进屋里，他衣衫褴褛，蓬头散发，蓄着灰白胡子。让他坐在椅子上，给他抽烟。这个人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烟，一声不吭。

“好吧，”罗日科夫打破了室内的寂静。“说出你的姓名来！”

“什么？”罪犯好象刚醒悟过来似的。

“你的姓名？”

“姓名？……我叫尼契波连柯。”

“不对，说你的真名实姓！”

“我说的就是真名实姓。我叫尼契波连柯。”

“那你用过别的姓名吗？”

“没有。”

“就算是这样吧。你的出生地点，出生年、月、日？”

“我是本地人，一九〇五年出生在奥列霍夫村。”

“你只有四十岁？……好……说你是怎么当上特务的？”

“少校同志，我能算是特务吗？有我这样的特务吗？……要是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可以说，我连一个特务也没见过。就是这么回事！”

“那末你是什么人呢？”

“什么人？不过是个联络员罢了！”

“反正都是一样。接着说下去！”

尼契波连柯象和尚念经似的，不时地干咳几声，结结巴巴，罗里罗嗦地讲述了他自己平庸的一生。

他是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差，中学没能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父亲破产后死去了。后来，尼契波连柯到一家店铺去当伙计。可是他既不会干活，又爱酗酒，所以不久便被店主解雇了。他打过短工，到处流浪，偷过东西，也蹲过监牢，最后当上了浮标看守人。

在德国法西斯加紧准备对苏进行战争的时候，他被招

募，当上了特务。有个人来找他，和他一起抽烟，对他表示同情，提出让他做德国特务。答应他，每月给他一些佣金，还许诺德国占领乌克兰后将分给他一大块土地。尼契波连柯同意了。

过了一个月，便把他从故乡波兰送到德国一个小城——米特维杰，在那里的一所特务学校受训。半年后，他回到家乡，还是干看守浮标这个老营生。不同的是，他掌握了搞特务活动所必需的知识。交给他的任务并不复杂，要求他把藏在规定地点的密码情报取来，不经译释用无线电拍发出去。发报机装在测量河流深度的标杆里面。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别的特务，也没有看过一份情报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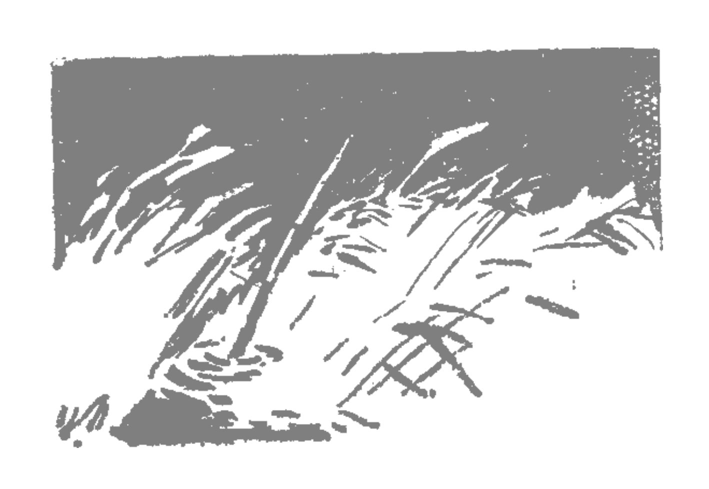
战争期间，他同别的苏联公民一道被疏散到后方。原打算在靠近前线的大河上继续进行特务活动，不料他却被派到卡马河去。他的活动也因此不得不中断。战争给他带来许多烦恼，他积蓄起来的一笔为数不多的钱，存在德国银行里，战后化为乌有了。同时，他也失去了能过安逸晚年的梦想。他又回到自己的小茅屋里，缺少钱财，没有主子……但是，没过多久他又找到了主子。当然是新主人，但比过去的要慷慨得多。他们的设备有很大的改进，是用无线电指示器，还供给尼契波连柯一个筐子形状的测向仪，并且教会了他如何使用。

这种无线电指示器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种类也很繁多。有管形的，有玉米秸或烟草杆形的，还有的是篱笆枝条形的，等等。每一种指示器都发出独特的讯号。

以上是尼契波连柯用了抽完一整包香烟的时间所交代的

全部内容。

显然，他对灰石岩以及在附近一带活动的那帮特务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他的交代对我们侦破此案没多大用处。



第二十六章在“A”号室

第二天，我和罗日科夫前往灰石岩地区，去观看当年德寇在那里逞凶时，他们导演的这出“戏”的最后情景。

我们乘汽艇驶近灰石岩时，听到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是从岸边向着灰石岩的纵深处开凿通道。少校向我解释说，我和莲娜离开地下闸门时，在河底看到的铁板、铁索和水泥板，是一个大型槽形斜向通道的组成部分。这个通道是进入地下工厂的必经之路。这条斜道用铰链固定住，用链条可以将它的一端升高成垂直状，并能与岸边陡立的石岩相接，形成一个超出水平面的管状大竖井。竖井的水被排出后，成了一条不需潜入水下便可与地下工厂来往的通道了。

“不过，这个斜道被沙土埋没了，锈住了。”少校解释说，“所以复修这条通道已不可能。更为简易可行的办法是从外面凿一个新的入口，何况我们现在也无需掩人耳目，可以公开开凿。这块地方岩石厚度不超过三十六米，我们的挖掘工人保证用六昼夜的时间将岩石凿穿。自然，我们不必在这里等待他们完工。”

快艇绕过突出于河面的灰石岩，驶近山岩下面地下通道的所在处。这里停泊着几艘小船，其中一艘船尾很奇特，是方形的，有个小梯由船尾伸入水里。这是特种水下工作队的

一艘配合潜水作业的快艇。我们在自己的衣服外面穿上一套绒衣裤，然后又套上潜水服。这回穿的是真正的橡皮制连衣裤工作服。于是我再次通过这条一周以前我同莲娜手挽手由相反方向走过的地下通道。这次走起来可轻快多了，丝毫不感到寒冷，而且水下长廊也已清理得干干净净，还有了照明设备。我们不费气力便沿着小梯子走到上面的一个地下室。头一桩事便是脱下身上这套沉重不堪的潜水服和令人感到过份暖和的绒衣。赫鲁廖夫中尉在这里和我们相遇，他按军规向少校报告情况。

我环视四周，许多把提灯将低矮的石头拱顶、小码头和左右两侧的地区照得通明。我和莲娜曾经在这个阴森的洞穴里度过可怕的时刻。可是，现在置身此地已完全没有那种使人不快的感觉。在明亮的灯光下和欢快的锤击声中，惊恐不安之感完全消失了。

在一间侧室，一个大木架上放着一只长约三米、宽度和高度不到一米的小船。两名穿海军服的机械士在拆卸它。这只小船的样式和两周前的那个夜晚我曾见过的那只小船极为相似，当时有两个人坐在船上顺流而下。这两名坐船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但这只船怎么竟会在这里出现了呢？上次来到这地下秘密建筑时，无论在水中，还是在屋内我都不曾见过有这只船。它究竟怎么来到这里的呢？

“上次这只船并不在这里，”罗日科夫回答说“有人报告我，在闸门处发现了这只小船，于是我才中断在‘白石’码头地区进行搜寻而赶往这里来……噢，同志们，弄清楚这艘小船的构造了吗？”他向两名机械士询问。

“少校同志，这只小船显然是个挺有意思的新发明！”一名机械士回答说。“是艘既可以在水面行驶，又可以在水下行进的微型潜艇。乘这种小艇时一般要穿潜水服。”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详细讲述了这艘小艇的结构。

三个互相连接的，充满压缩空气的钢罐，一个煤油箱和两个用来保持船身平衡和稳定的蓄水室差不多占去整个船身的面积。船尾安装着一台靠热压气体运转的乌特海德型发动机、传动机机件部分和一个螺旋桨轴，轴端有两个多向旋转的螺旋推动器。小艇能容纳两人，可以在水面行驶。需要下沉时，便打开阀门，将水放入两个蓄水室。船上有特殊的装置，能自动调节进水量并控制水平舵，使船体始终在一定深度行驶而不上升至水面或下沉到水底。需要上升到水面时，则用压缩空气将蓄水室中的水排出。下沉之前，船上的人穿上潜水衣，从贮气罐中吸取空气并用皮带把自己系在船体上。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这艘小船几乎全部是用‘T-66’型鱼雷部件装配成的。钢罐、发动机、螺旋桨和液体测潜调整器—— 全部是‘T-66’型鱼雷的部件。只有船体、蓄水室，还有转向操纵系统是特制的。”机械士解释完毕。

“虽然没什么新东西，但构造很巧妙，”少校说道“象这种载有潜水员的小艇以前也使用过。您以为这艘小艇最高航速是多少？”

“根据发动机看，船速并不高：水面航速大约是二十浬，即每小时三十五——三十七公里左右。”

“它的航距是多少呢？”

“相当可观。不少于一百五十公里，然后便需要重新充气。在地下港湾有个强大的空气压缩机专供充气用， 它的压缩量达二百个大气压。”

“这个新的发现使我们弄清不少情况，比如特务分子是怎样到闸门来的，别佳和索夫科夫怎么到这里的，以及那个陌生人又是用什么方法逃离‘白石’码头的。”

“您以为他现在还是在这个地下工厂吗？”我不禁问道。

“是的，我有充分根据认为是这样。”

“他能在水下潜行这么长的距离吗？”

“他为什么要在水下潜行这全长九十公里呢？夜间他在水面行驶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只是在码头附近或者遇上轮船时才沉入水下。不过，最后一段距离他是完全在水下走的，为的是不被我们的观察哨发现，然后便呆在水下等待天亮。有一艘小船在活动，这我知道，但没料他它能在水下行驶。否则我便会在这地下港湾布置值勤人员，也会用钢索拦截水下入口了。可是，有件事我还没弄明白，那个陌生人明明知道我们迟早会在这里把他逮住，他究竟为什么还往这里逃呢？”

机械士继续拆卸那只小船，而我们去查看地下建筑的上一层。我和莲娜进入水闸走过的有五十二层台阶的陡峭石头梯道，现在已灯火通明，进入水闸入口的装甲钢板已打开，露出通往办公室的通道一名佩戴工程兵中尉肩章的军官正在指导几名钳工拆卸钢板，神像上那个持锤的巨大钢臂已平放在地上，野猪头已卸下，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罩壳。里面露出一部带有许多线圈、杠杆、齿轮、电线的复杂机器。这个巨大的日耳曼神像虽然已失去手臂，躯体已被拆开，但仍使

人胆战心惊。

事后向我解释了这部机器的复杂结构。这部机器曾引起我许多不寒而栗的回忆。

整个关闭入口的钢板门由锰钢制成，厚十五公分，甚至连金钢石钻头也无法钻透它，因此只得将石头凿通，从下面来拆开这个机关的结构。原来，这扇门的启开或关闭是由一个用链系在深井上方，有三吨重的大锤来控制的，重锤牵动钢板门，循绕安装在滚珠轴承上的立轴转动，同时牵动这庞然大物力大无穷的臂膀。控制系统安装在野猪体内，要想开门只需转动野猪的耳朵，然后再按一下开始发出红绿色光亮的野猪的眼睛，这一点我们是了解的。当进去的人切断这束光线时，电光控制器就开始工作，门随之关上。对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并不了解，还有一个总控制室，对每道门都进行监视，而通过这些门出入是很危险的，因为总控制室随时可以将门关闭或打开，或使那能置人于死地的大锤发挥作用。

我们穿过办公室，沿走廊来到地下工厂大厅。在下面电炉旁站立着几个人。当我们进来时，他们转过身来，我认出他们当中有莲娜、叶廖缅科和克拉耶夫斯基。第四个人已经上了年纪，满头白发，蓄一小撮胡子。原来这是一位从莫斯科来的科学家，姓萨别根。虽然他已年迈，却不愿坐等地道完工，而不辞辛苦地穿上潜水服和其他人一起从水底来到这里。叶廖缅科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谢尔盖同志，您来迟了一步，”他同我握手时说。“我们未征求您的同意便把莲娜‘劫持’来了。她在这个地下迷宫里

给我们带路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们在这里把所有使人感兴趣的东西都仔细看过一遍，”克拉耶夫斯基补充说：“有闸门、办公室、矿坑，还有工厂。我们去过实验室，也到过莲娜找到您的那个地方，还有上次你们进来时通过的集水室。”

“你们怎么到哪里去的？”我问道：“难道也是从铅管道爬进去的吗？”

“当然不是的。工兵们先将堵塞的井口打通，然后顺着排水道钻进去，在采取了一切安全措施之后，为我们打开了暗藏在庞然大物后面的那道门。因此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便进来了。”

“那么，你们已经到处都细看过了？”罗日科夫进一步问道。

“除‘A’室以外，全都看过了。”

“是的，到那儿去可不容易。在那里大概可以找到全部秘密的谜底。”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我有根据。”

“你说说看。”

“譬如说，当我们这两位青年朋友谢尔盖和莲娜进入闸门以后，为什么入口的钢板门会自行关闭上呢？当然还有其他理由。”

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过了那间可通向下面闸门处的办公室，走过设计室、修理车间、贮藏室，来到一道关闭着的钢门前。门上写着神秘莫测的“A”字。

“把这个‘拦路虎’搬掉还得费点力气。”克拉耶夫斯基说道。

“启开闸门旁那块钢板门时，连续用了十个小时来凿、炸岩石。这里会更加困难。”

克拉耶夫斯基走近钢板，用手杖在上面敲了一下，突然，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仿佛是在回答他的敲击，钢门阒然无声地慢慢转向一旁，露出一个狭窄的通道。这的确是突如其来，象阿拉伯神话故事里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大家都不禁愣住了。我目瞪口呆地朝里面望去，看到一个不大的空空的圆形房间和一条拐向左面的走廊，那里的光线很暗。

“小心！全体向后退，靠墙站着！……”少校高呼道。

我们听从他的命令，急忙退后，紧贴墙壁。此时我才明白，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只要一枚手榴弹或一排子弹就可以把我们大家全都报销了。

门依然打开着，象是在请我们进去。前方，在敞着的钢门后面没有一点使人感到可疑和危险的动静。

“要绝对小心。这里可能有陷阱，”少校说。“谢尔盖同志，快叫钳工来，让他们把门固定住，使它不会一下子关上。”

钳工们迅速拖来一根铁梁，横放在钢门和走道墙壁之间的地上，把门顶住，这样门不再可能关上了。

罗日科夫掏出手枪，跨进门坎。赫鲁廖夫紧跟后面，我同克拉耶夫斯基跟在他身后。少校命令其他人留在原地不动。我们手扶左边比较安全的一堵墙壁，鱼贯前进。 没走多远，刚一拐弯，走道前方便有一扇普通的木门，门半开着。

罗日科夫仔细端详了一番，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

“赫鲁廖夫中尉，您留在这个入口处。”少校命令道。



我们依次走到一个平台上，平台四周环绕着一个杂技场那样的圆形大厅。这也是一个多年来被水浸蚀而成的天然石洞。几盏电灯发出的微弱光亮照射着一套大型机组。它占据了大厅中央部份。这组机器的高度几乎触到洞顶。许多巨大的圆形柱状物，庞大底座的支架，各种大小的管道，机器的

横竖联接杆都在昏暗的灯光中闪耀着钢铁的亮光。我尽力谛视，但也弄不明白这套机器的用途。

通向平台还有三个门，有扇门敞开着。罗日科夫朝那里走去。我们同他一起走进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我们看到过的那两间办公室很相似。一样的写字台，上面放着电话机，同样的电壁炉、扶手椅和靠墙放的沙发床。一个一模一样的高抬臂膀、手持大锤的铜制巨人雕像占据一堵后墙。只是在房间角落矗立一个装着许多按钮和指示灯的控制台，控制台旁有个放着酒和小吃的餐橱。

但是，这一切我都是后来才看清楚的。刚一进屋时，我的全部注意力被一个人的躯体吸引住了，如果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进来时，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的那个似人非人的东西的话。他光秃秃的脑壳上有副死人一样苍白的面孔，脸颊瘦削得不象样子，似乎隔着一层皮肤可以看得见头骨，脑袋吃力地支撑在纤细的满布皱纹的脖颈上。瘦骨嶙峋的双手好似有人用绳子牵动一样不住抽动，弯曲的脊背在颤抖。领章上印有金色橡树叶的黑色军服罩在他身上就象龟甲，上面挂满各种纹带和徽章，一枚大铁十字勋章挂在脖子上左右晃动。他骨瘦如柴，整个形体活象一头秃鸠，只是他那呆滞的眼睛却已失去了猛禽所特有的锐利目光。

“请收起您的手枪，”他带着浓厚的德国口音，用俄语对罗日科夫说，“这里用不着它。您面前站立的是突击营总指挥冯·李姆舍，即这个工程的负责人。请坐，先生们！请问尊姓大名？你们大概是俄国人吧？”

“你说对了。而你的尊号已有些过时。”

“什么？您说有些过时了？难道红军当真已经占领柏林，帝国和元首都不存在了吗？”

“从今年五月起他们的确已经不存在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天为止，我和外界没有联系。”

“你没有电台吗？”

“我把电台毁掉了。当时不得不这样做。我的第一助手感到返回德国部队已无希望，就背叛德国，用无线电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这发生在你们占领布达佩斯之前。我下令把他处死，同时也处死了无线电报务员，把发报机也毁掉了，可是不小心把接收机也损坏了。”

“这是可悲的事情。”

“是完全不得已的事。元首已经死了吗？”

“他自杀身死。”

“我们的国家社会党呢？”

“已经解散。”

“那么戈林、冯·里宾特洛普和凯特利元帅呢？”

“交国际法庭审理。我想他们会罪有应得的。”

“是吗？可是阿巴札没告诉过我。”

“谁是阿巴札？是你藏在此地的那个特务吗？”

“是的……就是你们搜捕的那个。我已决定把他交给你们。”

“噢，这便是你把大门打开的目的了？”

“对，正是这样。此外就是想从你们这里知道，在我离群索居的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何

况你们迟早会进入此地的。”

“这倒是毫无疑问的。”

“我弱而无力的手，甚至一个手指只要动一下，”李姆舍抬起他骨瘦如柴的手，“那么，一千吨烈性炸药就会将这座山岩带同矿源、工厂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全化为灰烬。”

“为什么你没有引爆呢？”

“我已经说过了，我要交出阿巴札。”

“想借此而获得赦免？是吧？你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

李姆舍默不作声。

“我们得到情报，获悉你们工厂撤退的专列被游击队炸毁，全体人员死亡。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是吗？”克拉耶夫斯基问。

李姆舍满脸皱纹，咧嘴一笑，显得更加难看了。

“这是军事上的计谋。我的车厢是空的。死去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我遵照元首的命令留了下来，以便我们的人几个星期以后返回时，能打开入口……”

“可是你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

“唉，是呀！一年多了……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我的儿子弗里特里赫，我的一名高级助手，一名冶金专家，报务员，医生和厨师，一共七个人。”

“这不包括基辛格和帕西柯工程师。”罗日科夫纠正他的话说。

“噢，对的！当然不包括他们……我把他们全忘了，”李姆舍表示同意，丝毫也不显得窘惑。“现在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的助手和那名报务员的情况我们了解。其余的人到哪里去了？”

“冶金专家和医生未表现出阿里安人所应具有的坚强意志，他们竟敢要求我放他们出去。这完全违反军纪，我当然必须把他们处决。”

“也就是说，把他们杀害了？”

“我把他们关进了放钱的保险库，然后开动自动控制器把门关上。我只能这样做，不然，他们会跑掉的。”

“是从这个雕像后面的秘密通道跑掉吗？”罗日科夫用手指着铜像问道。

“不是，这个雕像后面没有通道。我们还没来得及建造好。”

“是这样。我们可以相信你的这番话……不过，你的儿子在什么地方？也在保险库里吗？”

“没有。我的儿子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知道，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无用的，于是就自杀了。”

“你的这些话使人难以完全置信。”罗日科夫说。

我一直在听着这个法西斯分子吱吱呀呀的讲话。看着他那表情呆滞，老态龙钟，但还带有几分傲气的面庞和他那干瘦的、颤抖着的、有个突起喉结的脖子，我心中由于恐怖而感到发冷。这不是一个人，不是的。甚至不是一头野兽。这是一个狂人，一个社会的败类，一头怪物，一台丧失人类各种情感的机器，是一部完备的机器人，不论把他叫做什么都成，反正他不是个人。

“你的厨师在什么地方？”有人问道。

“卡尔在一个月前由于恶劣的地下生活条件和污浊的空气而死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始终忠于我。我没有他生活得很困难。虽然这间办公室有良好的隔绝条件，而且有特备的通风设施，但我的身体也受到一些损害。”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搬到你的办公室来住呢？这样他不就可以不死吗？”我忍不住问他。

李姆舍慢慢地转向我，用呆滞的眼光看了我好久。

“年轻人，”他终于说道，“德国军队的条令不允许下级官兵和他们的上级住在一起的。”

他沉默下来。显然，长时间的谈话使得他筋疲力竭。他合上眼，仰靠在扶手椅上。我们也不作声。过了一阵，他恢复过来，斟上杯酒，一饮而尽。

“你们期待着我把阿巴札先生交给你们吗？”他很吃力地从椅子上站立起来，“走吧！他关在下面的仓库里。”

“我希望你先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些按钮的用途。”少校指着控制台说道。

“好吧！好吧！”李姆舍表示同意，他毫无顾虑地向我们解释了这个调度控制台的用途。

原来，这里集中控制地下工厂各个通道的钢板门和“A”号室所有的门，用按钮控制它们的开关。指示灯显示钢板和门的状况。这里安装了特殊线路电话，可以窃听各个办公室、车间和试验室内最轻微的谈话声。在控制台中央装有一个大按钮，有玻璃罩。按钮旁有指示灯。罗日科夫想知道这个按钮的用途。

“您要知道，这是向全体人员发出警报和求救的按钮，”

李姆舍说。“规定只有在最紧迫的情况下才能用它。”

“譬如，假设敌人突然冲了进来，是吗？”

“对，当然……也包括这种情况。”

李姆舍拿起钥匙向出口走去。他那蹒跚的步伐，他那象木偶小丑般左右摇晃的四肢，表明一年来的地下生活对他身体所产生的十分有害的影响远比他自己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我们走到小平台上。当然，我们的人都已经在那里：有莲娜、叶廖缅科、萨别根，还有那位拆下钢板门的中尉工程师。少校向他颔首示意，把他带到一边，低声布置了什么任务。随后大家一起朝通往下层的楼梯走去。

然而不知是什么缘故，李姆舍执意要我们看放钱的保险库。或许他是企图用这大笔财富来赎免法庭对他的审判及正义的惩罚。

保险库就在办公室旁边。库门也通向平台。这扇门敞开着，但里面还有一道锁着的门。

李姆舍掏出钥匙开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锁孔里去。

“你们的冶金专家和大夫是在这里死去的吗？”叶廖缅科问他。

“是的，就是在这间屋里，”李姆舍平静地回答，“我曾说过要释放他们，并且同意发给他们每人一万元美金。可是，当他们走进这间屋子之后，我用自动装置将门关上，用电话向他们宣读了我对他们的判决书。噢，我并不象你们所想象那样残酷无情，”他注意到我们愤懑的神情便辩解了一句，又

接着说。“我给他们留下一瓶氰化钾，并劝告他们使用。他们喊叫了很长时间，敲打墙壁，可是后来……后来，他们终于明白，这样做无济于事……”

“换句话说，你把他们诱进捕鼠器中，然后把他们毒死。”罗日科夫说。

“我当时别无他法。”

“可现在你又采用这种老办法来对待你那位国外来客了？是这么回事吧？”

“完全正确，”李姆舍这样回答，没有意识到少校在讥讽他。“我请他去贮藏室取酒，因为我上下楼梯相当不便。”

我们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李姆舍终于把这扇不大，但很沉重的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一间很小的屋子。我惊恐地四下张望，以为会发现被害者那已开始腐烂的尸体，但却没有看到。只有两个大保险箱、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台电话机。

“这里是我们的金库，十分保险，游击队是不会出现的，”李姆舍炫耀地声称。“这里有价值一千七百万美元的货币、黄金和贵重首饰。可能现在已分文不值的数百万德国马克还不包括在内。”

李姆舍意味深长地沉默片刻，好象在欣赏自己这句话所引起的反响。然后他骤然在罗日科夫面前力所能及地挺直身子，扬声说道：

“少校先生！我把矿场和工厂交给苏联政府，工厂和场矿可以立即投入生产。我还交出价值一千七百万美元的黄金和贵重饰物。”李姆舍继续报告说，“除此以外，我还将一名危

险的特务分子交给苏联政府。我这番煞费苦心的安排会受到你们的重视吗？”

罗日科夫冷笑一声：

“你是一名战犯，还妄图用我们的财产来弥补你所犯的罪行吗？矿藏是我们的，工厂是战俘们，也就是说是苏联人用自己的劳动建成的，这些财富也是从我们这里掠夺来的！我认为你是痴心妄想！”罗日科夫直盯着李姆舍的眼睛说。“不过，假如你肯交出你们采用欺骗手段从两名饿得奄奄一息的科学家帕西柯和基辛格那里搞到的笔记本，那还可以考虑对你从轻发落。”

李姆舍惊吓得呆若木鸡。

“少校先生！”他嗫嚅着说，“我不明白你所指的是什么……我没有什么笔记本。”

“突击营总指挥先生，你在撒谎！帕西柯的笔记本在你手里。”少校冷冷地说道，猛然转身沿楼梯走下去。

李姆舍一瘸一拐地跟在他后面。其余的人也都向下面走去。只有我、莲娜和萨别根还留在平台上。这个步履蹒跚、疯疯癫癫的法西斯分子使人产生极端厌恶之感，因此，我们想摆脱他，得到片刻的休息。

灯光突然一下子熄灭了。我们周围一片漆黑……不，还不是一片漆黑。我惊讶地看到周围的一切——顶棚、墙壁和地板仿佛都布满闪闪发光的亮点。

前后左右四下里都闪烁着无数淡蓝色的小火星。在离得稍远一些的圆形拱顶下面，小火星汇集成一片微微发光的薄霭，而在我们近旁却散落成瞬纵即逝的小火星。我们尤如置

身于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暗处所，一串串流星围绕着我们旋转，又向四面八方飞溅开去。

在这微弱暗淡的亮光中我仅能分辨出我身旁两个人的模糊轮廓，黑暗的门影和朦胧中时而闪出微光的庞大机器。

“啊，美极了！”莲娜扬声赞叹道。“就象是在童话世界里一般！象〈青鸟〉剧演出时的舞台似的！”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萨别根说，“是矿物在发光，很可能是岩层中含有闪锌矿。这整个大厅里都有一种强烈的辐射线，在它的作用之下就产生了这种现象。怪不得李姆舍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一个残废人，尽管他生活在一间设备良好的隔离室里。”

正当我们观赏这奇妙的美景时，忽然听到罗日科夫急促地命令声：

“赫鲁廖夫中尉，把门关上，不要放任何人出去！”

“是，少校同志！”中尉清晰地回答。

我们急忙奔向栏杆处。楼下漆黑一片，只见几道手电筒的亮光在联接杆和管道中间来回闪动。

“好象是特务跑了。”萨别根说，“我们快到楼梯口去。”

我们惊惶不安地打开手电筒，朝楼梯跑去。楼梯上没有人，小平台、厅场内和各个角落也不见一个人影。就在这时，响起了低沉的警报声，又逐渐增强，最后变成了尖利刺耳的狂鸣，给人以敌机夜袭时的感受，担惊受怕，惶恐不安。与此同时，下面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厉叫声。不，这不是喊叫声，而是充满恐惧绝望的兽性的哀号。只有当人们面对手持钢刀的杀人凶手或者遇到山塌雪崩、身陷绝境时才会

发出这种尖厉的喊叫。这嗥叫声、警报声和拱顶下面此起彼伏的回响交织在一起，融成一片混杂不清、难以分辨的狂呼怒号。

“这是李姆舍……他为什么这样尖声叫喊？就象有人宰他似的。”萨别根惶惶不安地说。

李姆舍已经顺着楼梯往上跑，碰撞着墙壁和栏杆，经过我们身边径直跑进他的办公室，还不住用德语高声喊叫着什么。萨别根听懂了他说的话，一时目瞪口呆。我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可怕的事情。

“什么？他说的什么？”

“爆炸！再过三十分钟就要发生爆炸！有人按了电钮……我的天哪！有上千吨的炸药！”

瞬息间，我、莲娜、萨别根和其余的人一起都跑进了办公室。那里没有灯光，一片漆黑。只见那个大按钮的信号灯令人惊恐地闪烁出我很熟悉的红绿色的光。

几道手电筒光照在控制台上。大按钮上的玻璃罩已被打碎，电钮也被按下去，一切都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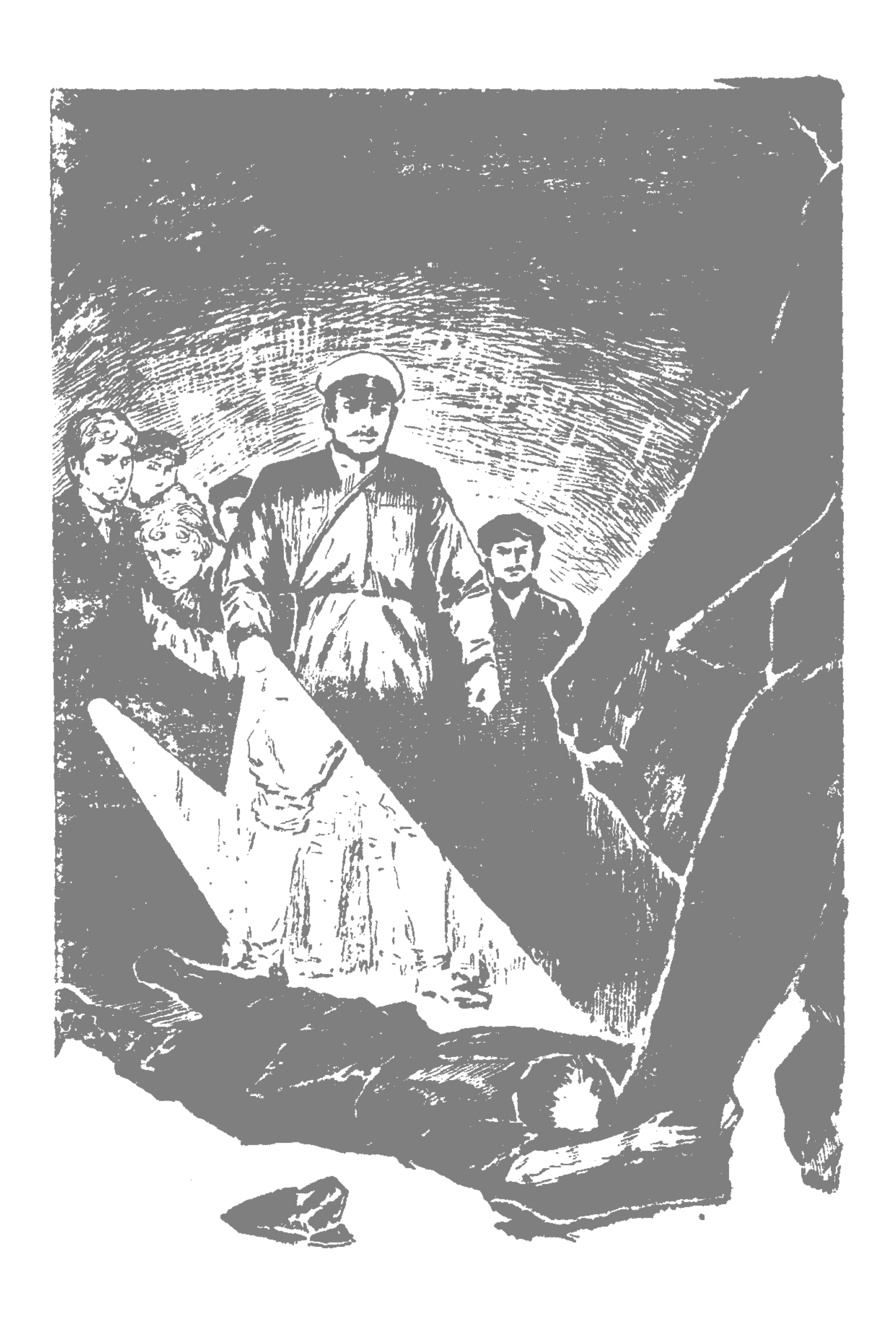
我看见李姆舍两支胳膊伸开倒在地板上，趴在青铜偶像的前面。他的姿势很不寻常：双手搂着青铜巨人的一只脚，仿佛在乞求铁石心肠的神灵宽恕他。

罗日科夫少校最后一个走进来。

“中尉工程师同志，”他对中尉工程师说，这时他讲话的声音有些不安，“您执行了我的指示吗？”

“是的，少校同志，一切都按照您的命令。”

“那么，不会发生爆炸了？”



“不会的，因为我已切断了控制台上所有的线路，还破坏了所有的枢纽开关。”

听到他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松快地出了一口气。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死亡之感消失了。

“您破坏枢纽开关的时候，”少校继续说道，“一时疏忽把下层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使特务从贮藏室逃了出来。”

“少校同志，什么料不到的事都会有的，”中尉解释说。“我不熟悉这个控制台的构造，而且也没有时间来分析研究。”

“这我理解，不过，要是您已经切断了所有的线路，那为什么警报信号还起作用，灯泡还亮着呢？”

“很可能还有个别线路未被切断。”

中尉工程师迅速把控制台侧壁拆下，从密如蛛网的电线、主线中把改锥伸进去，开始工作。不一会儿，信号灯熄灭了，警报器那可怕的嘶叫声也由强而弱，慢慢停止了。

“少校同志，我刚才没发现这根细电线。现在没问题了。”

“好一个没问题！要是您没发现那根导向定时炸弹的引爆线，那可怎么办？”

罗日科夫心绪不安地开始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中尉又在控制台内部鼓捣起来。

“没有时间来仔细查看全部构造，”他还在继续申辩，“不可能忽略的。可也难说！我可不能保险。”

罗日科夫走到他跟前说：

“别干了！您是在白费劲。反正现在干什么也不行了。

要是定时炸弹已经开始引爆，那再过……’他看看表；“再过二十二分钟，整个工厂，还有我们大家都要崩到天上去了。我们来不及跑出去的。也许，李姆舍会了解些什么情况吧？”

然而，李姆舍现在却瘫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莲娜来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

“谢尔盖，咱们出去吧！那边要好一些。”她说道。

我们离开办公室，走到充满火星的那间黑暗的大厅里。我打算看看夜光表上的钟点，但她止住了我！

“谢尔盖，不要看表。这样只会产生不必要的烦恼。咱们还是在这里坐一坐好。”

我们坐在楼梯台阶上。周围寂静无声。办公室里也很安静。我们一声不响。静谧、黑暗中闪烁的无尽的火花、近在身旁的莲娜——这一切驱散了我的惊恐不安，心平静了下来。

就在这时，办公室又发出声响，有人在挪动椅子，有人说起话来，小平台上又有人用手电筒照来照去。

“谢尔盖同志，您在哪儿？您躲到哪里去了？”我听到少校响亮的声音。

“罗日科夫少校，我在这儿！时间过去了吗？”

“还多过了几分钟呢！”

“那么，不会发生爆炸了？”

“放心吧，不会的！”他欢快地回答。

我感到如释重负。那种心神停滞状态立即消失了，我又恢复了对生命的渴望，感到精神焕发。

少校来到我面前。

“赫鲁廖夫始终坚守岗位，没放过一个人，”他说道。“这就是说，特务还在这里。咱们去搜查吧！”

我们走到下面。这里有三扇门，都关闭着。有一扇门通往粮食贮藏室，另一扇门通向厨房，第三个门通至蓄电站。蓄电站的刀形总开关拉开了。显然，这是当贮藏室的门打开以后，特务分子逃出来时干的。我们合上了开关，大厅的电灯又重放光明。几乎与此同时，听到克拉耶夫斯基的声音：

“到这儿来！你们到这儿来！他躲进通道去了！”

我们又连忙朝上面跑去。我跑进办公室，首先看到的便是李姆舍。他坐在地板上，手指向青铜偶像，用德语大声疾呼：

“这儿！这儿！他从这儿逃跑了！”

“看来，特务分子是从这扇门溜跑的，”少校说，“可是李姆舍却硬说这里没有出口。那么，咱们试试看，来打开这扇门……”

“少校同志，且慢，”中尉工程师拦阻住他。“请允许我来。这是我的事……请你们走开。”

我们大家都退向后面，又不由自主地抬首仰望着青铜偶像手中那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大锤。

中尉从容地走到巨像前面，转动一下野猪的耳朵，按了一按它的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立即闪出绿光，钢板门抖动了一下，徐徐转开，一个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低矮、昏暗的通道出现在我们眼前。中尉工程师把改锥伸进野猪嘴里转动一下，它眼睛放出的绿光便熄灭了。

“少校同志，现在这块钢板不会再闭合了，”他高兴地

说：“您尽管放心，我把这玩艺儿研究清楚了。”

罗日科夫打开手电筒，从枪套里抽出手枪，便朝这秘密出口走去。赫鲁廖夫跟随在他身后。手电筒照亮了低低的拱顶和螺旋式楼梯陡斜的台阶。他们二人小心翼翼地举步踏上楼梯。他们踏在石阶上的脚步声越来越听不清了。这时，忽听得远处响起少校的声音：

“哎，是谁在哪儿？走出来！从那儿爬出来！喂，快出来吧！……”

没有任何人回答，寂静无声。少校再次命令那人出来，仍然没有反应。这样过了一分钟，又一分钟……我们等待着，默不作声，注视着漆黑的孔道，纹丝不动。忽然响起他们回转来的急促脚步声。手电的亮光在石头上闪了一下。只见少校由拱顶下面钻了出来，浑身沾满尘土；他关上手电筒，又把手枪放好。他面色苍白，神色不安，嘴角挂着一种奇特的笑意。

“他自杀了，”少校低声说，“他躲在这条地道的尽头，钻进窄窄的狭壁中自杀了。他忍受不下去了，因为知道即将发生爆炸。”

这情况使我们大为震惊，大家都缄默不语，聚集在大厅中央。罗日科夫走到李姆舍面前。这个法西斯分子还坐在地上。

“李姆舍先生，”他高声说道，“你还拒绝把帕西柯工程师的笔记本交给我们吗？”

“我这里并没有帕西柯工程师的什么笔记本……是的，我没有……”他很费劲地说出这句话。

“好，没有你也一样，我们自己试试看……中尉工程师同志，请您仔细检查这个铜像的脚部。不过当心别让大锤打着。”

“少校同志，您尽管放心。这个怪物的手臂已经失灵了。”

他躺卧在地上，仔仔细细地查看铜像的脚，接着又用改锥在脚上敲打。听起来里面不是实心的。

“这里的确有些奥妙，”中尉说道。“这只脚是空心的，没有和底座焊接在一起。我们马上就把这只脚……”

他敲敲，看看，想方设法转动这只青铜脚掌。这里按按，那里摸摸，可是都不起作用。

“少校同志，铜壳并不厚，请允许我把它切开。不然就无法很快地发现秘密。”

“动手吧！”

中尉工程师拿起一把鎯头和凿子，敲打了三、五下便把脚掌打开。铜壳掉落在一旁，一卷纸从里面掉了出来。

罗日科夫弯下身去，急忙拾起这卷纸，转过身来向着我们大家，他手中高高举起的正是帕西柯的笔记本。少校满面笑容，环视我们大家，露出难以抑制的又喜又惊的神情。

他大声说道：

“大家看！这是李姆舍自己给我们指出了他藏笔记本的地方！”

第二十七章　帕西柯笔记本的头几页

第二天晚上，罗日科夫在他的办公室向我讲述了帕西柯笔记本中头几页的内容。当然，如他所说，这部分是“我有充分理由和权利了解的”。笔记中有的段落是他读给我听的。

这几页似乎是引言部分，由帕西柯本人用俄文写成的。后面是笔记中的科学论述部分，是记录基辛格教授的口述内容。其中只有注解和说明部分是用俄文写的。笔记中的这个重要部分我从未看到过，因此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精通德语的罗日科夫看了之后也认为，如果没有高等理论物理方面扎实可靠的知识，这一部分的内容也无法看懂。



罗日科夫从桌内取出几页打字纸，这是帕西柯笔记的开头部分，当然是复制品，原件已送往莫斯科。读者大概还记

得，笔记本的第一页被扯了下来，扔在单身囚房的地板上，就在被我们发现的两个科学家的尸体旁边。其内容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接下去的内容是：

“现在谈谈正题。一九四一年三月，有个年轻的地质学家里亚宾金，从莫斯科来到我们这里。他出差的目的是探查金属铅锌矿。他终日在山里转来转去，经常露宿野外。回旅馆时，总是带回许多矿石标本，把它分放在箱子里。他当时对灰色山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就是现在已成为我们的监狱，很快将成为我们坟墓的这个灰色山岩。接连几天他手持小锤和指南针，肩背口袋，在陡峭的山坡上爬来爬去。后来，他在我们工厂搞到一台用石油发动机带动，装有钻石钻头的凿岩机。他雇了几个工人，把这台机器运到山岩上，准备继续进行勘探。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

法西斯匪徒突然来到我们这里。在最后离开的一批飞机里给里亚宾金留了个座位。

他随身带着两个装满石头的大箱子来到机场。当然，当时带着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让他上飞机的。可是，他又不愿意扔掉自己收集的矿石标本，结果他就留在我们城市里了。

我记得，我们晚上坐在试验室里，情绪沮丧低沉。法西斯匪徒在市内为所欲为。当时流传着令人不安的消息，说盖世大保来了，在编造黑名单，要把工厂旅馆改成监

狱，很快就要进行大逮捕。 里亚宾金打破沉默说道：

‘帕西柯同志，您知道吗，我在灰石岩钻探了整整一个月，那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有两条很厚的矿脉穿过其中的白云石地层。它的表层不含矿，但深处却是矿层。我打了一口深井，您知道找到什么了吗？ ……您瞧！’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五光十色的小石头递给了我……”

罗日科夫没继续往下读，翻了几页。

他解释说：“下面详细描述了是什么矿，蕴藏量有多少，矿层的位置和走向等。还指出，发现这个矿区对我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嗯……现在您，谢尔盖同志，继续往下听……

“帕西柯问里亚宾金：

‘您对别人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没对任何人讲过。您是第一个……我把钻井填死了，井眼也堵塞住了，矿石的样品埋在地下，所有的记录都已烧掉。’

‘那么，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呢？’

‘我还是有些担心。今天我看到党卫军拿着铁锹到我埋藏样品的地方去了。也许有人会告密。’

‘还会有这样的事吗！是谁呢？’

‘您认识我找的工长李佐古勃吗？’

‘见到过。，

‘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也有文化。当时对我很有用，但我对他没有好感！今天他对我特别殷勤，在我身

边转来转去，总盯着我，对我笑，向我点头哈腰……可怕得很，我有些害怕！’

‘您太多心了吧！’

‘我怕他。我有些担心！我对他讲的太多了……帕西柯同志，如果发生什么事，如果突然间把我抓走了，我就把这事托付给您了，不要将这秘密泄露给法西斯分子！一定要守口如瓶！’

我向他做了保证……

里亚宾金的预见是正确的。就在那一天夜里，盖世太保把他抓走了。我不知道，后来他的结果如何。当时却没动我。

到一九四二年初，柏林有个委员会来到我们这里，并立即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在我们城有不少人遭到逮捕，我也被捕了。后来，长时间地、多次地对我进行了审讯，审讯时都有几个专家学者在场，其中有现在和我监禁在一起的基辛格同志。审讯的内容是关于灰石岩的矿藏。我当时声明，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懂，里亚宾金对我什么也没讲过，矿石我是第一次才看到。他们相信了我，因而也推延了我的死期。我在集中营呆了一年左右。大概在三个月前的一天夜里，突然有人把我叫醒，让我穿好衣服，吃了饭，然后给我换上新衣服，就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着蒙上我的双眼，领着我走过长长的石头走廊、过道和楼梯。就这样走了很久。最后，当取下蒙着我双眼的东西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是突击营总指挥冯·李姆舍。他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向我宣布，任

命我做基辛格教授的化学化验员。使我困惑不解的是，在德国有许多很优秀的化学家，为什么我做为一个俄国人会受到如此器重。我这样问他，他阴险地笑着回答说：

‘噢，您也是一位很出色的化学家，这我们知道。如果您忠诚地在这里工作，那么您会有很高的收入，也许还会得到十字勋章……当德国征服全世界时，这将会有重大的意义。’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命感到十分惊奇，但后来基辛格对这一切解释得很简单：当一旦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他也好我也好，肯定会被消灭的。我们俩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

罗日科夫沉默下来。

“这大概就是全部的情况。”他说完，收好笔记本。“我把能念给您听的都念了。”

“不幸的人们！”我说道。“他们哪里知道，这个奸诈的恶棍是多么狡猾地欺骗了他们啊！”

“这对他们来说会是最可怕的打击……怎么样，现在您对过去发生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吧？”

“当然啦！谢谢。我还不明白的是，您从哪里知道，里亚宾金的工长，那个姓李佐古勃的人和被打死的叫加连巴的是一个人……少校，请原谅，也许我向您提出了一个不该提的问题？”

“没关系，您的好奇心是可以理解的。我答应过您，把所有问题都讲清楚。”

他拉开抽屉，拿出我已看过的“和睦之柱”照片。照片上的柱子下面有许多德国警察。这张照片是罗日科夫在玛耶娃的博物馆挑选照片时拿走的。他没说话，只是向我指出，在警察头子坐位后面第一排站立着的、一个耀武扬威的警察。不会错，我立刻认出这个蓄着长胡子、满脸横肉、洋洋得意的人就是加连巴。

“您觉得怎么样？”

“毫无疑问，就是他。”

“没问题，都说是他。您知道是什么使我想起要看这张照片吗？在渡口搜查他的小屋时，除了一个德国样式的警哨外，我们什么可疑的东西都没发现。哨子上有个环，环上有个卍字。这样的哨子很多，但我还是决定检查一下。”

“他怎么竟在别人会认出他的地方定居下来呢？”

“阿巴札找到他，招募了他，把他安排在渡口工作。阿巴札需要他做接头地点的联络员……当然还要他做些别的事情。他孤独地一个人住，蓄了胡子，在居民中很少有人认得他，他不是这里出生的。德国人在的时候，他在俘虏集中营里干事。您当然知道，俘虏中生还的人很少。”

我就是这样了解到了叛徒李佐古勃一生罪恶的历史。

第二十八章　死后得到昭雪的人

在地下工厂“A”号室的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和莲娜在家里复习混凝土生产工艺学。

出人意料，罗日科夫来看我们。他的到来使我们很高兴。

打过招呼之后，他从袋里拿出那把大家都知道的鱼形黄色梳子，即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的标记，把它递给了我：

“把您的东西还给您，留做纪念吧！纪念那些令人惊恐不安的危险遭遇，也纪念我们共同的战斗。”

“谢谢，您不再需要这把梳子了？”

“我从来也没需要过它。我把梳子放在身边是怕它被别佳或安娜·希德罗夫斯卡娅偶然看到。那样，就会使我们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且对您来说也是不太安全的。”

我把梳子递给莲娜。她从前没见过，现在很有兴趣地看来看去。

“的确，小东西做得很精致，”少校说，“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忘我地热爱祖国和崇高的英雄主义的标志。可是，后来又变成犯罪的工具。当然，它最后起的作用还是好的。”

“怎么呢？”

“它迫使希德罗夫斯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无法解释，他是从什么地方将这把梳子弄到手的。他的供词中很多地方无法自圆其说，最后不得不承认了一切罪行。他只是否认一点：不承认参与谋害科洛米采夫。似乎他还没料到有此事。完全可能，阿巴札是背着希德罗夫斯基干这种事的，因为少一个见证人总归要好些。”

“这怎么可能呢？”

“很简单，当阿巴札知道安娜给他哥哥的那封信后，立刻意识到有危险。于是他派希德罗夫斯基去‘白石’码头，一点也没暴露出在那里给记者设了陷阱的诡计。”

“但终究是希德罗夫斯基把别佳拉进了犯罪集团，从而把别佳害死了。是这样吗？”

“不，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别佳根本没参加他们的犯罪集团。他是罪犯们的牺牲品，而不是同谋者。他们出自自己的罪恶目的而利用了他，这是事实。但是，他们是通过欺骗的手段，利用了孩子高尚的情感。”

于是，罗日科夫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别佳和希德罗夫斯基这帮人相识的这个沉痛而不幸的故事。

希德罗夫斯基比我早两个星期来到城里。起初他住在旅馆里。他在加连巴那个接头地点，即在摆渡人的小屋里，初次见到阿巴札。他们搞清楚了，虽然希德罗夫斯基是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组织的成员之一，可是他不是重要成员，他对法西斯分子的地下工厂的重要情况也一无所知。

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的活动在其组织内部也是严格保密的。

阿巴札交给希德罗夫斯基的任务是，尽可能了解有关灰石岩的一切情况。然后，为了遮人耳目，坐飞机离开了城市。实则不久又乘火车返了回来。

希德罗夫斯基住在旅馆里，在我之前抄录并译出了牢房内的密码。密码指出了从河下进入闸门入口的所在地。但他们不能理解“里索夫斯基的手”的含义，所以，密码对他们没有用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和别佳接近，打算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情况。为达到此目的，希德罗夫斯基就必须和妹妹见面。希德罗夫斯基使他妹妹相信了，他正从事文学创作，用的笔名是科洛米采夫。他在写一部有关青少年爱国侦察员英雄事迹的小说，来到这里是为了搜集材料，请妹妹介绍他和别佳相识。安娜相信了他，使他们见了面。她对别佳说，她哥哥是个作家。别佳和希德罗夫斯基很快就熟悉了。你们可以设想，这么一个少年，非常热情，而易受诱惑。对他哥哥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十分仰慕。他当然会满怀激情、胸怀坦荡地去对待这个作家！别佳知道这个作家将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他所崇拜的人的生活、斗争和英勇牺牲。希德罗夫斯基开始审慎地向别佳询问有关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的事迹。但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毫无疑问，如果别佳知道一些有关地下工厂的情况，那么他对这个有重大意义的发现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希德罗夫斯基还是获得了一点很重要的情况，别佳想起，他和托利亚及同志们——这是在他们被捕前不久的事——连续三天曾在灰石岩对面河边的小山丘上值班。整个地区那时都被封锁了，严禁游泳，甚至在灰石岩的对岸也不准停留。他们注意地观察那些被监禁的人，这些人一个跟着

一个地沿着河岸小路行走。当时要求，要记住一个被监禁的人将会跌倒的地方。这件事在第三天晚上，当别佳和托利亚值班时发生了。托利亚后来在自己画的地图上标出了这个地方，写上了“入口”二字。那时别佳对此事没有十分注意，但他记住了这个地方。

占领军撤离以后，别佳到灰石岩来过，在水边找到了地图上注明“入口”的那个地方，但什么也没发现。他那时没猜想到“入口”是在水下。这就是别佳向希德罗夫斯基及其同伙提供的重要情况。这也正是他们急于想知道的。希德罗夫斯基决定单刀直入，他不再隐瞒别佳了，告诉他，德国人在石岩内修筑了重要的工程，只有通过一个秘密的入口才能到里面去，有可能这个入口就是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知道的地方。他希望别佳在夜间带他到那里去，因为目前还需保守秘密。然后，他们会将这一切报告莫斯科，这会对祖国带来巨大的好处。总而言之，这个叛徒胡扯了一通。天真烂漫的孩子被伪善的朋友的甜言蜜语所打动，上了圈套。他自己提出要换上女装，在新年前夕的晚会上，他穿过连衣裙，知道这身衣服对他很相称。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长期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困惑不解的神秘的女孩。就在那天夜里，当我在森林里徘徊时，别佳领着希德罗夫斯基，想指给他那个秘密的入口。阿巴札和加连巴跟在他们后面。那时别佳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我的出现几乎打乱了他们的全部计划。整个森林都听到了枪声。阿巴札也不得不露面了。

当时阿巴札费尽了心机。他在别佳面前毫不慌张，也不隐讳他认识希德罗夫斯基。他向别佳说明、他们在跟踪那个

出卖青少年爱国侦察员的叛徒“贝都英”，他们打算抓到他，交给司法机关。他还声称，他自己和青少年爱国侦察员有联系。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拿出从希德罗夫斯基那里得到的小梳子给别佳看。

罗日科夫向我说完这些情况后，我问他：

“他们把谁说成是叛徒‘贝都英,呢？”

“难道你还猜不出来吗？就是你，谢尔盖同志。”

“我？”

“当然啦。”

“这怎么可能呢？”莲娜困惑不解地说道。“起码得有一些根据和凭证嘛！能这样信口雌黄吗？”

“他们提出了根据，莲娜。第一，谢尔盖知道密码的译法，是这样吧？第二，伊凡·谢尔多宾‘认，出他来了。最后,您知道吧,‘阿巴札’也‘想’起来了。这就全妥当了。”

“别佳就相信这些谎言了吗？”我大声问道。

“相信了，甚至还同意对您进行监视。”

“真恶毒呀！恐怕他们还会对别佳胡说，是我把他父亲从悬崖上推下去的呢？”

“您猜对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不能否认他们是很机智灵敏的。”

少校又叙述了阿巴札和希德罗夫斯基如何坐潜艇进入闸门，阿巴札如何与李姆舍打电话取得了联系，李姆舍又如何打开了装甲钢板门，只放他一个人进去。

“请原谅,罗日科夫同志。”我打断了他的话。“他们从哪里搞到这小潜艇的？”

“谢尔盖同志，您真喜欢不等讲完便追问个不休。好吧，既然您问了，我就尽可能回答您。现在我把一切都弄清楚了。你们听着：在希德罗夫斯基来到之前，阿巴札和加连巴就已挖出被石头填住的那个通往小隐蔽所的入口。这个隐蔽所位于尚未筑成的工事旁边。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小潜艇，毫无疑问，阿巴札事先就知道此事，也知道如何跟李姆舍用电话取得联系。你们会问，是从哪里知道的？是从在无线电指示器中找到的那份情报中提到的那个最神秘的‘年轻的’那里知道的。这个‘年轻的’是谁呢？在李姆舍的保险库里找到一个记事本，在上面他亲笔记下了各种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些记录基本上证实了他的供词。然而，在本子里却没提到他儿子弗里特里赫自杀的事，只简短地记着，曾给过他三万美金。这自然会使人得出这样的解释，弗里特里赫根本没打算去死，而是被他父亲派去执行任务，没有回来，上面所说的那个‘年轻的’就是他。显然，冯·李姆舍家族这个当之无愧的‘后裔’，对父亲交托的任务没放在眼里，而把灰石岩的秘密卖给了外国人，靠这笔钱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外国间谍机关从他那里知道了有关小潜艇、帕西柯笔记本及其他一切事情。

而这位父亲呢，他仍坚持说，他的弗里特里赫好象真的自杀了。”

少校冷笑了一声。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儿子的背叛行径会玷污他们家族的荣誉。

不管怎样，阿巴札到了李姆舍那里，他自我介绍说，他

是外国间谍机关的代表，答应给他各种好处。但是，这个老牌党卫军分子还是很谨慎。他给来人看了一切珍宝，但拒绝出卖帕西柯的笔记本。

地下的全部秘密阿巴札早就从弗里特里赫那里知道了，他也有工厂的平面图。这张图是在他尸体上找到的。办公室通向外面的出口尚未修好，但图中标明的却是已修好的通道。这个错误对特务分子来说是致命的。

阿巴札查看了各个角落，看了单身囚房，在那里把纸乱扔一地，留下硬脂斑点和燃过的火柴……

当阿巴札知道，我们到过井下之后，他明白了，从井下可以潜入地下工厂。于是，他决定破坏这个通道。由于没有炸药，他们准备了碳化物，对井口进行了监视。当看到您进入井内，便决定毫不迟延地立即采取行动。敌人杀害了索夫科夫，然后，打算用乙炔把通道炸毁。为此，他们向井下投入一整桶的碳化物……。当他们发现这个办法不行时，又决定往井里灌水泥浆。

杀害索夫科夫是当着别佳干的。别佳当时不在帐篷里，特务分子在慌乱中把他忘了。别佳听到了这帮匪徒吐露真情的交谈，看到他们那由于恐惧和凶残而变得惨白的狰狞面目，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对公安战士下毒手的只能是敌人。

很难想象孩子在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他惊讶、气忿、对杀人犯的畏惧、意识到自己铸成的大错、对自己参与犯罪活动的害怕、想去帮助受害者……他明白了，他已落入敌人的魔掌，应该尽快离开这些可怕的人，跑掉。他的衣服留在掩避所里，没来得及换衣服就跑了。

责任感很快就战胜了恐怖的心情。应当救出那个也许是由于他的过错而面临死亡的人，别佳的这个想法愈加坚定了，但怎么办呢？别佳不知道怎么办了。到公安局去？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去的，因为怕指控他是同谋犯。他知道，您的妻子来了，就决定去找她。他回到帐篷里，拿到您的信、证件，就奔向帕西柯小屋。但他没进小屋，在街上遇到了莲娜。莲娜，”少校接着讲完他的话，“您下到井里，可是开动绞车的声音却暴露了别佳。匪徒们抓住了他，把他捆上，带进水闸里。后来，他们把索夫科夫的尸体也拖到那里。他们把孩子关押在水泵房里有好几天。这时，他们已毫无顾忌地当着他的面谈论有关工厂的各种秘密。这就是别佳从什么地方知道的有关日耳曼神像的秘密。然后，一声枪响，别佳受了致命的伤。”

少校不做声了，我和莲娜也沉默不语。

最后，莲娜说：“罗日科夫同志，您讲的是对的。别佳当然是牺牲品，而不是罪犯的同谋，他是受骗上当，而不是被收买。指导他行动的是忠贞不渝的良好意愿，我那时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一点了，我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

“而他最后的行动，罗日科夫同志，也是英雄主义的。”我说，“因为他知道，他那样做必死无疑。”

少校表示同意：“当然，可以认为他是无辜的……死后应该得到昭雪。”

后来发生的事情，读者都已经知道了。杀害索夫科夫和毁掉井下通道后，匪徒们不敢在灰石岩附近停留，就转移到了白石码头。希德罗夫斯基以公开身份住进旅馆，阿巴札和加连巴则住进林中小屋。

事情败露之后，阿巴札逃进地下工厂。为什么一定要逃到那里去呢？他不是知道法西斯分子的地下工程已不再是秘密了吗？

首先，敌人觉得，那儿并不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地方。他认为，我和莲娜被禁锢在实验室里，别佳又被打死了。再没有人知道地下通道的存在，装甲钢板制的大门从外面是打不开的。总之，可以在里面安全地过上几天。而主要的是他必须千方百计搞到帕西柯笔记本。此外，法西斯分子李姆舍搜刮来的美钞、黄金、珠宝等珍贵物品也使他垂涎欲滴。还有，他必须完成上级的最新指示，炸毁地下工程。既然苏联政府已经知道灰石岩的秘密，那就该把它炸得粉碎。

李姆舍吹嘘说，他及时识破了这罪恶的图谋，才使工厂免遭毁灭。关于数千吨炸药的事，他没有撒谎，我们的扫雷战士在地下工程的不同部位发现了四十个洞口，每个洞口里藏有二十五吨炸药，这些炸药是用一个暗藏在办公室墙内的定时炸弹引爆的，而控制引爆的大按钮是安装在李姆舍的办公室内的。假如我们没有猜测出那个按钮的用途，那山岩早就变为一堆碎石屑了……

少校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和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结　　束　　语

我的惊险经历到此结束了。两天之后，我已经在工厂里开始担任制管炉炉长。这座炉刚刚经过检验投入生产。莲娜在第三个炉未建成之前，担任值班工程师职务。

我离开了帕西柯小屋，搬到工人新村的一套新住宅里。老太太娜杰日达·帕西柯十分热情地同我告别，祝我幸福。可是我们同达济扬娜告别时却非常冷淡。没过多久，在假期结束前两个星期，她便回基辅去了。

也许，我的叙述可以到此结束了，不过，我想，读者也许会对某些细节感兴趣。

凿开通向闸门的通道以后，才把李姆舍从地下带出来，送到医院去。这是因为医生认为，在水下潜行对李姆舍来说已是不可能的了。他最后所经受的恐惧和不安，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在医院里总共只活了一个星期，而且病情日益恶化，他不仅仅是个恶棍，而且还是个怕死鬼。他把别人的生命视同儿戏，而当他自己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却怕得要死。

凿开通道后，以萨别根为首的委员会立即开展了工作。专家们首先着手详细研究工厂的一切设备，计算矿体的地质储藏量，分析在李姆舍保险库里找到的各种技术资料。

在灰石岩四周筑起了高大的围墙。水下通道和井口用水

泥严实地封闭了。附近的一条高压输电网开始向这里送电。现在，这里正修建一个新的码头，铺设一条高质量的公路。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已经开始修建一个工人新村。

